



引用格式:储著源. 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及其世界历史意义[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4): 1-7.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1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4-0001-07

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Xi Jinping's world responsibility thought and its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储著源

CHU Zhu-yuan

安徽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2

摘要:世界责任问题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必须科学解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围绕着这一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是明确了世界责任目标:人类持久和平、世界共同发展,国际社会和谐安宁、世界人民生活富足;二是阐发了世界责任理念:和谐共生、命运与共,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亲诚惠容、真实亲诚,人文情怀、民心相通;三是提出了世界各国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公平正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商、共建、共享的共事原则,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增加积极因素、排除消极因素的协作交流原则;四是指出了履行世界责任的现实路径:文化交融互鉴、科技培训、援助援建、发展战略对接、搭建多边合作平台和民间交流平台、建设“一带一路”、立足中国梦倡导世界梦。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意义重大,它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阐发了世界责任伦理准则,强调了履行世界责任的主体和受益者是世界人民,凸显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责任问题上的全人类立场和大公无私的责任意识,让世界人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科学性、价值性和革命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世界责任问题上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关键词:

习近平;
世界责任思想;
世界历史意义

收稿日期: 2016-08-07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招标项目(SK2016A0471)

作者简介: 储著源(1979—),男,安徽省岳西县人,安徽医科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理念、新论断、新思想。“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立足国内外形势,营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切实树立、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双向互动,这是关系到中国梦顺利实现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因此,必须深入学习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树立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理论话语权,全面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全新视野与路径。本文拟立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今世界各国积极履行世界责任的基本目标、实践理念、履行原则和落实路径的思想和观点,梳理和阐释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一、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积极履行世界责任的实际行动为依据,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科学性特质、内容涵盖基本目标、实践理念、根本原则和履行路径的世界责任思想。

1. 基本目标

习近平认为,谋和平、求稳定、促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责任和愿望,中国尤其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严正声明:“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愿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1]总体审视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外交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可以看出,他在遵从世界和平与发展总目标的前提下,先后提出并反复阐述了人类持久和平、世界共同繁荣、国际社会和谐安宁、世界人民生活富足等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共同履行世界责任的基本目标。围绕着这些基本目标,习近平还提出了当今世界

各国必须承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方面的一系列具体责任目标。

一是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建设和谐安宁世界。和平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全人类必须承担的共同责任目标,更是公正履行世界责任的根本前提。和平内含和谐、安宁、稳定、平等之义,要求人类避免战火动乱,其根本标志是世界人民安居乐业、共享和平盛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倡导构建和谐世界并付诸实践,这是中国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夯实本地区各国友好交往的民意基础,让各国人民互信互敬,共建和谐、安宁、繁荣的家园”^[2]。为此,他提出:一要保障国际公平正义,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经济全球化强烈要求世界各国必须恪守国际公平正义原则,扩大利益汇合点,责任权利共担共享,实现各个国家的双赢多赢共赢。因而,国际公平正义和双赢多赢共赢,是世界人民内心最深切的渴望,是各国应有的世界责任目标的价值规定和实践期待。二要完善国际法,树立国际政治规矩。习近平指出:“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应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3]缺乏国际规矩的国际舞台必然会滋生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而最大的国际规矩就是世界各国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国际法,有规有矩、有法必依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三要打造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集中体现在构建国际经济政治体系方面。中国对此作出了许多努力,一直积极倡导世界各国应当共同遵守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全球治理框架、全球发展框架、国际金融体系、南南—南北合作框架等。

二是实现世界共同发展,保障人民生活富足。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其根本目标必然

是世界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习近平由此提出了实现世界共同繁荣的价值目标与理念。按照他的阐释,世界共同发展不是同步同时、平均发展,是公平发展、开放发展、互助发展、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动态均衡发展,因而本质上是寻求世界各国利益汇合点、共同利益和责任使命牵引的全面发展。围绕着这一理念,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必须“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实现世界均衡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些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4]。这是因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世界人民公正地共享世界和平与发展成果,而世界各国和人民真正共享世界和平与发展成果是履行世界责任的起点和归宿,是世界价值的核心理念。所以,“中国愿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在发展中谋共赢,在合作中同进步,让中国人民更加幸福,让世界人民共享和平与发展成果”^[5]。基于此,世界各国应当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共同努力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消除贫困、充分实现人权,切实解决世界范围内人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努力为世界人民生活富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 实践理念

面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责任,世界各国该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责任观和自觉履行世界责任,这是一个履行世界价值的理念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立足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了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世界各国和人民履行世界责任的实践理念。

一是和谐共生、命运与共。习近平提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多一份平和,多一份合作,变对抗为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6]这一理念有很充分的现实依据。世界各国和人民自

有史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和互为整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因此,履行世界责任是根植于世界各国和人民和谐共生、命运与共的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必然诉求。

二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是世界价值的核心理念,世界各国和人民只有发自内心地贯彻和落实“和”的理念,才能自觉承担各国应有的责任义务。当然,“和”的理念是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主张各国从各自实际出发尽各自能力和最大努力,并尊重各自履行方式。

三是亲诚惠容、真实亲诚。习近平在阐述周边外交、中非关系,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时,提出了世界各国合作交流应有的诚意理念——亲诚惠容、真实亲诚,倡导国际关系主体人缘相亲、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相互包容、互惠互利,共同营造世界和平格局、共同推进世界共同发展、共同行使世界政治权力、共同承担世界历史责任。

四是人文情怀、民心相通。世界人民共育人文情怀,构建世界人民沟通桥梁,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和民心相通,这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最强大的动力。只有充分发动和调动世界人民,才能真正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7]因而,习近平提出的通过世界各国官方和民间的人文交流,建立友好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相互尊重和认可的人文情怀,实现世界人民最大限度的心灵共识,这既是世界价值的高层次价值目标,更是推动世界各国和人民自觉履行世界责任的最高战略。

3. 根本原则

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世界各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水平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因此不能简单按照同一标准要求世界各国和人民履行责任,更要坚决反对大国、强国以自身优势打着国际责任旗号,强迫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国家担负过多超越国力的责任义务。从国际关系、国际法学和国际政治视角审视,无论是大国或小国还是强国或弱国,它们的国际关系主体地位是平等的,都是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成员。因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努力构建共同但有差别的履行世界责任的根本原则。习近平认为,这些原则包括: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共产党人于19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今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履行世界责任虽然是世界人民共同的事情,但目前看来跨越国家主权不可能完成现阶段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使命。二是国际公平正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习近平指出:“我们将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公平正义,推进共同繁荣。”^[7]国际公平正义是最基本的世界责任伦理准则,它既强调世界责任的共同性,又突出世界责任的差异性,提出要按照各国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地分割责任,关心和帮助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民。习近平提出的针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倡导的真实的、民主的、人道的世界责任履行原则。习近平强调,“十三五”时期我们仍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落实减排承诺”^[8]。三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和谐共事原则。针对如何切实落实世界责任问题,习近平提出了世界各国和人民国际关系地位平等、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共享尊严共享权力共享发展成果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共事原则,他指出,“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9]。四是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增加积极因素、排除消极因素的协作交流原则。面对全球气候恶化、经济危机、政治冲突、战乱不断等各种困境,当今世界

各国对各自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存在着大国之间推诿责任、小国难以承担责任后果的世界历史发展困境。中国立足于世界历史和全人类根本利益,秉承共同的责任理念,倡导各国妥善有效管控分歧、搁置争议,扩大利益交汇点和利益融合点,在追求共同利益、建设共同家园、共创世界历史的理念指导下,各国应当根据自身情况,自觉承担和履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义务。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努力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10]。

4. 履行路径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于中国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所采取的实践行动,打造了世界各国和人民高度赞同和积极接受的世界责任履行路径,并取得了令中国人民自豪和世界人民信服的成效。一是文化交融互鉴。习近平指出,“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11]。文化交融互鉴,既可以实现世界各国和人民树立世界历史共识和世界责任意识,又可以推动各国文化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为世界共同发展提供最为广泛、最为强大的智慧之源。二是科技培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和建设人才,既可减轻发展中国家科技教育经费压力,更可为发展中国家直接提供科技支持,这是一条标本兼治的世界责任履行路径。近年来,习近平多次提出,“未来5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专业技术人员”^[12]。“未来3年,中国政府将为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中国家提供1500个培训名额”^[13]。三是援助援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觉承担了支援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责任。习近平指出,我们一如既

往地“向亚非国家提供了真诚无私的援助”,“支持非洲国家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区域航空网络”^[4]。中国通过直接的援助援建形式,极大地改善了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居住环境,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依靠中国持之以恒的努力极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发言权、代表权。四是发展战略对接。自觉寻求本国战略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点,是真正立足于世界发展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力履行世界责任的战略思维。习近平主动推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欧洲投资计划、英国“英格兰北部振兴计划”、“英国工业2050战略”、德国“工业4.0”项目等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工程。五是搭建多边合作平台和民间交流平台。搭建多边合作平台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重大外交战略。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断深化和巩固中阿、东盟、亚太、亚非、上合、中美、中俄、中欧等国际性合作平台,通过这些平台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习近平还高度重视民间交流平台的搭建工作,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主体性作用。他指出,“我们要形成民间交流网络,为广泛传播亚信安全理念、提升亚信影响力、推进地区安全治理营造更好的条件”^[15]。六是建设“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全方位展示了中国带动世界发展的责任心,以中国梦造福于世界人民,是中国履行区域性和世界性责任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精神,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奉行以人为本、造福于民的宗旨,将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16]。“一带一路”倡议集中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权利和

发展成果的愿望和决心,表明中国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负责任大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承诺。七是立足中国梦倡导世界梦。世界梦是对当今世界各国和人民共同的历史责任的一种高度的思想概括和科学展望,代表着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人类美好的未来。上文所提出的世界责任目标也蕴含着世界梦的思想内涵,即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安宁、生活富足,中国梦是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之梦,与世界梦的思想内涵和核心价值观念具有一致性。由此观之,中国自身发展和实现中国梦本身就是在全心全意履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义务,进而通过中国梦推动世界人民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将履行世界责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升到全人类共同的历史使命之高度,从而建构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同时期共享共有的世界责任履行路径。

二、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不断发展、交往的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已经成了交往日益密切的共同体。在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世界各国和人民面临的共同问题也必然会呈现出来。面对人类必须共同解决的问题,习近平立足于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世界责任,提出了命运、利益和责任兼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构建了立足于中国实际、反映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世界责任思想理论体系,这对于解决争论日益激烈的环境保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反思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智慧结晶,由于其立足点始终是人类美好未来和世界共同利益,因而具有重大世界历史

意义。

其一,通过对当今世界责任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落实,强化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全人类立场和世界历史意识,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并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解决当今世界一切冲突和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极具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的方法论启示。全球化已将世界连接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恶化、金融危机、国家和地区流血冲突、战火动乱等问题,已经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国际性政治口号,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代表着当今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内在的战略意识。本质而言,它的整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发展战略。

其二,立足世界责任的思想内涵和价值目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方法阐发了当今世界各国必须遵守的世界责任伦理准则。习近平所阐述的世界责任观点和履行模式与方法,始终将本国人民利益与外国人民利益,一般利益与特殊利益,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历史责任、现时责任与未来责任,人类生存与人类发展,人道主义救助与消除贫困,直接援助与间接支持,以及先进带动后进整体性推进等履行世界责任的目标、原则、理念和路径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实际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已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自觉履行世界责任带来的积极成果,极大地提升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人民生活水平。今天,中国所倡导的世界责任思想和价值原则,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和人民接受与尊重的伦理准则,并将自然地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履行世界责任的标准。

其三,站在世界人民立场,阐明了自觉履行

世界责任是世界各国和人民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社会安宁、生活幸福的必由之路。美好世界、美好未来,只有紧紧依靠世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出来。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坚持这一基本立场,强调履行世界责任的主体是世界人民,而世界人民又是世界责任履行的受益者。履行世界责任的实质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必须树立世界人民主体意识,尊重世界人民意愿,关注和解决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生存和发展问题,真正树立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只有激发世界各国人民自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尽力履行各自责任义务,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动力,加快实现世界人民共同的梦想。

其四,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贡献,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长久维护世界和平和持续推进世界发展,才能真正承担起为人类谋幸福的世界历史责任。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原则,全面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核心价值观念,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愿望和价值观念高度一致,从而从科学理论和实际行动两个方面全方位说明了中国崛起是和平力量的崛起,中国发展必然有利于世界发展,中国梦必然造福于世界人民。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超越了资本主义霸权侵略逻辑和资本逻辑,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利益密切结合,将社会主义国家与整个世界历史紧密结合起来,凸显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责任问题上的全人类立场和大公无私的责任意识。

其五,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

理论,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再次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解答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科学理论。习近平通过论述世界各国和人民应当承担的世界责任问题,科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趋势,再次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履行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世界发展的责任使命。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关于世界责任的思想观点,实则是他凭借自身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解答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答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科学理论,让世界人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科学性、价值性和革命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戳穿形形色色的霸权理论、剥削思想,更加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克思主义信念,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

总之,习近平世界责任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世界责任问题上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加真实地展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外交理念,全面塑造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有力地反击了西方国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确立了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话语权,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视野。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卡梅伦再次会晤[N]. 人民日报,2015-10-24(01).
- [2] 习近平. 团结互助 共迎挑战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跨越——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07-11(02).
- [3]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 人民日报,2015-10-14(02).
- [4] 习近平. 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04-23(02).
- [5] 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 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N]. 人民日报,2015-09-23(01).
- [6] 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一六年新年贺词[N]. 光明日报,2016-01-01(01).
- [7] 习近平. 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N]. 人民日报,2015-10-23(02).
- [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15-11-04(02).
- [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3.
- [10] 习近平. 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N]. 人民日报,2015-09-24(02).
- [11]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25(02).
- [12] 习近平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发表讲话 阐述新时期南南合作倡议 强调要把南南合作事业推向更高水平[N]. 人民日报,2015-09-28(01).
- [13] 习近平.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开幕辞[N]. 人民日报,2014-11-12(02).
- [14] 习近平主席致亚信非政府论坛首次年会的贺词[N]. 人民日报,2015-05-26(01).
- [15] 习近平会见出席亚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的外方主要代表[N]. 人民日报,2015-10-16(01).



引用格式:周香勤. 以人为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4):8-15,96.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008-09

以人为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

People oriented:the basic value appe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well-off society in all aspects

周香勤

ZHOU Xiang-qin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 河南 郑州 450064

摘要:以人为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1)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建设成就的取得,为保障人民群众利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撑;2)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力地确保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3)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精神动力;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很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4)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社会基础:通过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断加强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为践行以人为本理念提供了良好社会基础;5)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生态要求: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为治理环境采取了大量措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和政策体系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践行以人为本理念提供了良好生态环境。

关键词:

以人为本;
社会保障;
价值诉求

收稿日期:2016-08-07

作者简介:周香勤(1973—),女,河南省新野县人,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来的。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中共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再到中共十八大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既体现了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探索的不断深入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化,也体现了我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日益重视和对以人为本思想认识的不断丰富与提升。综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具体要求,从经济持续发展到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从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到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再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党和国家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把确保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拟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方面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以人为本价值诉求。

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人为本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即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这就是该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全部社会历史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为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提供可靠的物质保证。社会主义的

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到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党和政府围绕经济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我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在10%左右。但以往片面追求速度的经济增长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仍然存在,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我们所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均衡的小康,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较大;环境保护意识落后,生态环境恶化等。因此,中共十七大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进展。”^[1]中共十八大阐述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3]。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

整体跃升。^[4]

在上述一系列中央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取得明显成效。2013—201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7.3%,2015年达685 505.8亿元;2016年增长6.7%^[5],由高速增长转为稳中有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经济结构加快优化,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高,由1978年的24.6%提高至2015年的50.2%,在GDP中的贡献率也由1978年的28.4%提高至2015年的53.7%,服务业主导特征更加突出,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6]。这些成就的取得,为以人为本思想的贯彻和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以人为本的政治保证

社会主义与民主密不可分。早在十月革命前的1916年列宁就提出了“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1979年,邓小平又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提升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政治利益,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和努力方向。

人民民主贯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2002年中共十六大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7]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人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中共十七大报告指

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7]中共十八大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163}这些表明,中国在发展民主政治上有着自己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即始终致力于维护人民利益,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工作的首位。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障。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完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就是人民民主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以人为本思想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不断深化的过程。《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选举自己的代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及其组成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他们对人民负责,并且由人民来监督。《宪法》为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法律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改革完善。

在人大代表选举方面,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继而又在1982年、1986年、1995年和2004年进行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是将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二是实行差额选举。以改革开放的先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2016年县乡两

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为例,为确保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在投票前举行了候选人和选民的见面会,增进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为了让因事或因行动不便未能到投票站投票的选民也能行使自己的选举权,选区安排了9组工作人员带着9个流动票箱,到全村23个村民组的每家每户,上门接收选民投票,保障选民的选举权不落空。

从人大代表的身份来看,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代表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的利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需要适时补充新的代表来表达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例如,2008年两会就新增了农民工代表,使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更加广泛。从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来看,他们越来越能够代表民意和反映民意。以2016年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为例,大会召开前,代表们积极参加履职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提出了很多事关民生和社会管理重大问题的高质量议案,大会共收到议案462件,其中,立法方面的议案442件,有许多还同时提出了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

基层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也是人民群众享有政治权利的重要内容。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发挥社会自治功能,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9]基层民主制度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以及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最有效和最广泛的途径。基层民主制度主要有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与城市居民自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民主得到很大发展,成为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和政治权

利的重要方面,为中国的基层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较好地保障了基层人民群众享有的民主和政治权利。

三、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以人为本的精神动力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0]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显著增强,将为以人为本注入重要的精神动力。

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应把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开来,让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要让更多的博物馆、图书馆对群众免费开放,让群众走近历史、了解历史、热爱历史,以激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同时要注重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另外,要进一步做好在海外兴办孔子学院等中国文化学习研究机构的工作,以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更好地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要注重在现时代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的。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人们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离不开国民的文明程度和文明素质的提高,这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夯实这一根基,就要从基本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我们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弘扬中华文化的主体。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还要注重塑造国家形象,着力展示中国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在自然灾害面前,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共渡难关的精神,曾经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2003年抗击非典,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抗震救灾,再到2008年战胜雪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良好的形象。特别是2008年5月的抗震救灾,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海外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普遍认为在这次救灾过程中,从政府到普通百姓,以人为本已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

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以人为本的社会基础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率领刚刚当选的中央十八届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

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1]。如何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成为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也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

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教育的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在义务教育、民族教育、贫困学生资助体系、流动人口受教育权的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大力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义务教育方面,不断完善义务教育法规,2008年秋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覆盖全国城乡1.6亿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民族教育方面,大力促进民族教育的均衡发展。自2000年起,在内地开设新疆、西藏中学班,2010年起开设内地新疆、西藏中职班,从2016年起,用5年时间为西藏、新疆培养了1000名左右干部。另外,在完善贫困学生的资助体系方面,通过多年努力,探索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学生资助体系:一是实施“两免一补”政策,构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二是进一步完善高校贫困大学生的资助体系,设立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不同类型的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此外,还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设立奖助学金,对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与奖励。这些举措极大保证了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促进了教育公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逐年递增,从2003年的212万人增加到了2016年的765万人。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加上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问题,充分扩大就业,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

新政策、新举措。例如,加强就业援助,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深入推进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积极开展“双创活动周”、“中国创翼”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另外,实施三年行动计划,促进更多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加快人力资源市场整合步伐,增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大职业培训力度等。在这一系列政策和举措的推动下,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13年以来,每年新增1000多万个城镇就业岗位。

收入是民生之源。民生与劳动者的收入紧密相连。增加居民收入、做到分配公平,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趋势,努力促进分配公平。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650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12]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232万人^[13]。为了增加居民收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让公共财政惠及于民,2012年中央财政民生支出安排达13848亿元,比上年增长近20%,2014年财政用于民生的比例更是达到了70%;二是提高劳动报酬,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三是扩大中等收入比例,调整过高收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1980年的800元提高到2011年的3500元。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依。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商业保险与慈善事业等。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快速,目前已初步建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项目齐全、

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在城镇,我国基本建立起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已全面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我国正在全面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探索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加快新型合作医疗改革试点的步伐,全面推行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拓展居民大病保险,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提高低保、优抚、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标准,推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完善工资制度。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筹资渠道逐步拓宽,基金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人数迅速增加。近年来,五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年均增幅达7%,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年均增幅达20%左右。

在民生问题上,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扶。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数亿中国人虽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任务仍然很艰巨。数据显示,按照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至2016年底我国农村还有5575万贫困人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新年贺词中指出:“部分群众在就业、子女教育、就医、住房等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不断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14]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将我国扶贫开发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指出:“‘十三五’扶贫开发的目標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15]“十三五”规划纲要还专门提出了扶贫攻坚八项重大工程,明

确了通过特色产业扶贫实现 3000 万以上人脱贫、通过劳务输出扶贫实现 1000 万人脱贫、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 1000 万人脱贫、其余实行社保兜底保障的脱贫攻坚路径,以确保贫困人口至“十三五”末全部脱贫。

五、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以人为本的生态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人的发展是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发展主要是指摆脱了环境对他人的支配而具有意志和行动自由,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人的能力与潜能、体力与智力、身与心都得到充分发展,人的多方面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思想,既要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既有理论论述又有实践举措,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了不懈努力。中共十八大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习近平总书记曾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来概括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间的关系。2013年4月他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6]他还形象地用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来比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指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

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8]230}其根本主张是要在生态保护中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生态。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和政策体系逐步建立,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1989年制定以来已经过8次修订,此外,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防沙治沙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提供了重要法制保障。

党和政府为治理环境也采取了大量措施。国家环境保护部每年发布年度环境保护公告,实时发布空气质量信息,及时发布重点区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信息,为人民群众及时防范空气重污染提供信息指导;发布水质监测信息、污染源监测信息、污染减排信息;公布主要污染物排放数量公报,公布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接受社会及公众的监督;同时做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重要精神贯彻落实的宣传报道,建立并完善信息的发布、解读、回应渠道与舆论引导机制,注重对环境保护重大方针政策、重要法规规章的解读。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一是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加快建设城市社区和乡村回收站点、分拣中心、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回收网络,推进再生资源规模化利用。二是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推动形成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三是鼓励消费者购买使用节能节水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和节能省地型住宅,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限制过

度包装,抑制不合理消费。四是推行政府绿色采购,逐步提高节能节水产品和再生利用产品比重。五是稳步推进生态保护,使森林覆盖率逐年增长,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治理等都取得显著成效。六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通过提高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显著减轻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和公众健康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3]在这里,生态红线首次被提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于2017年2月7日正式公布,明确了划定生态红线的总体目标:2017年底前,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直辖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18年底前,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到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勘界定标,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到2030年,生态保护红线布局进一步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有效实施,国家生态安全得到全面保障,并要求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刚性约束,形成一整套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和激励措施。这些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制度的安排,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自2013年6月江苏省率先公布生态红线区域规划以来,天津、四川、山东、湖南、湖北、海南等省市纷纷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制定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为完成生态保护目标、建设美丽中国、造福亿万人民进行积极的尝试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07-10-15)[2007-10-24].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l.

-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EB/OL].(2012-11-08)[2012-11-19].
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l.
- [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3-11-12)[2013-11-16].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11/16/c_132892941.html.
- [4] 习近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EB/OL].(2015-11-10)[2015-11-17].
http://www.ndrc.gov.cn/fzgggz/tzgg/ggkx/201511/t20151117_758794.html.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EB/OL].(2016-10-18)[2017-03-15].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 [6] 李克强.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2016-03-05)[2017-03-10].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3/05/c_128775704.html.
- [7]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02-11-08)[2012-10-17].
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0/17/content_26821180.html.
- [8]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下转第96页)



引用格式:陈婷,曹亚雄. 治国理政视域下党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4):16-21.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016-06

治国理政视域下党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

Study on the ideological ident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陈婷,曹亚雄

CHEN Ting, CAO Ya-xiong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基于从古至今意识形态认同在管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引领和整合功能,尤其是致力于深入广大城乡,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使党的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在国内多元意识形态冲击的复杂背景下,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不仅要求人们在理论上信服,而且要在现实生活中去践行其价值追求,克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充分发挥好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稳定器和民族黏合剂的功能与作用。治国理政视域下要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必须掌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奠定好党的意识形态物质基础,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坚定党的意识形态目标。

关键词:
治国理政;
党的建设;
意识形态认同;
理论创新

收稿日期:2016-12-20

作者简介:陈婷(1992—),女,湖北省仙桃市人,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通讯作者:曹亚雄(1968—),男,湖北省黄冈市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所谓意识形态认同,是指社会大众对反映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思想观念体系的接受、拥护和支持,并自觉地依据其原则行事。所谓党的意识形态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核心价值观、政策纲领自觉自愿地接受,并逐渐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在政党政治的发展日益普遍化、意识形态日益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是稳固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因此,各个国家的执政党无不高度重视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工作,多次强调要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而使党的意识形态高效引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这些思想不仅在理论上进一步赋予了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以新的时代内涵,而且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文拟基于历史考察,对其时代价值和实现路径进行梳理与探讨,以期促进当前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一、历史考察——历史传统与镜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1]因此,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在意识形态调控和社会整合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强化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1. 历史传统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完备,其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政治统治手段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儒学自汉代以后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而成为持续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为统治者、

士阶层和广大民众所认同并遵从。王权的思想基础和合法性主要源于社会成员对儒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源于对儒家所倡导的伦理价值原则的遵守。根据儒家学说,以王权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国家官僚统治之依据主要来自亘古不变的天道和大一统的国家学说,封建等级制度之所以“合理”,也是因为它们源自天道。乡绅自治、宗法家族治理等也是基于对儒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人之大伦,强调忠孝是为人之本,逐渐形成了与封建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情感、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封建传统社会尽管没有建立像现代社会那样完善的政治组织体制和社会组织结构,但正是因为儒家意识形态一直发挥着它的整合和稳定功能,以及民众对儒家意识形态的认同与信仰,才确保了封建王朝政权的稳定。尽管意识形态认同只是一种观念的力量,但这种观念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组织力量,这是各个王朝维持其政权稳固的根本所在。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层结构中,意识形态认同一直都是国家学说和社会整合学说的核心。正是基于从古至今意识形态认同在管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引领和整合功能,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使党的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

2. 历史镜鉴

从甲午战败、庚子事变开始,清王朝在外来侵略的逼迫下步步退让,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不管是王权、乡绅或是宗法家族都无法从儒家意识形态中找到改变这种困境的出路。意识形态认同危机由此产生,意识形态信仰的统一性基础开始动摇,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逐渐被抛弃,王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质疑,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变得混乱起来。于是人们开始寻求新的思想寄托,尝试从新的意识形态中寻找出

路。1911年清王朝的灭亡宣告了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终结,这深刻地证明了:王权一旦失去了民众认可的意识形态支撑,其合法性就必然会丧失。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引发了此后中国社会组织结构、政治制度建构的变更与解构。

以史为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作为指导党的目标、纲领和制度制定的方法和原则。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国民党取得国家政权,一个重要原因是引入马克思主义这个征服力远远大于“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具有更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和社会整合功能,并且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尤其致力于深入广大城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信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地位。

二、时代价值——社会的稳定器和民族的黏合剂

进入新时期,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形形色色的外来思想开始传入,多种意识形态展开了竞争,人们有了选择思想和信仰的更多自由。如何在一个多元开放环境中牢牢维系和强化社会成员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意识形态保持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直接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强化全党全国人民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关乎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1. 社会的稳定器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20世纪所经历的辉煌与没落,仍令人回味和反思。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不统一,党内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致使党心、民心涣散,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的衰竭,带来的是苏共执政合法性的丧失,于是政治秩序就脱离既定的框架走向了崩溃,“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3]。意识形态决定着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定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4]党的一切政策方针都是其意识形态的体现,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一旦出现危机,社会成员对党的权威就会产生质疑,党的方针政策就难以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一旦出现危机,党作为意识形态认同团体的理论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党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政治制度的建构就开始变得不稳定,党对社会整合的力量就会遭到破坏;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一旦出现危机,整个党就会变得松散、缺乏组织性,党对国家、社会、军队的领导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社会动员力就会逐渐丧失,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不安,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

苏共灭亡、苏联解体留下的惨痛教训很深刻,必须引以为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崩溃论”“修昔底德陷阱”的言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要以苏东剧变为鉴,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要意识清醒,必须坚持在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同时,努力抓好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工作,强化其社会稳定器功能,始终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强化整个中华民族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巩固党和人民的共同信仰。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2. 民族的黏合剂

我国是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在5000多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56个民族形成了团结统一的强大凝聚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与地理上相对隔

离的环境相对应的是民族的多元文化,各民族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始终存在。加之新时期经济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强化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党的意识形态认同,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拓创新,从实际出发,顶层设计要缜密、政策统筹要到位、工作部署要稳妥,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5]中国的国家认同基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认同。尽管各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中华文化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支撑,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认同,有利于引导各民族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仰,从而形成稳定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有利于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丰富中华民族统一的民族精神;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中国各阶层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平衡。

处理好民族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党的意识形态与各民族的思想文化间的关系。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工作做得好坏,关系到党、民族和国家的盛衰。在国内外多元意识形态冲击的复杂背景下,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不仅要求人们在理论上信服,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去践行其价值追求,克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充分发挥好意识形态作为民族黏合剂的功能和作用。

三、实现路径——四个要求

治国理政视域下要实现党的意识形态在全

党和全国各民族中的普遍认同,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 掌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意识形态纷争的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国内外各种思潮的涌现对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新世纪新阶段,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唯有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提高党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整合能力。其一,应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先进性,始终保持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逻辑自洽性及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力和解释力,使意识形态始终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其二,应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在与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必须充分利用好各种公众传播媒介,发挥好它们的沟通作用,将党的意识形态融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始终保证党掌握引导社会心理、引导思想潮流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引导人民大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 and 解决问题。

总之,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住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不断强化全党、全民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2. 奠定好党的意识形态物质基础

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意识形态从属于思

想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思想上的反映。因此,一种意识形态生命力的强弱,与它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坚实的经济基础、繁荣的文化生活、发达的科技水平与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是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认同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条件。党的意识形态究竟能否得到人民的认同,最根本的还是要看这种意识形态能否指导实践、能否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解决人民实际问题的意识形态,人民就拥护和认同;反之,人民就难以或不会拥护和认同。

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可,就在于其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这种理论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能指导党带领人民摆脱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命运,能够指导党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带领人民走向光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土地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完成,人民生活得以极大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领人民一步步走向小康、走向共同富裕。在全球化进一步加速、多元思潮激荡的21世纪,党的意识形态要继续为人民所接受和认可,就更要彰显这种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展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我们党的现实目标。邓小平曾指出:“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6]而这一切目标的实现都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即通过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人民创造良好的学习工作环境,才能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亲

和力。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了,人民群众就会认同和拥护这个党,党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才能增强,才能更加顺利地到人民群众中广为传播。

3. 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

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进行调整、不断地增添新的内容、不断地进行创新。理论要说服人,就必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理论能指导现实、给人们生活带来实惠,就会得到人民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7]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的意识形态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始终开放的理论体系。只有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对之发展和深化,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党的意识形态才会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以毛泽东思想为例,它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夺取政权建立理想社会的理论,揭示的是一般原理,而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毛泽东主张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尤其应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只有赢得了农民的意识形态认同,党的武装革命才会有强大的力量支持,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稳固。又如,邓小平理论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姓“资”还是姓“社”问题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科学解答,由此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在中国发展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了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巨大飞跃,增

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社会创造力,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

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推进理论创新,才能正确揭示社会的发展规律,才能科学回答现实中的复杂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和实践的指导作用,赢得大众的广泛支持,才能增强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利益群体对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4. 坚定党的意识形态目标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这一目标对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认同提出了更高要求,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反过来又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总之,只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才能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9]目标既是方向,又是向导,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也在不断地得到强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对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认同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做好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意味着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健康,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党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并基于全球性视野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使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导向,党的意识形态才会更具科学性和先进性,党的意识形态才能更好地被民众认可和接受,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经

济社会发展才会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总之,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认同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增强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考虑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思想观念诉求,注重将它们吸收和整合到党的意识形态中。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EB/OL]. (2014-10-14)[2016-09-20]. [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n/2014/1014/c1001 - 25826 596. 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014/c1001-25826596.html).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3.
- [4] 肖德甫. 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67.
- [5] 习近平.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EB/OL]. (2014-09-30)[2016-09-20]. <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n/2014/0930/c1024 - 25763359. html>.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1.
- [7]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3-12-26)[2016-09-20]. [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 2013 - 12/26/c_118723453. htm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html).
- [8]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EB/OL]. (2014-05-05)[2016-09-20]. [http://cpc. people. com. cn/n/2014/0505/c64094 - 24973220 - 2. html](http://cpc.people.com.cn/n/2014/0505/c64094-24973220-2.html).



引用格式:魏冰娥,任丑. 儒家人格养成方法的内涵、特征与现代启示[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4):22-27.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022-06

儒家人格养成方法的内涵、特征与现代启示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enlightenment of Confucian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魏冰娥^{1,2},任丑¹

WEI Bing-e, REN Chou

1. 西南大学 应用伦理研究所, 重庆 400715;

2.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儒家人格养成的方法,以潜移默化法、寓教于乐法和践行法最具代表性。潜移默化法将主体置身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通过榜样的言传身教和社会的善美习熏滋养主体人格;寓教于乐法通过对乐教情境的设置与感染,激发主体的情感共鸣,以温情愉悦的方式促使主体人格的形成;践行法主张主体通过生活实践中的习之行为成就主体人格。儒家人格养成方法与我国现有人格教育方法有所不同:一是前者多以隐性方式将人格教育理念和内化于主体,后者大多以显性方式将人格教育理论灌输于主体;二是前者主张教养结合,强调在生活实践中成就人格,后者突出教而较少注重养,较少关注生活实践;三是前者主张情、理、乐三者的结合,合情合理又愉悦地养成人格,后者更多的是以知识讲授的方式培养人格;四是前者在重视人格理论教育的同时,更加彰显践行的重要,后者较多关注人格理论说教,相对忽视了主体对理论之知的践行;五是前者更为关切环境对主体人格养成的习熏,后者更多地仅限于学校的课堂教育。因此,汲取儒家人格养成方法之长,以完善现有人格教育体系十分必要。

关键词:
人格养成;
潜移默化;
寓教于乐;
践行

收稿日期:2017-04-26

基金项目:第60批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2016M602642);重庆市教委思政择优资助项目(zkzy2014004)

作者简介:魏冰娥(1976—),女,湖北省荆州市人,西南大学博士后,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市公民道德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儒家伦理及其运用。

通讯作者:任丑(1969—),男,河南省驻马店市人,西南大学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应用伦理与西方道德哲学。

人格教育固然离不开科学的人格教育理论,但更与实施人格教育的方法息息相关。人格教育方法是人格形成过程中联系施教者、受教者、人格理论的凭借,是实现人格教育目标、完成人格教育任务的必备要素,对人格的有效形成与形成什么样的人格至关重要。一句话,人格教育方法直接关涉人格的形成及其发展程度。

我国现有人格教育方法,从学科分类看有来自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与法学的相关方法;从思想源头讲,来自西方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三个方面。其中,中国传统儒家的成人成己思想和理念对人格教育方法的重视更是由来已久:“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1]337}立足于儒家总体旨趣,儒家人格教育方法凸显教与养、情与理、知与行、施教与受教、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合一,从而将受教主体人格形成视为一个有教有养、合情合理、行重于知、教学相长、彰显个性的过程。这不仅与其他门类方法截然不同,还表明儒家人格教育重在养中有成,亦即儒家人格教育实质上是儒家人格养成。因为强调养中有成,所以无论是儒家人格养成理论还是儒家人格养成方法,均呈现出养教合一的特征,强调受教主体应在现实生活中自然而然且自觉自愿地接受人格教育理论并予以反复践行,以促成自身主体人格的形成与完善。

梳理并诠释儒家人格养成方法,对于完善现有人格教育方法体系,促成国人人格有效养成,并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都是十分有益且必要的。本文拟以最能代表儒家人格养成方法特征的潜移默化法、寓教于乐法、践行法为例来说明其价值。

一、潜移默化法

潜移默化法主张将受教主体置身于其生活

环境,通过施教者的言传身教、社会风气的习熏等方式促成其人格养成。具体来讲,潜移默化法又分为榜样示范法和环境熏陶法两种。

一是榜样示范法。“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227}对此,朱熹认为,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为政,是自家有这德,人自归仰,如众星拱北辰。^{[3]534}也就是说,为政者以自身德行管理国家与民众,民众自会体会其德行,并为其德行所感化,继而敬仰并向往其德行,进而自觉效仿并成就自己的德行与人格。为政者以德行而非其他为政,还表明为政者之身是正的,而为政者之身为正,则民众会依其正而行;反之,若为政者仅靠命令施治,则民众不会服从。正如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349}为政者之身即为政者的言传与身教。“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4]意即尧舜以禅让与善言施仁政,民众因此受教成仁;桀纣以残暴与恶言施恶政,民众因此逐渐为恶。显然,为政者的为政理念和做法,对于民众来说,具有极强的教育和感化意义。因此,为政者的言传身教实是将为政者生活(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抑或家庭生活)中的言行,尤其是其德行浸染民众,民众接受教化并依此践行,成就自身。简言之,为政者(施教者)是在生活之养中,通过言行来完成其对民众(受教者)的教化的。推而广之,施教一方无论是为政者、为长者、为师者、为友者,都可在生活中以德推行、以言传教,使作为受教方的民众、子女、学生、朋友得以潜移默化,悄然完成对他们的教化,从而促成受教主体的德性与人格的养成。

二是环境熏陶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熏陶法强调受教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人格养成同样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

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处者焉。”^[5]质言之,与善相处,就像入兰花花房、日久自带兰花香气一样,主体也会逐渐融入善性。因此,主体要想成就自己的人格,应选择仁风淳厚的地方居住。“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2]83}“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2]459}“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6]143}在儒家看来,主体身处的环境所蕴含的文化风俗是具有善美价值的,它对身处其间的主体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因此,选择居住于兰香仁美之地,主体就会日积月累地、不知不觉地接受善美润化,从而促成其善美人格的养成。同样,主体交往的朋友构成其生活的人际环境,朋友的人格品质自然也会对主体人格的形成具有极强的习熏作用。因此,选择与正直之人交往,利于主体善美人格的养成。这样看来,无论是居住选择还是人际交往,都存在间接示范效应。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主体有习熏与教化作用,而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无疑是由主体生活世界里的人及其交往所形成的。环境对主体的熏陶其实是生活在同一时空中的他人对主体的熏陶。与榜样示范法一样,环境熏陶法也将主体人格养成融入生活和与他人的交往之中,以交往对象的德行默默教化主体的德行,从而促成其人格的养成。

潜移默化法与说教法中的人格教育相比,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隐性教育特点。这一特点将人格教育目标、人格教育内容甚至人格教育本身都隐藏在主体的生活与交往中,主张通过生活里的点滴行为来养成主体人格,摆脱了说教法人格教育中多以言传来表明人格教育目标与内容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潜移默化法比现有的说教法更加有效。

二、寓教于乐法

寓教于乐法主张通过乐教情境的设置与感染,激发受教主体的情感共鸣,以温暖而美妙的方式对受教主体实施人格教育。这一做法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传统。儒家自孔子始即重视乐教对情感的调节功能,主张人格培养应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路径而达致,使音乐成为古代文化启蒙最基本的教育形式。^[7]《诗》与乐作为主体人格养成兴起与完成的媒介,其实都是借助音乐这一载体,通过对主体进行情感激发和内化,来实现主体人格的兴起与完成。具体地讲,“兴于诗”之“兴”实指:“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8]529}诗兴起什么?梁皇侃的回答是:“览古人之志,可起发其志也。”^{[8]529}诗启发人立志而兴,也即诗可感发志意,而立志正是主体人格养成的首要环节。也就是说,可以哼唱成乐的“无邪”之诗通过情感共鸣引导主体树立纯正志向,为主体的养成奠定前提和基础。诗启志只是开端,人格养成绝不止于此。“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348}诗启发主体立志,教授主体政言,但这对人格养成还远远不够,人格养成还需要立志后的践行。

主体如何践行?以礼践行,挺立自身。“礼者,所以立身也。”^{[8]530}“不学礼,无以立。”^{[2]468}礼是人伦日用的规范,学礼可做到“恭俭庄敬”。“礼主恭俭庄敬,为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礼者,无以得立身于世也。”^{[8]1378}反之,不学礼,则无法践行社会生活中的人伦日用,甚至连耳目手足等身体器官都不知该如何摆放了。“不知礼,则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1]195}主体以礼践行,实是通过礼的约束促成其理性能力与践行能力的提升,由此而立的主体人格不是没有节文的情感人格,而是情理兼具的健康人格。

主体除了以礼践志、节制行为外,还必须以乐滋养性情,将礼、乐合用于人伦日用。“礼以谨仪节,乐以养性情,此日用而不可离者。”^[9]乐何以养性情?因为乐尤其是韶乐尽善尽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2]80}“见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曁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10]1339}韶乐是赞美舜的音乐,舜以美德著称,因而韶乐善美兼备、蕴藏盛德。由此,聆听尽善尽美的韶乐就能引发主体感受快乐,但其所引发的快乐不是食肉等的感官快乐,而是丰富心灵的精神快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2]181}与感官快乐相比,韶乐引发的精神快乐,更具吸引力,也能持久。简言之,“琴瑟乐心”^{[6]370}。

乐(yue)如何乐(le)心?乐通过音乐与主体建立起情感共鸣,从而以乐中所蕴含的盛德感动主体之心,进而将音乐情感转化成道德情感,成就主体人格。“乐以所以成性也。”^{[8]530}“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1]105}这样看来,乐在通达情感尤其是道德情感时,还载播仁德之道:“钟鼓志道。”^{[6]370}载播仁道的乐自然能对人伦日用予以规范。“乐者,通伦理者也。知乐,则几于礼矣。”^{[10]886}“雅、颂之声皆发于辞,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11]1227}乐通过对主体的情感渲染和德性表达,甚至可以起到提升主体德性境界的作用。“乐者,德之华也。”^{[10]891}

显然,儒家寓教于乐法是极富感染力和影响力的,它从情感入手,将志、礼、德、行等自然而然、合情合理、温情脉脉地融入主体的内心,进而转化成行为动力,最终在生活中以主体浑

然不知地感受美乐的方式获得德性、成就人格。这与简单直接的道德说教相比,既高雅又有效。总之,寓教于乐法以情乐(yue)开启,经由礼文,再由情乐(le)成人,同样也肯定生活之养对主体人格养成的作用,而它所养成的人格是善美乐、情理合一的完美人格。

三、践行法

张岱年先生在总结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哲学特质时,曾指出:“中国哲学乃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研究的目的在于行,研究的方法亦在行。”^[12]可见,儒家人格养成之践行法主张受教主体的生活实践(行)既是人格养成理论(知)的来源,也是人格养成的方法和归宿,其要义是倡导主体在生活实践中通过习之行为成就人格。“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11}主体首先要在生活实践中、行为上做到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辈、博施他人、亲近仁德,然后再去学习文献(知)。“行有余力”表明:“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1]49}意即德行是根本,学文(知)是末节,本先末后,本重末轻。人格养成中的德性获得应以践行德行为先,之后留有余力再来学文。简言之,儒家人格养成践行法的第一层含义在于:践行先于且重于学文。

儒家人格养成践行法的第二层含义在于:践行不仅先于且重于学文(理论知识),而且还先于且重于言语。“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2]104}“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10]979}成就君子人格首先在于践行你所说的,然后再谨慎地说出来,以体现主体言出必行、言而有信。言而有信还表明,践行是证明主体外在言语与内在品性是否一致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君子人格文质合一的主要表现。反过来讲,如

果主体不能做到言出必行或者常常言过其行,那么他应该羞于被称作君子人格,“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2]397}。

行不仅先于且重于文与言,而且还重于人的其他感官能力,这是儒家人格养成践行法的第三层含义。“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6]141}也就是说,耳鼻感官所感觉到的,不如心脑感官所认识的;心脑感官所认识的,不如主体所践行的。行是学的最终和最高目标,只有践行所学,才可做到以仁义为本,辨别是非,言行一致,没有差错。总之,行是基于对道的透彻了解。因此,践行是成就主体良好人格尤其是圣人人格的唯一途径。

既然践行如此重要,甚至是成就圣人人格的唯一途径,那么,践行涉及哪些生活领域、普通人能否做到、是否很难?对此,儒家认为,践行并不难,它就在人伦日用的细微之中。“人言匹夫无可行,便是乱说,凡日用之间,动止语默,皆是行处。”^{[3]222}每一个普通主体在其日常生活中的人伦对待和行为实施都属践行。也就是说,只要主体在生活实践中坚持践行(“下学”),必定能成就其君子以至圣人人格(“上达”)。当然,成就君子或圣人并非易事,它需要主体在生活困苦时也坚持践行。“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3]因为困苦条件下的践行,能真正磨炼主体心志、身体与行为,进而提升主体的践行能力,由此所成就的主体人格显然会更加非凡坚定。因此,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件小事做起,尤其是处境困苦时的力行坚持,是儒家人格养成践行法的第四层含义。需要说明的是,儒家人格养成注重行,但并不反对知,而且都认

为知行相资。这可谓儒家人格养成践行法的第五层含义。“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礼记章句·中庸篇》)行与知二者在主体人格养成中,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与地位是不一样的。没有知的行,可能是莽撞;没有行的知,只能是空谈。知行兼具,才可相互促进,成就人格。

的确,人格养成是包括德性、能力、知识、习性等诸要素在内的获得。但无论是哪一要素的获得,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主体去践行。要想获得德性,就得在生活里时常做符合德性的行为。“一个人若不喜欢公正地做事情就没有人称他是公正的人;一个人若不喜欢慷慨的事情就没有人称他慷慨,其他德性亦可类推。”^[14]以此类推,获得能力,就需要在生活实践中时常做锻炼技能的事;获得知识,就必须在生活实践中时常学习理论。总之,对于儒家人格养成践行法来说,主体人格养成是集知、文、言、行、日用、微、苦于一体的磨砺过程,而贯穿这些诸要素始终并促成人格形成的关键要素只能是行与主体的生活实践。

四、现代启示

儒家人格养成方法与我国现有人格教育方法有所不同:一是前者多以隐性方式将人格教育理念和方式内化于主体,后者大多以显性方式将人格教育理论灌输于主体;二是前者主张教养结合,强调在生活实践中成就人格,后者突出教而较少注重养,较少关注生活实践;三是前者主张情、理、乐三者的结合,合情合理又愉悦地养成人格,后者更多的是以知识讲授的方式培养人格;四是前者在重视人格理论教育的同时,更加彰显践行的重要,后者较多关注人格理论说教,相对忽视了主体对理论之知的践行;五

是前者更为关切环境对主体人格养成的习熏,后者更多地仅限于学校的课堂教育。

据此,儒家人格养成方法与现有人格教育方法相比,在重视理论教育的同时,更突出生活之养,倡导教中有养、养中有教,养中践行、行即是教,养中达情、理中寓情甚至达乐。这就为我们弥补现有人格教育方法多重言教、较少践行、注重理性、忽视情感等弊端提供了思想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蕴含教与养、情与理、知与行的儒家人格养成方法,因其考虑受教主体的情感表达、生活实际、实践能力,显然对主体人格的促成会更具效力。因此,汲取儒家人格养成方法之长,以完善现有人格教育体系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 [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2] 来可泓. 论语直解[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 [3] 朱熹. 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4] 来可泓. 大学直解·中庸直解[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64.
- [5] 王国轩,王秀梅. 孔子家语[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136.
- [6]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 2012.
- [7] 雷永强. 论孔子乐论的情感世界[J]. 中国哲学史, 2013(1):32.
- [8] 程树德. 论语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 1990.
- [9] 李颙. 二曲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96:460.
- [10] 夏剑钦. 十三经今注今译[M]. 长沙:岳麓书社, 1994.
- [11] 陈广忠. 淮南子[M]. 北京:中华书局, 2012: 1227.
- [12]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5-6.
- [13] 徐洪兴. 孟子直解[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299.
- [14]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23.



引用格式:张雪琴.《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4):28-36.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028-08

《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Thought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Home Letter of Zeng Guo-fan*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张雪琴

ZHANG Xue-qin

郑州轻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现代性危机导致道德教化式微,进而造成当下社会道德不彰、家风不淳、官风不正、世风日下。《曾国藩家书》蕴含着丰富的修身、治学、齐家、为官的道理:修身之德贵在恪守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守则;治学之德贵在不求功名富贵而求诚正修齐;齐家之德贵在孝悌、勤俭与睦邻;为官理政之德贵在清、慎、勤。曾国藩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法、榜样教育法、自我教育法、隐性教育法和因材施教法,很好地解决了子弟的立德问题。曾国藩的道德教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有助于化解人与社会的现代性危机,纠正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偏差,以良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以官德修养根治腐败。

关键词:
曾国藩家书;
道德教化;
德性修养;
现代性危机;
腐败治理

收稿日期:2017-03-2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BKSO03);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张雪琴(1980—),女,河南省商水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强调,“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1]。家书、家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道德价值观与当今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义理相通之处^[2]。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湘乡曾氏家族因其良好家风的影响,至今人才辈出、长盛不衰。最能体现曾氏家族家训思想的是曾国藩写给家人的书信,后整理编撰成《曾国藩家书》,1500多封家书包含家常琐事、做人道理、治学方法、为政之道。本文拟以《曾国藩家书》为蓝本,重点研究曾国藩在修身、治学、齐家、为政等方面的道德教化思想方法及其在当代的价值,以求教于学界。

一、《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内容

传统儒学将“内圣外王”作为读书人之终极理想,这一理想是通过“修、齐、治、平”的路径来实现的。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立德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受儒学影响至深的曾国藩在教育子弟时,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将立德贯穿其始终。

1. 修身之德

修身是儒家实现“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基础,即一切事业的成败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一生都在践行修身的功夫,拜唐鉴习“静”、拜倭仁习“慎独”、订日课册、坚持写日记、改名“涤生”……他提出的“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条修身要则,既有对先贤的继承和吸收,更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省悟。

(1) 慎独则心安

慎独即谨慎独处,是指个体在无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凭借高度自觉,遵守道德规

范,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之事。曾国藩曾说,“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君子慎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3],认为慎独的伦理价值是用于区别君子与小人的,而慎独的实践意义在于心安。自修之道最难是养心,能慎独者,则能省己身;常省己身者,则无内愧之事;心无内愧之事,则笃定淡然。因此,慎独乃修身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

(2) 主敬则身强

曾国藩认为,主敬即“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4]。此“敬”既是道德规范又是修身方法。在《居敬箴》中,曾国藩把居敬看成包医百病的良方,将“敬”列为日课之首,并提出具体实施细则:“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5]此后,他便守主敬至终身,不敢曾稍有陨越。

(3) 求仁则人悦

求仁指人要有博爱之心、宽容之心、慈悲之心。曾国藩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6]¹⁵⁵,意指要爱人和一切物类,要做到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曾国藩的求仁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是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怀。他认为,如果不能做到求仁,则是悖德之人;如果能够做到求仁,则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人悦即人人心悦诚服,是求仁的结果。

(4) 习劳则神钦

习劳指人应该用劳作来换取生存和社会地位。曾国藩认为,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但是,“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7]⁷⁶³。因此,他要求自己 and 身边人都要终身勤劳、刻苦学习,强调这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还是磨练筋骨、锻炼意志的重要途

径,更是一种道德追求。

2. 治学之德

曾国藩将追求知识学问的目标首先确定在遵德性的人格修养方面,他在家书中写道:“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6]440}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是曾国藩治学的核心思想,也是其治学之德的基本理念,其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君子重于大官

君子即有德之人,是自孔子以降儒家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曾国藩一直以君子之德形塑自身、教化子弟。他认为“读书明理,志在圣贤”才是读书的目的,即读书是为了做德才兼备的君子,是为了德性修养的进步和提升,不能把读书求学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读书人若做不到《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至善”,就背离了求学的初衷。之所以不能把当官作为求学的目的,是因为当官是一阵子的事,而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官衔的大小不取决于自己,而学问德性的多寡则主要取决于自己。

(2) 进德重于修业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6]48}曾国藩认为,读书只为两件事,即进德和修业,所谓进德,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道,核心是孝悌仁义;所谓修业,即诗文作字,看读写作,提高自身本领。在此二事中,曾氏始终把进德放在首位,认为只有德行上进步,学业才能真正上进。所以他说: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亲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子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识字之牧猪奴耳”^[8]。

(3) 为学最要是虚心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常见朋友中有美

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冷笑,乃有进步也。”^[6]曾国藩曾谆谆教导诸弟子为学要戒骄戒傲,认为虚心是一种学习态度,是个人求知和进步的动力,亦是一种美德。他反对读书人轻率下结论,认为只有学习到一定程度才可以评论古人,读书人不要热衷名利,对知识还一知半解就想著书立说,这是心态浮躁的表现。

3. 齐家之德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承继了其祖父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宝思想,其中,“书”为读书学习,“蔬、鱼、猪、扫”表示耕作自立,时刻保持寒士之风,“早”即不晏起,“考”为孝敬长辈,“宝”乃敦亲睦邻。他终身实践并将之写入曾氏家训中,坚持将读书修身、俭朴持家、孝悌睦邻作为“八宝”的核心精神,成为曾氏一门对子孙后代为人的基本道德要求。

(1) 孝悌乃齐家之本

孝是曾国藩齐家之德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其一生躬行履践的道德规范。在他写给家人的书信中,涉及孝友之道的就有数百封。曾国藩在写给长辈的信中,基本上都是先写日常琐事:一段时间内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家人身体如何等,看似繁琐啰嗦,实则是为了让家中长辈放心,也是在实践其“事亲以得欢心为本”^{[7]412}的理念。他还要求子弟将孝的范围扩大,不仅要对自己父母尽孝,也要对族中长辈尽孝。

作为长子的曾国藩,把悌即教导关爱诸弟作为孝敬父母的一部分,认为“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6]72}。他时刻谨记家族使命,认为自己要成长也要帮助兄弟进步。曾国藩家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写给其兄弟的,内容涉及治学、做人、持家、教育后代、带兵打仗、为官之道等。他时而

淳淳教导,时而严厉斥责,时而自我反省,时而与弟共勉。当兄弟对其无端怨恨和有不情之请时,他反省道:“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6]181}对待弟弟的不满,不责弟而责己,又曲意为之满足,体现了长兄的大度。

(2) 勤俭乃齐家之魂

曾国藩时常教导子孙要保持耕读之家本色,俭朴勤奋地过日子,不染官宦子弟的纨绔习气,“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必须一一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时时学习之”^{[6]348}。曾氏时常教育后代要自立、自强,并多次表示自己不会为子孙留钱财,说“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逸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6]250}。他相信节俭既是美德也能养德。在其家书中,随处可见他叮咛家人生活要俭之言。他曾赠联给弟曾国潢“俭以养廉,直而能忍”,并在信中多次嘱咐:“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6]1317}他还曾告诫儿子纪泽“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的贱愈易长大,富贵儿女愈看的娇愈难成器”^{[6]1631}。曾国藩远过庸常的眼光,正是他对子孙后代深厚永久的关爱。

(3) 敦亲睦邻乃齐家之道

曾国藩的“齐家八宝”中的“宝”指的就是敦亲睦邻。他在京为官期间,凡往家中寄钱,总不忘嘱咐留一份给族人和远亲,以敦亲睦邻。至于这样做的原因,他说:“一则我家气运过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

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6]103}“持盈保泰”,就是在鼎盛的时候保持低调谦虚,这样家运才能长久不衰。这也是他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6]55}的体现,他时常提醒弟弟们:“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6]144}

4. 为官之德

曾国藩一生倡导并践行“居官三鉴”即清、慎、勤,这是其官德修养的核心准则和行为规范。他曾作三字箴:“将此三字各缀数语,为之书解。‘清’字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9]后来,为了表述更加明晰,曾氏又将清、慎、勤改为廉、谦、劳。

(1) 居官要以清(廉)为先

在官德中,清(廉)、慎(谦)、勤(劳)三位一体。曾国藩认为,清廉乃为官安身立命之本,是第一准则。他反复告诫为官的弟弟:“为官莫作名利双收之想,‘勤廉’二字,系为政之本……要以‘廉’字自律。‘廉’则己身与随从之众一尘不染,自无蒙蔽偏祖之虞。”^[23]清廉不仅关涉官吏个人的德行优劣与官场上的进退成败,而且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衰存亡。有学者用大量的史实证明曾国藩在为官期间没有一笔公款进入个人腰包,他死后的遗产只有30万卷藏书和一座藏书楼。这是他清廉的佐证,也体现了他“藏书万柜可教子,遗金半两常作灾”的思想。

(2) 居官要以慎(谦)治骄

慎(谦)既是曾国藩修身之德的构成,也是其官德修养的重要准则。宦海沉浮多年的曾国藩用“以慎治骄,立于不败”时刻提醒自己。他将“慎”细分为三慎。一曰慎言。“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器

讼。静中墨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6]506}。曾国藩认识到谨言慎语的重要性,还指出前世卿大夫之衰、今朝官场之祸皆大多因多言长傲所致,因此,他认为为官一定要谨言慎语。二曰慎行。他反复告诫子弟,世间唯有谦谨是载福之道,骄佚则易败家。他要求诸弟时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骄佚”二字。三曰慎交。曾国藩特别注重良友的选择,弟弟们外出求学时,他告诫说:“择友则慎之又慎……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6]76}他常嘱咐家人不参与地方事务,不要与地方官员过多交往,即使交往,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

(3) 居官要以勤(劳)为本

勤(劳)不仅是曾国藩的修身齐家之美德,更是他为官之德的核心道德规范,他认为勤政是居官第一要务。为官之际,他常反省自己是否勤政,基本做到了自己在《劝诫委员四条》中所倡导的五勤,即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据《曾文正公年谱》记载,曾国藩“未明而起,黎明出巡查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幕僚。以其余时披览书中,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逸。尝称:时局艰难,唯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11]。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的官德境界不止于此,他还提出为官要勤而不夸、劳而不求功名。在家书中,他多次要求“吾兄弟既誓拼命报国,无论如何劳苦,如何有功,约定终始不提一字,不夸一句”^[12]。

二、《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方法

曾国藩认为,在立德、立功、立言当中,立德最难,其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修养才有所成,尤其需要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道德教化方法。《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方法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

1. 理论与实践结合法

理论教育法与实践锻炼法是现代德育方法论中的基本方法。前者是向受教育者灌输教育内容,以理服人,使人心悦诚服;后者是让受教育者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其优良品德和行为习惯。曾国藩对子弟的道德教化,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事实、摆道理,此乃理论教育法。除此之外,他还注重实践锻炼法。他主张“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6]94},如谈及孝道,要求子女做事要让长辈以得欢心为本;论及节俭,要求子女亲自添茶倒水、拾柴耕种;论及求知与躬行,他对不善于诗文的弟弟表明自己的态度,躬行重于求知:“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污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的好,亦只算个名教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6]94}他回家省亲必吃儿子亲手栽种的蔬菜,在京为官必穿家中女眷亲手做的衣和鞋。通过这些方式,曾国藩较好地达到了鞭策儿女学会做人、塑造儿女们高尚人格和灵魂的教育目的。

2. 榜样教育法

榜样教育法是以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进行示范,帮助和启发教育对象,以提高其道德水平的一种教育方法。这种方法旨在通过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来进行教育,激发教育对象产生思想情感共鸣,引导其学习、对照和仿效。与说理教育法相比,榜样教育法更富有感染力和可接受性。曾国藩曾说,做好人、做好官、做好将,俱要好师、好友和好榜样。他一生奉“内圣外王”为圭臬,以圣贤为榜样,严苛要求自己,在“修、齐、治、平”上有所作为,成为家族道德学问之楷模。他不但要求自己 and 诸弟以身垂范教子侄,还将自己最崇拜的32个圣贤写进其《圣哲画像记》中,并言“此三十二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13]。文

章写成后,他要求儿子设法寻找这32位圣哲的画像,并一一画好,存于家塾,作为家族子弟学习效仿之榜样。

3. 自我教育法

自我教育法是教育对象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管理、自我鉴定,自觉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方法。在儒家推己及人、修己安人的修身活动中,修己是根本。因此,曾国藩非常重视修身养心的方法。早年为克服不恒的毛病,他订日课册,日课内容包括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夜不出门等,自30岁后一生遵守,可见对自己要求之严。他还坚持写日记,并在朋友间传阅,以督促自己除掉恶习。“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6]56}他总结出一套以思诚为根本,以居敬、主静、慎独相配套,以日课、研几等为操作途径的内省修心方法体系,并将之传给后人。

4. 隐性教育法

隐性教育法是将德育内容渗透到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使教育对象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的一种教育方法。曾国藩认为,环境好坏对一个人成功与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环境对人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在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中,他反复叮嘱要打造“耕读孝友之家”。他还看到社会环境对人的成长有很大影响。为了让孩子远离京城官宦子弟以免养成不良习气,他虽在京为官,却让夫人带着孩子在湖南老家居住学习。他积极为兄弟子侄择良师选益友,为他们营造好的教育环境。在选择老师方面,他的标准是不但要学问好,更要人品好,在给儿子曾纪泽选择老师时他写道:“研生兄(纪泽老师)亦山林寒苦之士,决无官场习气,仅可放心。”^{[6]389}“明年请师,仍请邓寅皆先

生。人品学问,皆为吾邑第一流人。”^{[6]559}在择友方面,他告诫诸弟和子侄,一生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一定要慎之又慎。

5. 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法是从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即个体差异出发进行有差别教育的一种方法。曾国藩曾经用诗对三个弟弟分别做出了鉴定:“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14]辰君是曾国潢,天智才干平平;午君是曾国华,很有才华;老沅是曾国荃。针对几个兄弟的不同特点,他分别对之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对于敢闯敢干却狂傲的曾国荃,在肯定其优点的基础上指出了其不足:“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35];而对于为人谦卑的曾国葆,则在肯定其谦虚可爱的同时,指出他还要自信自强、勇于进取;而对于才智平庸的曾国潢,则安排其在老家主持家务,上孝父母,下教子侄。对自己的两个儿子,曾国藩亦同样在深入了解他们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教育方法。他因材施教的方法,有的放矢,针对性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主持家务的曾国潢秉承半耕半读之家风,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曾国荃军功赫赫,封一等伯爵,成为封疆大吏;大儿子曾纪泽成为晚清知名的外交家,二儿子曾纪鸿成为近代知名的数学家。

三、《曾国藩家书》中道德教化思想之当代价值

不可否认,一切传统的道德思想和文化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的思想精华不会因朝代更迭、历史变迁而失去其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36]《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思想在今天就具有这样的价值。

1. 以修身为本的内向超越修补现代性危机

儒家推行的修身之道是一种内向超越的方法,作为一代大儒的曾国藩,认为修身是其“成圣”的必经路径,践行《易经》所言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终身学习理念。他曾写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警句以自勉,一生无时无刻不在以经世致用为核心,以追求至善为目的,坚持自修之道,以内向超越为本,将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结合起来,力争做到“内圣外王”,被后人评价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重视内向超越的人,不会怨天尤人,凡事都反求诸己。有此境界,生活自然幸福。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现代社会应鼓励人们从内向超越中找寻智慧,重视修身,有效地约束自己的物质贪欲,进而克制征服性技术的发展,摒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唯如此,才能走出现代性危机,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2. 以至善为学观纠正功利主义教育的偏差

现代社会,功利性教育倾向越来越严重。为就业前景而学、为晋升加薪而学、为职称名声而学,盲目求学、跟风求学、读书无用论等,都是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反映。过分强调教育的功利性,会导致受教育者情感的逐渐缺失和人格的逐渐矮化。在那些通过教育而“成功”的人士中,不乏自私和失德之人,发展到最后,有可能出现坏人统治好人、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如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将教育回归其本真目的。《大学》将教育的目的界定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曾国藩将此看作为学的最高目标。他提出读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做明礼诚信之君子;读书重在进德与修业,在二者发生矛盾时,进德重于修业。他还主张读书要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起来,即“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

之完人……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6]155}。在曾国藩的教育理念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个人的小善和社会的大善。这种教育理念提醒我们:只有将德性道德教育、人格完善教育当作教育之终极关怀,才能实现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统一。

3. 以良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

家庭是社会最基础的组织细胞,家与国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近几年,国人热议家风,表面上看是对一己之家的关怀,其实是对当下家庭道德领域中诸多问题的深刻反思。当下中国的家庭结构与曾国藩时代有很大不同,现代家庭基本是“一代化”“小型化”模式,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的主要形式,老人逐渐被边缘化,家庭代际关系模式、家庭功能、家风传承方式亦发生了变化。但是,若能将曾氏的孝悌、勤俭、敦亲睦邻进行现代性转化,依然能给今天的家庭道德建设以启示。

经久传唱的歌曲《常回家看看》,道出了现代社会父母子女的关系越发向着平等相处、超越功利的方向发展。曾国藩曾说“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这实际上是提醒现代人孝顺父母应该关心父母真正需要什么,子女平安幸福、抽出时间用心陪伴,或许是当下许多老年父母最在意的。曾国藩认为,践行“兄友弟恭”既是一种家族责任,更是孝顺父母的一种方式,在男女平等的今下社会,悌道可以转换成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的原则,即家庭内部责任和义务重于回报与索取。

曾国藩常以书信告诫家人要敦亲睦邻,将谦虚待人、为家族创造好的周围环境,视为保家

之道。当今天社会的邻里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曾氏所处的传统社会相比亦有许多不同的新特征,但是曾国藩处理邻里关系的经验和道德要求,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现代城市人生活节奏加快,大多数社区不是以血亲关系或同事关系为基础的聚居,邻里关系生疏,互帮互助亦少见,造成了城市家庭生存的孤独感,邻里之间因为私占车位、噪音扰民、宠物惹事、乱扔垃圾等而产生的矛盾层出不穷。法律和规则不能完全解决这种现代城市病,还是要回归到道德和人心,要让人们认识到“和”与“恕”的价值,要让人们意识到良好的邻里关系于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4. 加强官德修养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做官先做人,从政先立德”,官德淳则民风正,领导干部的官德修养关乎政治清明、人民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曾国藩的官德修养虽然有其时代性和阶级局限性,但其中的道德力量对当下的反腐败工作仍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7]道德准则既有时代性,又有历史联系性和继承性。我们应该将曾国藩为官的“清、慎、勤”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新的内涵,将之作为党员干部为政的基本准则。曾国藩深知“吏畏吾廉、民服吾公”的道理,坚持“唯俭可以养廉”的理念,始终以“节俭、节用、节欲”自律,反复训诫家人不要追求奢靡、贪图享受,要求下属不贪财、不苟取。这些做法启示今日为政之人:为政清廉方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心,公务人员必须恪守廉洁自律的职业道德观,不廉不足以立身,要坚守规矩、把牢道德底线,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曾国藩将为官之“勤(劳)”细分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这启示我们:要大兴实干之风,勤政为民,谨记“功崇唯志,业广

惟勤”,“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当下,我们将曾氏的“五到”与当前社会形势和工作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内涵:“身到”就是要亲自深入到群众中去,探访民意,了解民情;“心到”就是要做到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时时以民生为念;“眼到”就是要及时了解各种公文、文件,把握相关政策会议精神,及时关注民生新情况新问题;“手到”就是要及时处理工作,不推诿、不拖拉,并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工作方法做好备案总结;“口到”就是要做好党和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宣讲工作,与民众平等细心交流,及时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四、结语

现代性危机导致道德教化式微,进而造成当下社会道德不彰、家风不淳、官风不正、世风日下。对于这些问题,《曾国藩家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时,我们应寻觅一条走出困境的道德教化之路,重构传统德性道德价值体系,将德性道德与规范道德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自己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准确位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自然、社会的关系。

要实现德性道德与规范道德的恰当融合,构建新的德性道德价值体系,我们要做到:用规范道德来约束人、完善人、引导舆论、改善民风,让道德规范像法律一样成为调解人们基本行为之必需;使传统独白式道德教化走向现代对话式道德教化,引导个体对行为和动机进行深刻反思,不断在反省中自我扬弃、净化心灵、提升觉悟;加强道德教化的载体建设和环境建设,让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社会要素与传统道德教化相融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

- 讲话[EB/OL]. (2016-12-15)[2017-1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15/c_1120127183.html.
- [2] 曹洁. 诸子“家训”类文献的齐家之道与和谐社会
的文化建设[J]. 河南社会科学, 2016(3):
109.
- [3] 唐浩明. 唐明浩点评曾国藩语录:上[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170.
- [4]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M]. 长沙:岳麓书
社, 1985:1393.
- [5]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M]. 长沙:岳麓书
社, 1987:138.
- [6] 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全编[M]. 北京:中国华侨
出版社, 2011.
- [7] 唐浩明. 唐明浩点评曾国藩家书[M]. 北京:华
夏出版社, 2009.
- [8]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M]. 长沙:岳麓出
版社, 1995:39.
- [9]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日记[M]. 长沙:岳麓书
社, 1987:802.
- [10] 吴江, 袁敏琴. 曾国藩成就大事的 36 字诀[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7:185.
- [11] 黎庶昌. 曾国藩年谱[M]. 长沙:岳麓书社, 1986:
76.
- [12]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M]. 长沙:岳麓书
社, 1986:878.
- [13]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诗文[M]. 岳麓书社,
1986:251.
- [14] 李志茗. 曾国荃与晚清官书局刻书[J]. 厦大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134.
- [15] 曾国藩. 曾国藩治家全书[M]. 长沙:岳麓书社,
1997:45.
- [16] 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
时的讲话[EB/OL]. (2014-01-01)[2017-
01-20]. http://www.wxyjs.org.cn/zyldrhd_547/201401/t20140101_147332.html.
- [17] 习近平.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EB/OL]. (2016-01-
12)[2017-01-2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03/c1001-28319087-2.html>.



引用格式:张省, 袁讯.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述评与展望[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4): 37-47.

中图分类号: F403.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6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4-0037-11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述评与展望

Review and prospect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research

张省, 袁讯

ZHANG Xing, XI Xun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梳理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定义虽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彼此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将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归纳为多样性共生、自组织演化、开放式协同三个方面,结合生态位理论解释了系统中要素的功能,将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总结为自下而上的自发形成机制和自上而下的引导形成机制,并以时间度量为基准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路径进行了划分。梳理中观区域层面和微观创新主体层面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已有研究对政府在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进中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提供和政府政策制定两个方面;而在未来的研究中,创业教育平台构建、创新文化培育和创新主体联动更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

创新生态系统;

生态位;

协同创新;

创新演进

收稿日期: 2017-04-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GL004); 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项目(162400410012); 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2014BSJJ092)

作者简介: 张省(1981—), 河南省桐柏县人, 郑州轻工业学院特聘教授, 管理学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科技创新管理; 袁讯(1993—), 山东省淄博市人, 郑州轻工业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科技创新管理。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战略逐步从资源投入转移到技术创新上来。^[1]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是提升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与社会生产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了揭示创新型经济的本质,回应我国创新高耗低效问题,寻找新常态下的经济驱动力和增长机制,创新3.0被重新定义,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被引入我国。该理论不仅强调企业内部创新资源的协同共生,也关注创新过程中用户的角色、应用的价值、协同的内涵和大众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将创新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也纳入到创新研究中。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超越了现有的市场理论和组织理论,实现了由静态、工程式、机械式的创新系统向动态、生态化、有机式的创新生态系统的范式转变。^[2]近几年国内外创新系统相关研究逐渐增多(见图1),研究主题较为多样(见图2和图3),将创新生态系统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不但有利于推动其在国内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探索如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生态系统。

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研究的主题大致相同,都包含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形成机制、演进路径、案例、构成要素之间的协同关系和创新生态系统延伸领域(如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等)六大模块。但国内外研究主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外关于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和创新生态系统延伸领域的研究比较多,国内关于创新生态系统自身内涵、形成机制的相关文献比较丰富,这表明国内外创新生态系统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形成机制和演进路径具有差异性。鉴于此,本文拟梳理当前国内外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相关文献,尝试澄清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探索创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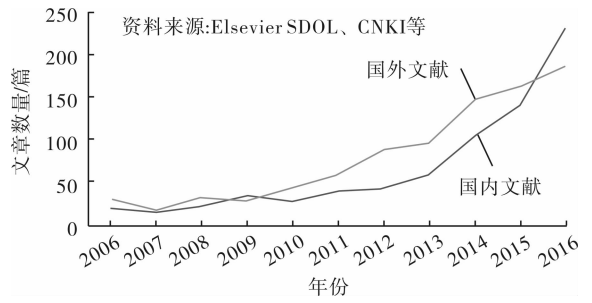


图1 2006—2016年国内外对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研究文献数量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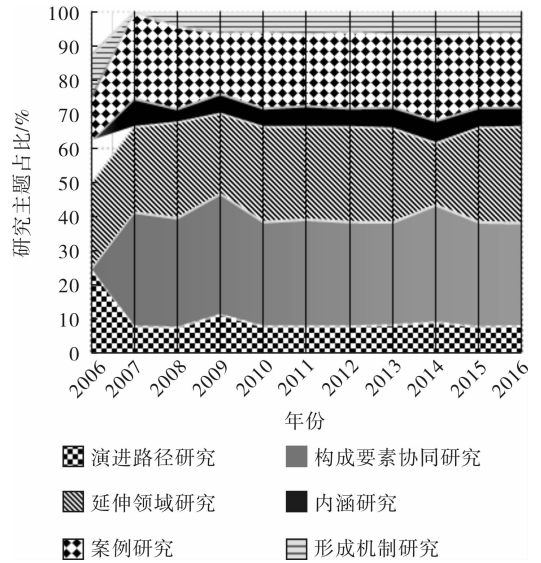


图2 2006—2016年国外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主题百分比堆积面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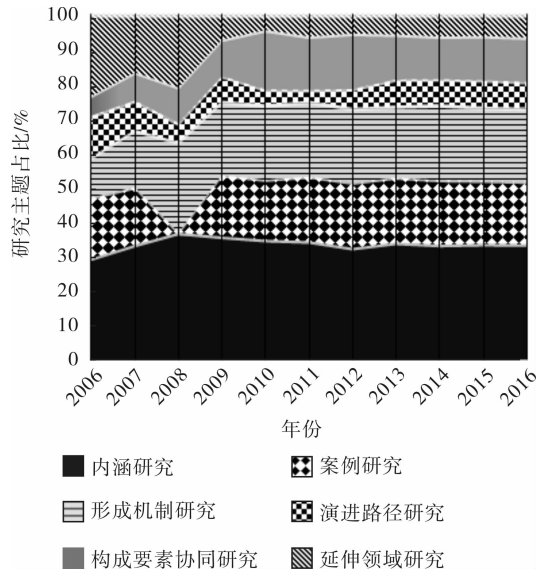


图3 2006—2016年国内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主题百分比堆积面积图

态系统的形成和演进路径,结合相关的实证研究,以明确政府对创新生态系统的作用,并对未来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做出展望。

一、创新生态系统概述

1. 创新生态系统的定义

2004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在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强调创新主体之间及其与其他相关要素之间要形成竞合共生的全新创新体系^[3]。这里的“创新生态系统”,是指用生物科学中生态系统的理论与视角解释创新的内在运行机制,以及如何协调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竞合关系的一种理论范式。现阶段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多以美国硅谷、中国台湾的新竹、印度班加罗尔,以及 iPhone、Hewlett-Packard、Intel 等案例分析为主,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凝练出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定义。

J. F. Moore^[4]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实现单个企业或组织无法实现的利益目的而协同发展的集合体;R. Adner^[5]在研究中打破了创新所局限的商业范围,认为创新生态系统不是简单的商业集合体,而是企业融合相关投入与创新成果进而产生面向市场的可行方案的合作机制;R. Levien^[6]则将创新生态系统看作由处于不同生态位但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的企业构成;吴金希^[7]强调创新生态系统与一般创新系统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一般创新系统不具备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进的特质。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国内外学者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定义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彼此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一是创新生态系统存在于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二是创新主体之间存在非线性的有机联系;三是受政策、市场、技术等外部环境影响显著;四是具有稳定性和独立性的组织共同体。

2. 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

创新生态系统具有一般系统的共同属性,

即整体性、层次性、耗散性、动态性、复杂性与交互性。^[8]除此之外,创新生态系统外在的无机环境与不同创新要素之间相互融合,促使系统整体环境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这使得创新生态系统衍生出三种独立特征。

其一,多样性共生。创新生态系统是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智囊机构和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创新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所构成。^[9]创新生态系统自身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系统内部构成要素的数量和种类与系统维持自身稳定和自我恢复的能力是成正比的,构成要素的全面性与多样性是创新生态系统与一般创新系统之间的重要区别。

其二,自组织演化。创新生态系统需要保持与不同系统之间的差异来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相对于外部的独立特性,创新生态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又是在相互促进中更新换代的。在这种高密度的竞合模式中,协同创新主体、辅助单位等众多要素共生演化成为了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最终途径。自组织演化特性也是创新生态系统与一般创新系统的本质区别。

其三,开放式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从企业、大学、政府三螺旋视角^[10]逐渐过渡到了企业、大学、政府、用户的四螺旋视角^[11],知识、技术和产品终端用户的个体体验越来越受到重视,客户的参与不仅体现在有关创新活动的直接参与,而且可以通过反馈机制间接地促进系统整体创新水平的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不但要求创新主体(产、学、研)之间而且要求部门之间、员工之间保持开放式协同。^[12]

3. 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与各自生态位

1910年,美国学者约翰逊第一次提出“生态位”一词。生态位是指种群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的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作用与联系。^[13]随后,国内外学者

将生态位的概念运用到了战略管理、经济增长等领域。1996年,美国学者 J. Moore^[14]首次将生态位理论运用到商业创新领域,研究商业生态系统中种群与种群之间、群落与群落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以及商业生态系统的平衡机制。本文类比生态系统中生态位的概念,解释创新生态系统中各个构成要素的特性与功能(见图4)。

其一,生产者。作为创新系统的起始端,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机构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是能量的主要供应者,为外界环境与企业提供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生存所必需的能量。例如,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分校和硅谷其他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知识传授与技术研发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出服务社会与智库咨询等职能^[15],根据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统计,该校所衍生出的企业收入占硅谷总收入的55%以上^[16]。

其二,消费者。作为创新的消费者,企业在系统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承接并转化高校和科研院所生产的能量,为市场提供产品与服务。总体而言,企业生态位的主要职能包括生产创新产品或服务、向市场销售创新产品与服务、筹集资金、引进人才和研发创新技术^[17]。除此之外,企业作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经纪人,其自身还担负着反馈的职能,即企业以报告或其他形

式将用户的意见与建议反馈给高校和科研院所,以便在其协助下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得到提升与改善。

其三,分解者。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主要承担将动植物遗体和动物的排泄物等有机物所含的有机成分转化为无机物的责任,自然生态系统中如果没有分解者,物质循环将会中止。类比分解者的生态位,创新生态系统内外的激励机制扮演着无机物的角色^[18],客观需求是有机物的替身^[19],系统中智囊中介组织(金融服务、科技转化)等机构则扮演了创新生态系统中分解者的角色,它从客观需求中获得创新激励点,进而促进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与发展。

其四,无机环境。阳光、水分、空气、无机盐等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无机组成部分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无机环境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基础设施、稳定的创新环境^[20]。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无机环境主要包括政策环境、法律制度、地方文化和习俗等。

二、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及其演进路径

国内外学者将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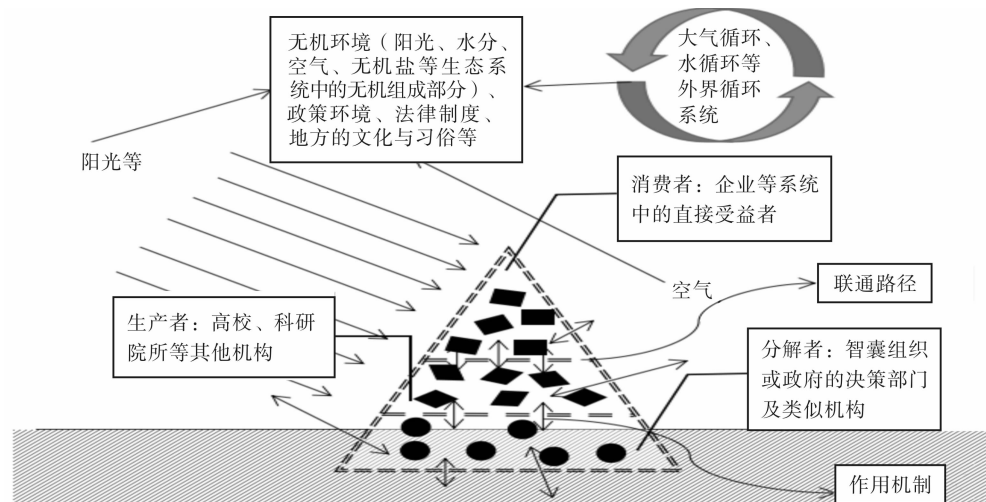


图4 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特性与功能

纳为两种:一种是美国硅谷所代表的市场拉动下的自下而上的自发形成机制^[21];另一种是政府导向下的自上而下的引导形成机制^[22],如中国台湾的新竹、印度的班加罗尔、日本的筑波等。需要强调的是,自发形成机制与引导形成机制的创新生态系统的起始阶段特征虽不同,但其后续发展过程则都是在市场主导与政府调节双重机制下进行的,并且市场机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自发形成机制中,高校或科研院所等研发机构在掌握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对接或创造某种市场需求,通过全资企业或自身附属公司将技术应用到社会生产中。硅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知识产出机构,一直十分重视市场价值和科学价值的转化。现阶段美国政府正在重新审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转化效率,硅谷已经在这一方面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探索^[23]。

严格地说,引导形成机制是硅谷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之后才出现的。当硅谷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代名词时,世界各国都拿它当作创新的典范来学习和模仿。早在1982年,中国台湾就在硅谷设立了专门办公室,以方便与硅谷的沟通。印度地方政府在班加罗尔科技园的建设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24]引导形成机制下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核心点在于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来直接或间接促进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以确保产、学、研、用之间的频繁交流与相互作用,最终营造一个稳定的创新环境。

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与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相伴而生。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是一个整体的动态变化过程,推动变化的动力来源于外部环境的刺激和内部创新主体的驱动。外部环境刺激主要是市场需求和政策激励^[25],内部创新主体驱动主要是指创新生态系统内部

构成要素之间通过竞合的方式来促进个体的发展,进而推动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演进^[26]。比较而言,内部创新主体驱动强调的是政府、市场、企业、用户之间的不断博弈,而外部环境刺激更多的是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权法、公共服务、用户需求等方面的变化来实现的。

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路径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27],根据生态系统的发展时间度量差异,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路径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长时间度量,以系统的进化为主要路径;二是中等时间度量,演进路径主要为群落演替;三是短时间度量,主要以系统内部创新主体的衍生等方式进行演进(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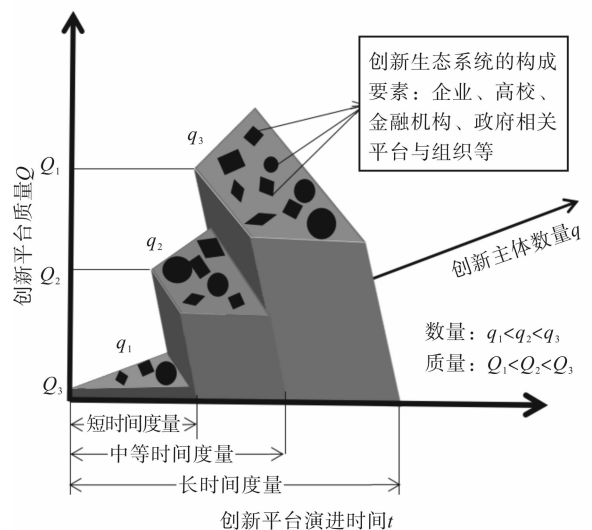


图5 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路径2.5维模型

长时间度量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路径下,创新主体之间通过协同作用,经量变最终完成质变,创新生态系统中以单核心企业为中心的群落逐步演化成为双核心或多核心的结构模式。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与技术研发双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并延伸出服务社会和智库平台等其他职能;政府机构始终保持其宏观政策的灵活性,以适应当下产业集聚升级发展的现状,保证产业演变与创新双效过渡的进程有序进行。

中等时间度量的群落演替路径下,创新生态系统的部分创新主体通过自身的外溢效应已完成了量变过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与知识积累;企业内部结构与管理方法的完善及其外部的延伸(主要包括成立分公司和其他业务的拓展,以及与相关企业的合作);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的不断完善等,在这些因素的协同作用下,部分群落发生进化与演替。

短时间度量的衍生路径下,创新生态系统主要发生的是量变过程,创新主体通过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能量流的累积,对新技术进行吸收与转化,实现自身单体核心能力与技术的生长与再生长,达到自身外溢效应的最大化,同时也为群落的演替做准备。

三、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证研究

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一系列实证分析基础上的,相关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中观区域层面和微观创新主体层面来进行分析的。

E. Almirall 等^[28]认为,在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区域以适当的方式去整合外部资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并以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波士顿、赫尔辛基、纽约和费城 6 座城市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区域的外部资源应当整合为团体合作优势或者竞争性的市场优势。一个区域采取的整合外部资源的方式与方法通常并不是最完善的,有可能被其他潜在的方式所代替^[29],因此,综合的方法应该是在满足所有创新主体需要的条件下来达到创新生态系统内构成要素竞争与合作的需要。辜胜祖^[30]以美国硅谷为案例,对人文精神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地开放的文化、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等人文精神。

D. R. Shaw 等^[31]选择了医疗保健相关企业

作为研究案例,来检测概念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其主要目标是解释开放式的企业竞合模式为何以及如何构成生态系统。Se-Hwa Wu 等^[32]学者以新加坡半导体产业的领头羊联华电子公司(UMC)为例,尝试构建相关理论框架,来解释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共享演进机制与创新发展之间的联系,其结论是提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大学生创业率最直接的方法是从高校的创业培养方式入手。J. Vanevenhoven 等^[33]研究表明,高校与高校之间或与其他各个层次的组织之间合作的紧密程度,与该校在校大学生的创业动机成反比。创业教育作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对于创新文化的培养、创新主体的多样性等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进的过程中,始终都要注重对于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D. H. B. Welsh 等^[34]以美国东南部高校为例,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大学生创业动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高校创业教育体系下学生的创业动机是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形成的最大动力,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态度、动机,以及计划性和勇于接受失败的素质,是催化个人产生创业动机与促使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初期,其作为区域或行业的引擎企业,发挥了重要的领头作用,行业中衍生出了一批将其作为标杆的组织或其他个体,间接推动了产业链的发展。在创新生态系统案例分析中,关于引擎企业如何推动产业平台的整体发展,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C. Park 等^[35]认为,核心企业的形成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有强大的研发资金;二是拥有一批灵活高效且技能娴熟的员工;三是身处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稳定的税收环境;四是有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的支持;五是有一批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1960 年代中期,在美国 IT 行业巨头 IBM 的带动下,一个开放性的系统构架生成和

以 Amdahl 与 Fujitsu 为主导的硬件克隆制造商生态系统诞生,专注于 IBM 客户的软件产品和服务公司出现。^[36] L. Gerstner^[37]认为,在面对创新生态系统中来自其他个体的竞争时,核心企业要灵活改变内部的产业结构,剔除企业内相对薄弱的领域,将市场中的优势领域做强做大,并发挥其自身核心作用,依仗自身所具备而其他竞争者所不具备的知识与技术优势,开拓出全新的市场领域。

四、政府在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进中的作用

政府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进具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创新生态系统中政府的作用,研究的重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政策制定两个方面。关于政府在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进中作用的主要研究见表 1。

作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领导者,政府不仅需要规划整个科技园的布局结构,还需为其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除了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之外,还应包括便利的电子政务系统、为高校或非高校创业教育系统提供快捷有效的平台支撑和其他相关的市政服务)。尽管在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整个阶段都需要这些活动,但在起始阶段,当系统内各个要素如研究院所、本地企业与引资企业、风投机构、金融中心等彼此之间开始联合而缺乏相互联系的结构时,政府的这些活动尤为重要。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尚未形成产业合作平台或者技术共享平台的条件下,政府公共服务系统可以催化相关平台聚合。^[43]例如,创新生态系统中较为完善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是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之一,它可以帮助系统中各个构成要素明确组织间的关系,并为建立科学的文化预备知识体系提供重要的支撑。^[44]另一项重要的政府公共服务是对于创新生态系统成员之间资源流动的组织协

调,这种活动在生态系统形成阶段的后期显得尤为重要。当系统中的资源如技术、资金、人才等开始累积时,需要政府更有秩序与目的性地进行全局掌控。总体而言,政府作为创新生态系统形成阶段的领导者,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活动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是以平台为中心采取关系治理而非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式。^[45]创新生态系统的稳定阶段和发展后期,政府逐渐弱化其领导者角色,更加完善公共服务系统,鼓励创新主体间建立关系专用性资产和生态系统的组织间信任,以逐步减少对于政府组织的依赖。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公共政策制定, M. Mazzucati^[46]认为,公共政策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企业的诞生与成长阶段。许多新兴企业的利益来源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内早期阶段的财政政策支持与政府

表 1 政府在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进中之作用的主要研究

研究者与年份	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
C. J. Schramm (2008) ^[38]	在创新生态系统形成阶段,政府治理的柔性 与刚性举措并用,以平台为目标的公共服务 内容帮助创新生态系统从不稳定阶段逐渐 过渡到稳定阶段
M. Maucato (2011) ^[39]	许多新兴企业在自身成长的早期阶段,其所 在的区域内政府财政政策与技术支持是该 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源动力,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其存活率
A. Gawer (2014) ^[40]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产业平台是加强创新 主体之间联系的重要途径,在尚未形成产 业与技术平台的区域内,政府应催化相关平 台的生成
M. G. Colombo 等(2014) ^[41]	创新主体之间通过竞合的方式不断相互作 用,这个过程受外界环境影响较为明显,适 当、稳定的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能够为创 新主体消除竞合中的障碍
J. Egelin (2016) ^[42]	美国较为成熟的政府公共服务为当地的创 新文化培养和科学知识的储备提供了便利 条件,这是美国创新行业走在世界前列的重 要原因之一

所提供的技术支持,这有助于它们塑造自己的产品与服务。特别是,在不成熟的风投基金市场中,政府提供的资金与技术支持,能减少企业之间的差距,促进新兴企业扩展自己的业务领域。^[47]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过渡时期,政府逐渐放宽原有的政策与规章制度,更加明确产权在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确保创新主体的产权得以合法地、适时地推广运用,从而间接推动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与发展。创新主体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市场的刺激,政府通过营造合适的政策环境可催化创业动机的释放。全球创业观察组织指出,创新生态系统中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通过营造适当的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为创新主体消除竞争中的阻碍,同时使政府服务得到双效的提升。^[48]当然,过度的政策干预会对创新生态系统内的市场环境造成破坏,导致风投金融市场发生扭曲、私募投资者市场发生转移。^[49]

五、结论与展望

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众多要素参与的集合体,其组织与运行正逐渐升级到区域和国家战略层面,创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也正逐步变得更加离散化和复杂化。^[50]相关研究表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核心创新因素绝非是社会的一种简单映射,创新生态系统构架下的社会系统在明晰的治理举措与有形创新主体条件下似乎更能良好地运转。^[21]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现有研究文献,梳理了创新生态系统内涵、形成机制与演进路径、政府定位等相关研究,初步形成如下结论。

其一,国内学者针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很多学者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内部构成要素和系统特征进行了描述与评析,并且部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已经开始应用于国内某些科技园区的建设。就整体的理论框

架而言,较少有学者系统地回顾创新主体之间联动的微观具体过程。

其二,创新生态系统领域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创新要素之间存在共生演化效应,并且创新生态系统会随着不同的时间度量单位而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国内对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证分析已趋于成熟,相较于国内研究而言,国外研究视角已逐渐转移到创业生态系统和引擎企业的研究上。对于后一方面的探索,应成为国内学者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其三,国内外学者对于创新生态系统中政府作用的探索一直关注不足。国内学者在公共政策方面虽做了较为完整的提炼与总结,然而对于政府公共服务与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依旧较为匮乏。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已经逐渐丰富,趋于完善,但当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特征、构成要素等理论层面^[52],以下三个方面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第一,高校或非高校组织创业教育平台的构建。创业教育不仅直接影响创新生态系统的创业层次与发展水平,而且与创新生态系统中创业文化的培养息息相关。^[53]现有研究显示,要想培养年青一代的创业精神,必须改变大学教育中忽视创业教育的现状。美国的教育体系中明确地包含了创业教育,其高校自身与企业、社区平台、非政府机构等组织共同构建了教育系统。这类研究有助于丰富创业创新教育的知识框架,为创业创新教育平台的构建提供参考。国内学者虽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但整体而言,对于创业教育体系的探索仍然鲜有涉足,尤其是对政府在创业教育体系形成过程中如何扮演好协调与引导的角色更是少有研究。今后学者们应当从创业教育平台的构建和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进

之间联系的角度进行研究。

第二,创新文化的培养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创新文化的培养可以在长期内提升并维持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例如,H. Neck 等^[54]认为,文化环境是促进创业生态系统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熊彼特^[55]曾指出,创业文化对于个人来说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能够培养个人的冒险与开拓精神,这对企业家的诞生尤为重要。我国当前的创业文化氛围受传统文化和功利主义的双重影响,并未形成明晰的创业创新文化体系^[56],并且国内现有的实证研究并没有验证创新文化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区域内创业与创新文化的培养,对于核心企业的诞生有重要意义。国内学者应当进一步研究创新文化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第三,创新主体之间联动过程的实证分析。除了上述有关创新生态系统的案例研究之外,国内外还有不少学者做过相关案例分析。例如,吕一博等^[57]通过 ios、Android 与 Symbian 的多案例研究,来解释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成长基因;吴金希^[58]认为,“带土移植”是高校与科研院所科研成果的重要转化形式,并以同方威视作为论证案例;武建龙等^[59]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为例,来探索新能源汽车创新生态系统演进风险及应对策略。国外也有其他类似案例研究。^[60-61]然而,当前实证研究的对象大多局限于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了其他构成要素之间联动关系的案例研究。将来的实证研究应从金融机构与高校之间、银行与新兴企业之间、NGO 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共生共赢关系进行探索,进一步挖掘创新生态系统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与规律。

参考文献:

- [1] 李万,常静,王敏杰,等. 创新 3.0 与创新生态系统[J]. 科学学研究,2014(12):1762.
- [2] MOORE J F. Predators and prey: 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3 (3):75.
- [3]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Innovation America: national innovation initiative summit and report [R].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2004.
- [4] MOORE J F. The rise of a new corporate form [J]. Washington Quarterly, 1998(1):167.
- [5] ADNER R. Match your innovation strategy to y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4):98.
- [6] LEVIEN R. The keystone advantage: What the new dynamic of business ecosystems mean for strategy,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M]. 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4:7.
- [7] 吴金希. 创新生态体系的内涵、特征及其政策含义[J]. 科学学研究, 2014(1):44.
- [8] 颜永才. 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及其治理研究[D].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 2013.
- [9] JANSSEN M, STOOPENDAAL A M, PUTTERS K. Situated novelty: Introducing a process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innovation [J]. Research Policy, 2015(10):1974.
- [10] FITJAR R D, GJELSVIK M, RODRÍGUEZ-POSE A. Organizing product innovation: hierarchy, market or triple-helix networks? [J]. Triple Helix, 2014(3):1.
- [11] CARAYANNIS E, CAMPBELL 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quadruple Helix innovation systems [J]. Mode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Quadruple Helix Innovation Systems, 2012(7):1.
- [12] 龚毅, 刘海廷. 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85.
- [13] POLECHOV J, STORCH D. Ecological niche [J]. Encyclopedia of Ecology, 2008(1):1088.

- [14] MOORE J. The death of competition: Leadership 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business ecosystems [J]. *Ecosystems*, 1996(6):23.
- [15] CHANG Y C, YANG P, MARTIN B R.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ambidexterity: a multilevel analysis [J]. *Technovation*, 2016(54):7.
- [16] 张炜, 郭鲁伟. 从硅谷的产业发展看创新与创业精神集成的重要性 [J]. *中国软科学*, 2003(9):102.
- [17] 罗国锋, 林笑宜. 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及其动力机制 [J]. *学术交流*, 2015(8):119.
- [18] VARGO S, WIELAND H, AKAKA M. Innova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ization: A service ecosystems perspective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5(44):63.
- [19] JACKSON D. Sizing up y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J]. *Translational Materials Research*, 2014(2):20.
- [20] DAWSON G S, DENFORD J C, DESOUZA K F. Governing innovation in U. S. State government: An ecosystem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16(4):299.
- [21] FORMICA P.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 creation of ecosystems of innovation [J]. *Industry & Higher Education*, 1996(10):42.
- [22] 林利剑, 滕堂伟. 世界一流科学园产城融合的分异、趋同及其启示——以硅谷与新竹科学工业园为例 [J]. *科技管理研究*, 2014(8):33.
- [23] 李振国.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研究: 硅谷、新竹、中关村之比较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6):126.
- [24] HACKETT, SEAN M, DAVID M,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business incubation research [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4(29):60.
- [25] SCHROLL A, MILD A. Open innovation modes and the role of internal R&D [J].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1(4):141.
- [26] TRAITLER H, WATZKE H J, SAGUY I S. Reinventing R&D in an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 [J].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2011(2):62.
- [27] KURATKO D F, COVIN J, HORNSBJ S. Why implement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is so difficult [J]. *Business Horizons*, 2014(5):647.
- [28] ALMIRAL E, LEE M, MAJCHR A. Open innovation requires integrated competition ecosystems: Lessons learned from civic open innovation [J]. *Business Horizons*, 2014(3):391.
- [29] AARIKKA-STENROOS L, LEHTIM T. Commercializing a radical innovation: Probing the way to the market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4(8):1372.
- [30] 辜胜祖. 硅谷精神与制度 [N]. *中国经济时报*, 2000-08-24(14).
- [31] SHAW D R, ALLEN T. Studying innovation ecosystems using ecology theory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6(7):342.
- [32] FANG L. Accelerating innovation through knowledge co-evolu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6(33):183.
- [33] VANEVEHOVN J, LIGUOR E.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roduc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ject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3(3):315.
- [34] WELSH D H B, TULLAR W L, NEMATI H.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cess, method, or both? [J].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2016(3):125.
- [35] PARK C, BADEAU R, BIRO L. Research on cooperative R & D game between core enterprise and upstream supplier in supply chain [J]. *Research Policy*, 2011(8):186.
- [36] GRAD B. A personal recollection: IBM's unbundling of software and services [J]. *IEEE Annals of Computing*, 2002(1):64.
- [37] GERSTNER L. Who says elephants can't dance? Inside IBM's history turnaround [M]. New York:

- Harper Business,2002:9.
- [38] SCHRAMM C J. Building entrepreneurial economies[J]. *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2005(1):104.
- [39] MAUCATO M,TANCIONI M. Innovation and idiosyncratic risk:an industry & firmLevel analysis [C]. *The Open Universit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2005:779.
- [40] GAWER A,HENDERSON R. Platform owner entry and innovation in complementary markets:Evidence from Intel [J].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2007(1):1.
- [41] COLOMBO M G, GRILLI L. Founders' human capital and the growth of new technology based firms: A competence-based view [J]. *Research Policy*,2005(6):795.
- [42] EGELN J. Location decision of spin-offs from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J]. *Industry & Innovation*,2004(3):207.
- [43] GAWER A. Bridging differing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J]. *Research Policy*,2014(7):1239.
- [44] EGELN J. Evaluation des existenzgründungs-programms EXIST III [J]. *Research Policy*, 2016(1):104.
- [45] SCHRAMM C. Innovation measurement:Tracking the state of innova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8(7):132.
- [46] MAZZUCAT M.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J].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2011(49):70.
- [47] DEDEHAYIR O, MKINEN S J, ORTT J R. Roles during innovation ecosystem genesis:a literature review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16(1):656.
- [48] GRILLI L, MURTINU S.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and the growth of European high tech entrepreneurial firms [J]. *Research Policy*, 2014(9):1523.
- [49] TIMMONS J A. *New venture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for 21st century* [M]. Boston, MA: McGraw-Hill,1999:6.
- [50] BESSANT J, RAMALINGAM B, RUSH H, et 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ecosystems and humanitarian innovation [M]. *Dfid*,2014:2.
- [51] MOORE J F. And now for 'innovation ecosystems' [J]. *Outlook on Science Policy*,2004(4):27.
- [52] 李其玮,顾新,赵长轶.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综述:一个层次分析框架[J]. *科学管理研究*,2016(1):14.
- [53] HILGERS L. 李开复能否解决中国的科技难题 [J]. *商业周刊*,2013(17):68.
- [54] NECK H, MEYER D, COHEN B, et al. An entrepreneurial system view of new venture creation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2004(2):190.
- [55]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孔伟艳,朱攀峰,娄季芳,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52.
- [56] 张秀娥,祁伟宏. 美国硅谷创业生态系统环境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18):59.
- [57] 吕一博,蓝青,韩少杰.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成长基因[J]. *中国工业经济*,2015(5):148.
- [58] 吴金希. 从“带土移植”到创建创新生态体系——基于同方威视的探索案例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5(4):66.
- [59] 武建龙,刘家洋. 新能源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风险及应对策略——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为例 [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71.
- [60] WEIL H B, SABHLOK V P, COONEY C.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ecosystems:A case study of the US biofuel market [J]. *Energy Strategy Reviews*,2014(3):88.
- [61] FUKUDA K, WATANABE. Japanese and US perspectives o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J]. *Technology in Society*,2008(1):49.



引用格式:王颖,何况.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绿色发展道路探讨[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4):48-53.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048-06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绿色发展道路探讨

Discuss of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path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

王颖,何况

WANG Ying, HE Kuang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思路。但是目前政府引领绿色发展中的职能发挥尚不充分,企业缺乏绿色发展动力,公众绿色消费理念淡薄。要促进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政府应做好绿色发展道路顶层设计,明确建设生态型政府的角色担当,加大对绿色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健全有助于推动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企业应制定绿色发展战略,树立绿色生产观,加大绿色生产技术创新力度,制定绿色营销策略;公民应培养绿色消费习惯,实现“负责任地消费”,“倒逼”商品和服务供给的绿色化,从而促进绿色市场、绿色生产的形成。

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
绿色发展;
生态型政府;
绿色消费

收稿日期:2016-07-31

作者简介:王颖(1969—),女,吉林省长岭县人,吉林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何况(1991—),男,河南省信阳市人,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提供了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绿色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强调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同时注重从绿色发展的角度出发,为推进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开拓新思路,提供新路径。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并不矛盾,“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1]。因此,只有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正确认识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资源观和“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经济发展观,才能兼顾发展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一、绿色发展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世纪初,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各项经济指标居于世界前列,国家治理体系逐渐完善,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与过去30年相比,“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深刻的生产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2]。把握经济运行的整体态势,认识、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是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走势。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使其进入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我国的经济发

展迫切需要以新的发展理念为指导。绿色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以合理消费、低排放、低消耗、生态资本不断增加为基本特征,以创造绿

色财富和增加人类的绿色福利为根本目标;走绿色发展之路不再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转而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资源优化配置,促使经济发展从要素、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为经济进入新常态开启新途径。

1. 绿色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过去依靠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将逐渐被淘汰。相应地,以绿色发展为主题,依靠科技、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为支撑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绿色发展理念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以牺牲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用优惠条件吸引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发展方式将受到制约。在此阶段,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企业为地方政府转变当地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机遇。绿色发展是对黑色工业文明的扬弃,这种先进的经济发展理念是人类为自我救赎而进行的一场深刻革命。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速度由高速变为中高速,就当前中国国情来说是合理的,是总结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正反经验后的必然选择。

2. 绿色发展为经济结构调整助力

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近些年来,虽然说我国的二、三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就产业发展水平、内部结构来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其一,走绿色发展之路会促进新兴产业兴起,特别是会促进绿色环保产业快速发展。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和新能源技术的进步,给新兴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这也间接地减少了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需求,从源头上压缩了黑色工业的发展空间,从而促进了

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二,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企业调整发展模式,淘汰落后生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率,能够减少单位工业品的资源消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效益。就国民经济整体而言,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么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要么被淘汰,使国民经济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其三,走绿色发展之路,企业发展不再单纯依靠某种自然资源或工业原料,而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目的,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说,绿色发展将使企业的经营模式发生根本转变,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助力。

3. 绿色发展是从源头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与传统的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走绿色发展之路,更加注重的是创新驱动。首先,互联网平台的出现,尤其是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兴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虚拟平台与传统行业相结合,产生巨大的产能,这些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走绿色发展之路,不仅使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更重要的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次,绿色低碳发展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走绿色发展之路从根本上说就是走创新之路,是转变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企业来说,引进先进技术、变革发展动力、增强环保意识,不仅是企业引领行业方向的航标,也是在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这样的生产方式将是发展经济的根本动力源泉。绿色发展不仅表现在企业的资源要素是绿色的,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生产过程也是环境友好的,这种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将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发展。

二、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绿色发展道路存在的问题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之路,是引

领我国经济与生态文明转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但绿色发展毕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现阶段,我国在推进绿色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政府引领绿色发展的职能发挥不充分;企业缺乏绿色发展动力,也缺乏技术和资金支持;公众的绿色消费理念淡薄。这些都是绿色发展道路推行过程中的巨大阻力。

1. 政府引领绿色发展的职能发挥不充分

政府在绿色发展中应该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制定绿色发展标准和法律法规,出台相关政策,为绿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二是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激励企业、公众走绿色发展之路;三是引导和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四是与企业、科研机构合作,研发新技术,开发新能源。在绿色发展中,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应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建立健全绿色市场体系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开展各种形式的绿色发展专项活动,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中,未能全面贯彻中央精神,存在只学习不作为的问题,没有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首先,在绿色发展过程中,政府引领绿色发展的责任不明晰,相关职能部门分工不明确,尤其是对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存在许多不足。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大多与当地的GDP指数挂钩,很少有具体的生态环境考核指标,导致政府政绩和企业利益被绑到一起,所以地方政府很难真正地监管企业。其次,绿色发展的相关立法不完善,环保执法部门执法权限过小,以及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实,使企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在职能上还不适应绿色发展的要求,存在对绿色经济支持力度不够和执法监督机制

不健全等问题。因此,需要不断强化政府在绿色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2. 企业缺乏绿色发展动力

企业既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也是资源的消耗者和环境的污染者,因此企业是绿色发展的主角。无论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进行技术创新,企业都发挥着主体作用。企业主体作用发挥得好,我国的绿色发展之路就顺畅;企业主体作用发挥得不好,我国的绿色发展道路就受阻。

我国企业的资源利用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据统计,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平均为55%,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和25%,万元GDP用水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倍^[3]。这表明我国企业在绿色发展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绿色发展模式与传统发展模式有很大不同,绿色环保技术需要长期投入资金来保证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正常运行。现阶段,我国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实力相对薄弱,无力承担长期的资金投入。另外,部分企业缺乏研发和应用绿色技术的动力,未能走出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路径,资源利用率和单位工业品的“三废”排放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使用不清洁能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种发展模式与绿色发展道路和生态文明建设是背道而驰的。

3. 公众的绿色消费理念淡薄

随着改造自然能力的逐渐增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人类无节制地向自然界索取,大量排放废弃物,远远超过了自然界的承载能力。过度和盲目消费加剧了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人们消费理念落后、没有养成绿色消费习惯的表征。

由于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的时间不长,我国对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尚未形成体系,企业和公众对绿色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够深刻。对于普

通民众来说,虽然对绿色发展、绿色消费有一定的认识,但离真正理解其含义并将绿色消费融入日常生活仍有很大差距。另外,日常生活中还存在过度消费、攀比消费、超前消费等非理性、不健康的消费行为,需要我们加以正确引导。

三、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应有对策

实现经济新常态与生态文明新常态协同并进是我们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的根本出路。坚持绿色发展对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常态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推进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常态的主要途径,也是今后我们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推进绿色发展是一项涉及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系统工程,为了加快绿色发展步伐,我们应分别从政府、企业、公众三个方面,找准绿色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1. 政府应做好绿色发展道路顶层设计

(1) 明确建设生态型政府的角色担当

首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的“采用先进适用节能低碳环保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服务业,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4]的要求,政府应出台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并将其融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入贯彻到经济建设的每一个细节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应“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加快发展绿色产业”^[5];应积极支持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行业的发展,限制高污染、高能耗的黑色工业的发展,积极支持、引导绿色经济并将之作为建设生态型政府的发展目标。

其次,应协调环保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处理好治理环境污染与发展绿色经济的关系,环

保部门不能像过去那样只针对某些环保问题采取局部措施,应增强责任意识,改变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从改革机制体制出发,制定合理的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政策,致力于从根源上解决高污染、高排放等问题,并促进企业开源节流和整体效益的提高。中央制定政策也要与地方实际情况相结合,政策主要起指导性作用,具体实施还需要地方政府结合实际制定细则。只有做好角色定位,建设生态型政府,才能为实现经济新常态与生态文明新常态协同并进贡献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6]。

(2) 加大对绿色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

绿色发展相对应的经济形式是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是21世纪最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经济形式之一。绿色经济以经济和环境和谐发展为目的,具有强劲的发展动力,但在早期阶段,其发展还不成熟,发展规模小、发展速度慢。究其原因,从政府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绿色产业在税收和财政政策上支持力度不够。尽管我国对低污染低耗能企业予以一定的税收优惠,但是综合考虑成本因素,绿色产业的财税优惠并不明显,因此,应加大税收监管和对绿色经济的税收优惠支持力度。此外,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目前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还不完善,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难度比较大,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财政支持,完善绿色发展技术创新机制,不断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联动效应,深入推进我国的绿色经济发展。

(3) 健全有助于推动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

绿色发展理念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只有把绿色发展理念转化成法律意志,才能规范社会中存在的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使政府的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曾经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7]因此,健全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对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至关重要。

在制定绿色发展相关法律法规时,首先,应处理好生态问题与各个相关环节的联系,根据违法现象出现的原因,制定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还要与时俱进,注重法律的实效性,同时也要明确政府的责任,把政府的责任写入法律法规中。其次,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使违法成本远远大于违法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引入“记日处罚”等累计处罚方法,增加对企业责令停产、吊销营业执照等严厉处罚,不断增强环境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并对造成重大环境问题的相关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最后,要增强公民对绿色发展法律法规的认识,促使公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使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2. 企业应制定绿色发展战略

绿色发展理念是今后整个社会的发展思路,绿色发展模式需要每个主体参与。具体到企业,就是要制定绿色盈利的发展战略,从绿色生产、绿色技术创新到绿色营销,企业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都要始终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的经营模式。

(1) 树立绿色生产观

企业应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以推广节能环保产品拉动消费需求,以增强节能环保工程技术能力拉动投资增长”^[4]。现阶段,我国企业资源利用率较低,工业“三废”排放量较大,这不仅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还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环境问题。企业应改变以往认为绿色发展会限制企业发展的错误认识,积极推行绿色生产,使用清洁能源,改进并逐步淘汰高能耗的生产工艺和机器设备,引进

先进的生产技术,使企业更好地发展绿色产业。因此,树立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相结合的绿色生产观是企业坚持绿色发展的关键。

(2) 加大绿色生产技术创新力度

应“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对绿色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的决定性作用”^[4],使绿色产业的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前进的动力和方向。改进生产工艺、发展绿色生产技术,是企业解决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的根本举措。此外,应建立、完善绿色技术转化机制,提高企业开发绿色技术的积极性,促进全社会形成研究绿色技术的热潮。完善技术创新体制是企业实现绿色发展的保障,只有促进政府与企业的通力合作,并加强与外界的交流,才能使企业的绿色发展成为可能。

(3) 制定绿色营销策略

生产过程的完成只是企业绿色发展流程的一半,只有把企业的产品通过绿色可持续的营销手段推向市场,让广大消费者感受到高效、优质资源的使用效果,才能达到企业实现绿色发展的最终目的。从设计、生产、销售到回收,绿色营销的每个环节都应高效、灵活配合,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形成从信息收集、产品生产到废弃物回收的整个营销供应链绿色组合。同时还应宣传绿色发展的企业文化,这不仅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也会使消费者更容易接受绿色发展理念。

3. 公众应养成绿色消费习惯

从经济学上讲,消费决定生产,消费需求引导着整个生产过程。然而,事实上需求主要是由消费习惯决定的,所以消费习惯对企业的生产至关重要。据调查测算,使用10平方米太阳能热水器,每年可节约1.8吨标准煤;每年使用太阳能电池1000兆瓦,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00万吨。^[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和环保意识,坚持绿色发展、绿色

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呵护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9]为了更好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促使社会形成发展的新风尚,公众应从改变自身的消费习惯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反对奢侈消费和过度消费,培养健康绿色的消费观,树立崇尚自然、健康绿色的消费观,实现“负责任地消费”。只有社会公众绿色意识的觉醒才能促进绿色市场的形成。^[10]社会公众绿色消费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商品和服务供给的绿色化,从而促进企业实现向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4.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9.
- [3]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全球格局变化中的中国绿色经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2.
-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04-25(01).
- [5] 杨卓舒.“绿色化”不是空洞口号[N].中国建设报,2015-04-08(01).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C].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88.
- [7] 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光明日报,2013-05-25(01).
- [8] 黄娟.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思考[J].创新,2016(1):91.
- [9] 习近平.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2010-04-11(01).
- [10] 刘昌勇.关于我国企业开发绿色产品的思考[J].经济师,2012(9):51.



引用格式:谢浩.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影响与趋势[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8(4):54-6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054-09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影响与趋势

The essence, influence and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谢浩

XIE Hao

南京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不是一个中性概念? 这一问题是国内外学者界定经济全球化概念的一个重要分歧。无论是从沃勒斯坦所说的“长的16世纪”算起, 还是从布罗代尔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算起,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都折射出了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然而,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过程, 呈现出全球经济走向深度一体化的趋势。因此, 当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作为总的过程和趋势的中性的经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这个也更能解释为何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全球繁荣的同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影响, 产生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中国参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必须妥善处理好全球化中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政府的市场增进功能, 既要优化市场环境吸引资本, 为我所用; 又要优化政府职能驾驭资本, 避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当下, 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方向仍然是自身发展, 通过强化民生体验抵销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增强中国的全球化福利。展望未来, 中国经济全球化应该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通过参与方式的改变, 在一个十分漫长的时间里完成由“世界之中国”到“中国之世界”的转变。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资本主义;
跨国公司;
现代化

收稿日期:2016-12-26

作者简介:谢浩(1990—),男,安徽省合肥市人,南京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流行于1980—1990年代的全球化概念,在新旧世纪之交成了国内外学界的热议话题。大量关于全球化的观点在这个时间段集中出现,经济全球化更是一度几乎成了全球化研究的全部内容。如今,经济全球化已逐渐被全球治理、全球价值链等概念取代。这个取代和更新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研究逐步走向普遍和具体。世界经济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不断丰富并赋予经济全球化以新的内涵,也为中国进一步了解其本质与发展趋势、深度参与全球化,提供了更多有益参考和启示。

一、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除了对经济全球化表面特征的描述相对统一外,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性质存在很大争议。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了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将经济全球化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体分析,其真实面貌便逐渐显现出来。

1. 多角度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一词是一个舶来品,关于它的定义最初多出自于西方学者和国际组织,国内研究大多以此为主要依据。新旧世纪交替时,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主要有三种,即要素流动论、经济依存论、资本决定论。这三个角度基本确定了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由表及里的立体概念,全面呈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表象特征、关系特征和本质特征。世界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由此可见,国际官方机构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基本上是基于技术或物质层面将经济全球

化理解为一个更小的自由世界。法国学者雅克·阿达等人显然不满足于对全球化作这样的定义,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世界的支配和控制”。这与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界定颇为相似,都是将经济全球化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化的过程,其本质是资本全球化。于是,吉登斯的“拓展的现代性”和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等说法就为人们津津乐道。E. Iltis 更是结合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现实,直接指出:经济全球化即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国际化,即全球美国化。^[2]

上述国外学者对经济全球化三个角度的界定或多或少影响着国内学者。不过,国内学者在研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试图呈现一个更精确的经济全球化概念。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只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一个过程或一系列过程,由此对之作出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广义的全球化泛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产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拓展和加深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则特指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西方世界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向着一体化方向加快变化的趋势。”^[3]目前,政治经济学领域所提及的经济全球化,显然是广义的全球化。另外,经济全球化还可以从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来进行界定:“前者主要指世界时空的压缩,……世界越来越‘小’了;后者则指全球意识的加强。”^[4]基于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压缩的时空是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最直接的主观感受,而隐藏在经济全球化背后复杂的全球意识、全球思维或全球主义更值得关注。

尽管学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仍有分歧,但普遍强调经济全球化即是自由市场全球化,表现为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单元的紧密联系;抑或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

质,是资本肆虐、剥削和支配全球。这些为我们理解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大体精确的界定,为我们立体地、多角度地了解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2. 作为一系列过程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源于何时?学界对此众说纷纭。不同学科对经济全球化或全球化起源时间的判定有早有晚,具体见表1。不同于其他学者在全球史领域对欧洲中心论的推崇,美国学者扬·内德温·彼埃特思主张将全球化的历史起点拉长到公元前3000年,从青铜时期开始计算属于东方全球化的起始时间,之后的全球化过程相继是罗马全球化、东非全球化、欧洲全球化、21世纪全球化等阶段。^[5]

由表1可见,学界关于经济全球化起始点的主流划分主要集中在15世纪末和20世纪末两个时间上(这两个时间的确定基本上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划定),学者们更倾向于将全球化的历史追溯到15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在马克思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长期专注于世界体系研究的西方学者沃勒斯坦认为,全球化发端于“长的16世纪”(1480—1620年);而布罗代尔、汤姆·雷弗则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并非“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内陆,而是起源于13—14世纪的意

大利城市国家”^[6]。只不过在初始阶段,经济全球化更多表现为局部全球化,这可谓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因此,主流经济全球化或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发端于“长的16世纪”的欧洲。

笔者认为,较为全面、普遍的全球化的形成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物质条件,即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被打破并被联系起来,如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持续发现新大陆,并通过商业贸易和联通技术建立起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精神条件,即全球思维或全球意识不断蔓延至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为世界各地主动融入全球经济提供观念支撑。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本文倾向认为,主流经济全球化发端于欧洲,起始于“长的16世纪”。不同阶段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作的划分见表2。

3. 并行不悖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需要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分期中寻找线索。中立者基于经济要素自由流动,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性质区分。至于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是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的现实体现,属于人类道德调节的范畴,需要通过建立国际

表1 全球化研究的学科分类、起源时间与核心问题

学科分类	起源时间	机构和领域	核心问题
政治学/国际关系	1980年	国家间的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	竞争国家、战后国际政治、全球公民
发展研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债务危机、结构调整政策
地理		空间、地点	本地与全球化的互动、全球化的在地化
经济学	1970年	跨国合作、技术、银行、金融、对冲基金	全球合作、世界生产、全球利益链、 新经济、主权财富基金
文化研究	1950年	媒体、影视、广告、传媒技术	地球村、麦当劳化、融合
哲学		伦理学	全球问题、全球伦理
社会学	1800年	现代性	资本主义、工业化、城镇化、民族国家
政治经济学	1500年	现代资本主义	征服世界市场
历史/人类史	公元前3000年	人口迁徙、贸易、技术、世界宗教	扩大的社会合作、全球流动与居住

注:根据扬·内德温·彼埃特思《分期中的全球化:全球化的诸历史》^[5]中全球化分期稍作调整得此表。

表2 主流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大致分期

经济全球化阶段	时间划分	特征	意识形态
西欧的全球化	15世纪—18世纪晚期	原始积累、对外贸易	重商主义
英国治下的全球化	19世纪初—20世纪中期	自由资本主义、殖民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美国治下的全球化	20世纪中期—20世界末	多边主义、福利国家、跨国公司	嵌入式自由主义
21世纪的全球化	进入21世纪至今	全球公司、地区主义	新自由主义

政治经济新秩序来解决。^[6]而全球化的批判者或怀疑者多数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认定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全球化。他们所持的论据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推动者是资产阶级,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直接表现为同时加剧了国际层面国家间、国内阶级间的两极分化等。

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之争,看似无关痛痒,实则影响深远,事关世界经济的公平性。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作为中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二者并不矛盾。之所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中性概念,是将其放在全球史中考察而得出的。经济全球化在局部地区的预演并没掺入意识形态的因素,东方、罗马等局部全球化尽管不符合整体全球化的条件,但真实地在前资本主义历史中存在过,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全球化完全也可以表现为其他属性或混合属性。当然,当下的经济全球化的确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这一性质主要取决于当下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优势的生产方式和诸如重商主义或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此,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中性的,具体阶段表现出的性质取决于当时占优势的生产方式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宣称要带给世界以自由和繁荣,然而几百年的全球化在带来全球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资本流向世界,财富流向西方”的全球体验。一直以来,资本对生产的支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享有的

全球话语权,导致北方得利远远大于南方。但就全球化的一般趋势来说,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不二选择。

1. 经济全球化进程回顾

尽管全球史中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中性概念,但近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或主流经济全球化表现出了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文艺复兴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萌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商主义开始兴起和发展,并成为影响国家政策和社会观念的重要价值取向,其对财富近乎疯狂的追求,不断刺激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人突破地理限制,寻求更大规模对外贸易的可能和途径。新大陆的发现主要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欲望驱动。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渐次发展,资本积累日益需要国外市场来容纳机器大工业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都伴有殖民他国的强烈欲望,急于建立和拓展专属殖民市场以满足本国日益扩大的商品生产。此时的经济全球化虽已初具国际规模,然而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主要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市场争夺及其对所属殖民地的控制,如此“肤浅的全球化”显然不能满足全面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欧洲大陆的需要。于是,基于绝对成本优势或相对成本优势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方案应运而生,它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困难。当时英国对国际贸易的极大需求,促使其急切地想建立一个符合自身需要的自由市场。谷物法案废除、英法《科布登条约》的签订等,意味着英国为推进自由贸易进行了许多努力。尽管如此,

世界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主要表现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权力游戏及其对所属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几无秩序可言的世界市场争夺,使得资本主义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野蛮生长,它不但没有实现古典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自由世界,反而接连将世界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演变为世界战争,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一度停滞。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竞相争夺和宗主国对附属国的残酷剥削。对宗主国来说,它是自由的全球化;而对附属国来说,它是强制的全球化。这一模式的典型和巅峰是具有强烈殖民色彩的英国治下的经济全球化。^[7]

二战以降,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过渡到美国手中。美国治下的经济全球化有其自身特点。凯恩斯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作了修正,赋予国家以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权力,提升了国家调控危机和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战后美国凭借其绝对的工业实力、军事优势获得主导性的话语权,它所提供的全球方案迎合了西方世界对全球秩序的设想。其主导的几大国际组织的成立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美国治下的全球化基本促成了美国资本自由畅行世界,美国商品、文化全球流行,美国在事实上引领并深化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这一阶段,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色彩不像此前那样野蛮和血腥,变得相对内敛和低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制度的设计和话语权的控制等方面,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未变。

20世纪末,由于苏东剧变,与资本主义世界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几近坍塌,资本主义世界随之将自由市场经济拓展至广大发展中国家,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华盛顿模式开始风靡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全球化的所有利益诉求都隐藏在貌似公平的所谓新自

由主义的世界设计中。这一阶段,美日欧三角同盟或G7集团开始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雅尔塔体系崩塌之后,由于意识到利用国家身份干预别国经济政治生活的敏感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转向综合利用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资本的力量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制或诱导发展中国家接受包括自由市场、私有制和政治民主等在内的华盛顿模式。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已很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行为中直接寻觅,资本对现有世界经济的支配深深藏匿在现有国际制度、国际分工和全球话语设置与安排上。然而,殖民时代的遗产、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等均可在现有全球秩序安排上找到。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关联甚密。资本主义相继经历了自由竞争时期、垄断的民族国家化时期和经济全球化时期。在这三个不同时期,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都具有不同特色,整个全球化过程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有着密切联系,从而形成了具有不同治理特色、不同意识形态的今日世界秩序。

2. 经济全球化的正负效应

相比英、美治下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财富明火执仗地剥夺或有失公平地分配,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已经变得难以捉摸。尽管如此,敏感的经济学家仍然从现有经济现状中窥得经济全球化引致世界经济走向消极的趋势。对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批判或怀疑主要来自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基于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得出的一系列观点,批判者的批判、怀疑者的怀疑,跟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变更不断推陈出新。继发现经济全球化背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身份之后,他们的发现和收获不断丰富,得出一个定论: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导致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支配边缘国家的悲观结局^[8],学者 S. Amin

并列了四个例证:持续扩大的数字鸿沟不断证实经济全球化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世界范围的南北分化和各国国内的贫富不均的加剧^[9];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资本权力急剧膨胀,力求实现所在地的政治私有化,各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面临的资本考验与日俱增;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成为常态^[10],此次世纪交替前后世界范围的系列危机,说明毫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必将引致国际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所谓全球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西方现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冲突此刻正在此起彼伏地进行着。

身处同一个经济全球化进程,南北国家的全球化体验截然不同。症结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在全球范围占有绝对的优势,其凭借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牢牢掌握着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另一方面,凭借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优势,资本主义主要国家牢牢掌控着全球话语权。然而,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虽由资本主义主导,其结果却不全为其所控制,如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如中国经济的全球崛起。经济全球化过程的系列制度安排和秩序设计,为各国参与全球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模式和规则,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获得了利益。只是这种利益并非均匀分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获得的利益可能在总体上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11]但是,经济全球化总体上也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个总体有序的时代背景和经济上崛起的希望。地理上愈加紧密联系的地球,制度上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等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总体上是所有参与者均可共享的。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审慎地走向繁荣的途径和可能。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通用技术与世界各地

开展经贸往来,也可以通过世界市场获取资本、技术等本国急需的发展要素,从而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尽管其主导者曾一度、并且也将继续为世界带来不公平,但是它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提供了一般环境和基础条件。

三、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与发展趋势

本应是中性的经济全球化在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时,利益分配上总是更加倾向于发达国家,其根源在于发达国家享有全球范围的经济优势,垄断了经济全球化的话语权——市场自由、经济公平、环境保护、财富分配的标准都由其决定,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全球化过程的被动参与者。表面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由经济占优的强国决定,而在更深层次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曲折过程同民族国家与跨国资本之间的同向或反向运动总体上是契合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可从这样的矛盾运动中发现。

1. 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经济全球化看似国家间的权力角逐,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亟需扩大生产、市场,以不断增加财富的跨国资本,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直接行为主体。而在不平衡的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相较于地域上的限制,民族国家保护本土经济、抵制跨国资本扩张的举措是制约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因素。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扩张的力量并非只限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开始逐渐向外扩大自身影响。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保守的力量也开始

在发达国家内部占据上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国家内部普遍的双重全球化力量就成为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因素。

今天,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13] 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各地因资本的跨国运动愈发密切地被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联系起来,世界不断变小的空间体验日益深刻;二是规模不断扩大的资本(公司)不断突破国家、民族限制,寻求建立全球性生产网络,“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结构日益将世界各地的生产纳入其中;三是日具全球规模的跨国资本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的财富分配规则,使世界经济分化为剥削别国的“北方”和遭受剥削的“南方”两部分的倾向越发严重。跨国公司的发展代表了发达国家政府支持的私人资本的全球扩张,其在全球活动中的行动逻辑、组织形式和话语体系始终要求建立一个充分实现自由化、私有化的世界市场,而这恰恰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行动蓝图。遍布全球的私人垄断资本善于将自身利益外化为国家主义甚至是全球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跨国资本的逻辑和意愿。16世纪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性质,归根结底在于资本突破国家限制在全球范围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古典自由主义、嵌入式自由主义和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先后代表着不同全球化阶段跨国资本的现实利益。21世纪以降,新自由主义成为向全球扩散的主流意识形态,欧美法律条款、标准体系推及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生产中的支配地位得以巩固等,自然都是“因为跨国公司的头面人物操纵了全球化的进程,并使之成为他们的利益服务”^[14]。总的说来,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最直接的推动者,而经济全球化则代表了这一直接主体的主要利益。

它们自由配置全球资源的最大障碍或许来自国家权力,但国家权力有时也是促进其实现全球分布的重要力量。

推动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另一重要力量是民族国家与跨国资本之间的矛盾运动,它构成了全球化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球化输出国极力营造本土公司实现海外扩张的经济环境;另一方面,东道主国家既希望吸收跨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又力图抗拒经济私有化与政治自由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输出国、超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逐渐发展成为可与东道主国政府抗衡的准政治机构,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用其经济和政治优势对东道主国家施压,其主要结果就是勒特韦克所说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压倒了政治的逻辑和民主的逻辑。冷战结束后,一大批东欧国家在“自由世界”的号召下取经西方,转向经济私有化、政治自由化的发展道路。然而,全球化浪潮中国家主权的让位并没有实现西方世界的自由和繁荣,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痛、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危机使其至今仍在经济、政治方面徘徊不前。反观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战后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国家构建与融入全球化的有机结合,使得东亚模式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15]。尽管“跨国公司去母国化”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但是谁都清楚政治介入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所有参与者都极其重要,关键是输出国或东道主国家如何介入的问题,其中涉及国家职能、国家权力、国家能力等一系列问题。东亚主要国家的崛起说明,国家主权并非经济全球化的障碍,适当的政治介入会使本地经济主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竞争。正如查默斯·约翰逊所强调的,政府可通过经济、政治手段引导本国产业更富竞争力地参与全球经济。总的说来,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较

量,更多表现为跨国公司与本地政府及其所属经济实体之间的博弈,二者能否有机结合的关键,在于政府主体能否趋利避害,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加强民生体验等。^[16]

2.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因跨国资本的利益诉求,全球各地的生产要素会不断突破地理、民族和国家的限制实现自由流动。从这一角度出发,经济全球化的终极目标是全球经济的深度一体化。16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过程正是一个由浅至深的渐进过程:经济贸易形式从殖民时代单向的洲际贸易,到二战后频繁的国际贸易,再到21世纪互联网经济介入之后日益一体化的普遍全球贸易,其中的参与主体越来越细化至个人、越来越丰富至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毋庸置疑,随着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和本土企业等全球化行为主体日益被卷入全球生产网络,世界经济将会持续走向深刻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跨国资本(公司)和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进程的最重要的行为主体^[17],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促进本土企业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意愿和努力会更加强烈,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将在全球经济总体消极的环境中日趋剧烈,逆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也会随之长期存在;发展中国家将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一是立足本国市场保护本土企业,二是制定政策促进本土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三是逐渐按照自身诉求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或者至少可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地区主义将会成为不均衡发展世界经济实现全球化的主要形式^[18],局部的双边或多边贸易体系将会是全球共识无法达成之后全球化合作的次优方案;全球一体化的技术条件日益成熟,参与生产和积累的全球循环的行为体从国家、地区逐渐向经济个体转变,全球经济循环将更加注重经济个体的参与,

经济个体间即时、双向互动是全球化技术发展的总趋势,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新的全球化形态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平衡的,经济全球化没有限制反而丰富了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全球经济深度一体化最终实现的前提是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全球贸易的公平性不再需要局部政治保证,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价值也会逐渐消失。

四、结语

从世界史看,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总体上是中性的,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在不同历史分期中的特征和性质需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具体分析。16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占优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这一阶段经济全球化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性质。具体而言,英、美治下的经济全球化的共同特点,是政治权力协助本国资本实现全球积累。世界范围的资本力量的非均衡性发展和资本日益支配全球生产的趋势,固化了南、北方迥异的全球化体验。尽管南方国家存在较为普遍的消极的自由主义感受,但经济全球化仍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跨国公司和政治介入对北方国家主导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而后发国家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的关键在于本国政府的市场增进功能的发挥。未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将是各全球化行为主体围绕全球价值链展开广泛的激烈竞争和深度合作。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积极表现,丰富了全球化的多样性,加快并促进了世界的多极化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多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趋势,大大丰富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多极世界、各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家权威,全球经济或全球主义的内容,终究会因为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或多或少地变化。中国经济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也是完成由“世界之中国”向“中国之世界”转变的过程。

可以预期,在21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将会全面拓展到政治、文化、生活等非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发展中国家不仅要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强制,还需应对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既受经济全球化的强烈正面影响又对经济全球化施以侧面影响的重要阶段。我国不但要以自身的制度优势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还要着力消减和抵御全球化对我国的西化。尽管意识形态对于实现国内政治团结的作用显而易见,但以经济发展凝聚社会共识仍是重要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功能的持续发挥,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对外更好实现全球互动,但重点是如何通过政府力量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强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普通民众的民生体验,以消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普通民众因为漫长等待和社会福利的全球性比较而可能出现的失望情绪。这既是社会主义中国借助经济全球化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也是中国经济实现深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国内基础。

参考文献:

-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7: 45.
- [2] LUTTWAK E. Turbo-Capitalism: winner & los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M]. HarperCollins, 2000: 34.
- [3] 董金明. 马克思全球化理论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之比较[J]. 理论月刊, 2006(1): 28.
- [4] ROBERSON R.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M]. London England Sage, 1992: 135.
- [5] 扬·内德温·彼埃特思. 分期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诸历史[J]. 国外理论动态, 2013(1): 11.
- [6] 汤姆·雷弗·乔万尼·阿瑞吉: 资本的绘图师[J]. 张焕君, 王志超,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1(3): 89.
- [7] 吴志鹏, 方伟珠, 陈时兴. 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与评价[J]. 世界经济研究, 2003(1): 33.
- [8] 李滨. 无政府下的世界秩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7): 11.
- [9] AMIN S.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M]. Sirirajmedj Com, 1990(100): 7.
- [10] 房宁.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进程[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2): 143.
- [11] 张礼卿. 经济全球化的成因、利益和代价[J]. 世界经济, 1999(8): 54.
- [12] 赵汇, 吴涛. 透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学术界[J]. 2005(6): 159.
- [13] 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6: 1.
- [14] 程恩富, 朱富强. 经济全球化: 若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00(7): 31.
- [15] HADLEY E M.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 - 1975 [J]. Sais Review, 1984(1): 192.
- [16] 金碚. 论经济全球化 3.0 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1): 16.
- [17] 雅库布·哈拉比. 全球治理扩展至第三世界: 利他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J]. 国外理论动态, 2014(8): 30.
- [18] 门洪华. 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J]. 开放导报, 2005(3): 26.



引用格式:阮小雪. 智能制造对我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4): 63-69.

中图分类号: F42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9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4-0063-07

智能制造对我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n China's labor demand

阮小雪

RUAN Xiao-xue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信息产业是我国智能制造的主要应用领域。智能制造对我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链上劳动力转移;二是在减少一些工作岗位的同时会创造许多新的工作岗位,从而催生全新的就业机会;三是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新的要求。借鉴德国应对“工业4.0”经验,为应对智能制造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我国企业应加大技能型劳动力的培养力度,吸引高端人才,鼓励创新;教育机构应创新职业技术培养模式,更加注重智能制造所需技能的培训;政府部门应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大力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自主创业环境。

关键词:

智能制造;
工业4.0;
就业替代;
劳动力需求

收稿日期: 2017-03-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YJA790002)

作者简介: 阮小雪(1991—),女,四川省资阳市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例如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英国发布《英国工业2050战略》等,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一方面,高端制造业纷纷回归发达国家,同时,中低端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制造业面临高端回流和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外部形势严峻;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制造业发展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要素成本等都在发生动态变化,制造业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为了应对制造业面临的国内外严峻形势,我国在2015年提出制造业强国战略——《中国制造2025》,并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目标是使我国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这一战略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热烈讨论。智能制造既是技术革命也是产业革命,将对生产模式、制造方式、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等产生巨大影响,最终会带动原有的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作为社会生产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其需求将会受到智能制造怎样的影响?中国的智能制造到底是创造就业还是“摧毁就业”?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历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新技术将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带来重要影响,相适应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对新技术的成功推广也至关重要。鉴于此,本文拟基于德国“工业4.0”相关研究,重点分析智能制造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作用,并建议政府提前做好人才储备,以便顺利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

一、智能制造的内涵

智能制造最早由美国学者Wright和Bourne于1998年在其专著《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一书中提出,认为智能制造是对信息工程和制造软件集成而形成的系统,以实现机器进行

命令的无人操作生产过程。该定义为智能制造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中国关于智能制造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宋天虎^[2]认为,智能制造是生产管理结构网络化、工作方式并行化、组织形式自主化和动态化、生产反应敏捷化的机器进化过程;杨叔子等^[3]认为,智能制造是集智能和技术的人机一体化系统,具备自我管理能力和柔性,并能对复杂的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熊有伦等^[4]认为,智能制造可以理解为数字制造,具体体现为数字车间、数字企业和数字服务;卢秉恒等^[5]认为,智能制造是制造技术、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的制造系统,具备感知、分析、推理、决策、控制等功能。显然,当前智能制造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上述定义。国内关于智能制造的专著《智能制造》于2016年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综合国内外对智能制造概念的研究,从三个维度对智能制造进行了定义:第一个维度是从生产技术出发对智能制造进行解读,认为智能制造是生产过程的智能化,通过各种智能技术(大数据、云技术、物联网、3D打印等)改进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第二个维度是根据产出物对智能制造进行解读,认为智能制造的最终目的是提供各类智能工业品和智能消费品,即实现最终产品的智能化;第三个维度是从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角度对智能制造进行解读,认为智能制造是一个涵盖产业链和创新链所有环节、涵盖又超越传统硬件和装备的大系统,包含设计、制造、物流、销售、服务等关键环节的智能化。^[6-7]

二、智能制造的主要应用领域与发展趋势

1. 智能制造的主要应用领域

企业是否采用智能制造技术主要考虑三点:一是采用智能制造技术的成本是否小于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二是劳动力的素质(技能)是

否达到了产品制造的精度、硬度等对其的要求,或劳动力是否能适应当前生产环境和条件;三是行业采用智能制造技术的难易程度。^[8-9]根据这三个标准,按照行业的固有特点可以初步预测各行业智能化推进程度。平均工资水平较高的行业主要有采矿业、制造业、水电等动力部门、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和金融业,其中,采矿业和水电等动力部门由于生产条件受自然环境限制,采用智能制造技术的难度较大,因此行业智能化程度相对较低。金融业高素质劳动力占比较大,智能制造代替高素质劳动力的难度较大,因此智能制造技术进入的壁垒较高。农业部门拥有相对丰裕且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远低于智能制造技术成本,智能化推进程度最低。相比之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的智能化推进程度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原因在于,首先,这三个行业属于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力需求总量较大,仅仅制造业一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总量就接近社会总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劳动力总成本压力较大;其次,这三个行业所有生产环节基本上都需要机器协作生产,只需要采用智能装备或者智能系统就可以实现智能制造。因而这三个行业采用智能制造技术容易得多,这也与现实情况相吻合,即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是我国目前智能制造技术运用最多、技术最成熟的行业,成为智能制造布局的主要应用领域。生物制药、精密仪器、高端装备等产业对生产环境和技术要求高,成为必须进行生产智能化的行业,而建筑业和批发零售、物流等服务业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成为推进智能化潜力较大的行业。

2. 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

智能制造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只有从企业装备智能化到整个智能生态系统完成才称得上是完整意义上实现了智能制造。由于世界各国技术水平的差异,各国各行业间智能化水平参

差不齐。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意大利智能化总体水平为14%~16%,但是化工和金属行业智能化程度只有1%;美国的交通工具产业智能化程度最大潜力是53%,但是目前智能化水平只达到8%^[10]。就连制造技术遥遥领先的德国,波士顿研究报告预测其实现“工业4.0”的完全转型至少需要20年之久^[11]。我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智能化发展的速度和进程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智能化发展是在“工业2.0”完全完成和“工业3.0”将要结束的时候开始布局“工业4.0”的,采取的是一种“串联式”的发展路径;而我国发展智能制造的背景是既要补课、以发展不完全的“工业2.0”,又要普及发展不充分的“工业3.0”,走的是“工业2.0”—“工业3.0”—“工业4.0”试点的“并联式”发展路径。根据智能制造发展阶段的重点内容和目标,可以将我国智能制造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5—2020年,全面普及“数控一代”,推广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传统行业基本实现数字化和自动化生产,并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开展智能制造试点。

第二阶段:2020—2025年,完成“数控一代”扫尾,大力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系统建设,智能制造体系基本建立,重点产业初步实现向智能制造的转型。

第三阶段:2025—2035年,建设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培育智能制造生态系统,使制造业从“第三方阵”进入到“第二方阵”。

目前我国的智能制造还处在试点阶段,试点的行业主要集中于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交通工具等十大重点产业,试点产业的区域布局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城市,产业试点优先选择拥有较强工业基础,以及资本要素、人力资源等具有比较优势的沿海城市,西

部地区的城市基本上不在试点布局考虑之内。^[12]

三、智能制造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1. 推动产业链上劳动力转移

智能制造作为先进的制造技术,将彻底改变产品的设计、制造、运营和服务等整个生产系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改变就业结构。以德国为例,未来10年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将加入“工业4.0”,制造业生产效率将提升15%~25%,制造业总成本将节约5%~8%,约为900亿~1500亿欧元,效率提升预计每年将为企业带来新增收入300亿欧元,约占彼时年GDP的1%。^[11]智能制造带来的经济增长将带动就业人数提高6%,预计将创造39万个工作岗位,智能制造更加普及的行业就业创造效应更加明显,如装备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将增加10%左右。^[12]

中国和德国都是制造大国,但由于技术上的差距比较大,我国发展智能制造和德国推进“工业4.0”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程度也会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因为我国目前还处于智能制造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普及“数控一代”和智能

制造试点阶段,要达到德国未来10年“工业4.0”对生产效率和劳动力影响的效应水平,我国需要进入智能制造的第三阶段,即智能制造生态系统初步建立的阶段;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德国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较大,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加工、组装、零部件生产等技术含量低、增值空间小的价值链环节上,且这部分劳动力以农业转移人口为主,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总体偏低,而德国制造业以装备制造业为主,高素质的技能型劳动力占比较大。因此,智能制造对我国制造业的就业创造效应短期内不甚明显,甚至还会有就业挤出效应发生。从短期看,自动化技术渗入会代替部分技术含量低、重复率高的人工劳作,智能制造技术的采用则会加速机器对人的替代。根据微笑曲线示意图(见图1),智能制造技术应用最多的是生产和组装环节,因此智能制造将对附加值低的生产、组装环节的劳动力产生较大的替代作用,大量劳动力将被挤出生产、组装岗位,而与此同时,智能制造将在附加值较高的研究设计和售后服务环节产生较大的就业创造效应。从长期看,制造业从业者、智能系统供应商、消费者都将受到智能制造的影响,智能技术带来的生产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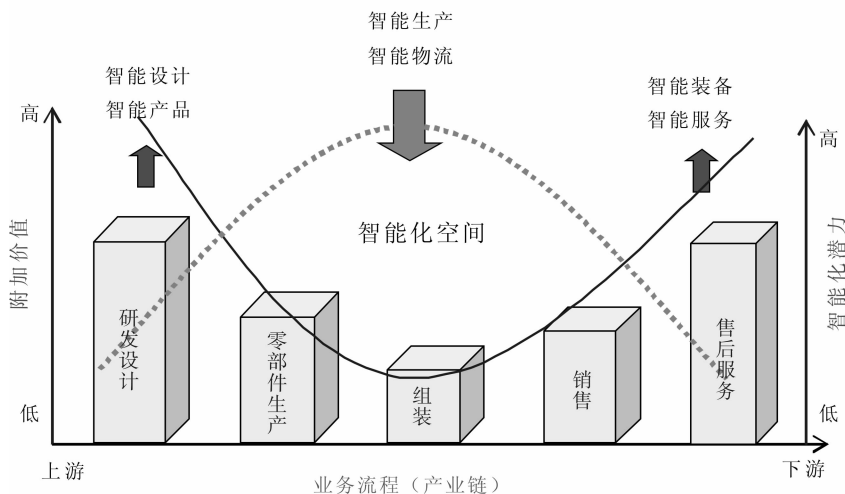


图1 智能制造微笑曲线示意图

的提高会促进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总量。

2. 在削减工作岗位的同时会催生全新的就业机会

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在带来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减少了达到相同产量所需劳动力的耗费,尽管有些岗位会消失,但是人机合作会更加紧密。首先,企业会减少操作简单、重复率高的岗位的劳动力需求,此类岗位的减少主要源于机器人在生产车间的运用,机器人代替劳动力工作并实现标准化操作;其次,常规的认知型岗位也将减少,主要源于常规工作的管理实现计算机化操作。但是,智能制造在削减工作岗位的同时,更会催生出全新的工作岗位需求,如机器人协调员、工业数据分析师等。以德国为例,“工业4.0”带来的就业效应因行业和岗位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未来10年机器人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预测将减少61万个组装和生产类岗位,其中生产类岗位将减少12万个,占生产类岗位的4%,质量管理类岗位将减少2万个,占质量管理类岗位的8%;但新增的96万个工作岗位将抵消掉工作岗位的减少数量,其中IT、分析、研发领域的岗位需求量将翻倍,预计新增就业岗位将会达到11万个,并额外需求21万个高技术人才,此外“工业4.0”带来的额外增长收入也将带来76万个消费领域岗位需求,这些都是新增就业机会的来源。^[13]智能制造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与“工业4.0”对德国就业的影响类似,在削减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催生出全新的就业机会。至于智能制造尤其是工业机器人将在何种程度上替代劳动力仍然是目前讨论的热点,学术界存在较多的分歧,但是大家一致的观点是:企业尤其是制造型企业,将越来越多地采用机器人和其他智能系统来进行人机结合生产;智能制造技术主要是通过物理手段和软件系统来辅助人类提高生产力,而不是完全

取代人类,相反,那些需要灵活反应、具备个性化、定制化能力的工作岗位对劳动力需求将会增多。值得一提的是,智能制造技术还会使许多就业前景堪忧的工人从中受益,比如机器人辅助对体力要求高的岗位进行协作生产,这样年长的工人就可以适当延长工作年限,从而缓解未来人类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压力。

3. 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新的要求

为了更好地在智能时代高效工作,智能制造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引入智能制造技术以后,制造业的制造流程和管理方式随之会进行调整,制造业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和组装环节的低技能工人将会被机器人替代,而机器人维护、调试、控制等技术性岗位需求增多,技术性工人要掌握多种硬技能,包括生产环节的具体工作或者生产流程的专门知识(主要指机器操作或者零部件更换)与计算机技能(包括最基础的电子表格、页面访问、高级程序编写、数据分析等)。其次,对劳动力多种硬技能的需求意味着软技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尤其是智能制造技术带来的新岗位,如工业数据科学家和机器人协调员等,劳动者不仅需要具备数字化设备和软件的使用能力,还要有能力使用数字化知识库。最后,在产业层面,智能制造技术将带动产业升级,特别是制造业高级化将会大大增加知识型和高技术型人才需求,与此同时智能制造技术也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增加对服务业人才的需求。

四、适应智能制造的劳动力培养对策

智能制造技术将进一步加剧人才的争夺,由于缺乏符合智能制造需要的专门人才,以及当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技能型劳动力储备不足的问题。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城市频频出

现的技工荒,充分暴露了我国技能型劳动力存在严重的缺口。我国智能制造的发展对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将更加旺盛,智能制造试点城市尤甚。为了顺应智能制造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企业、教育机构和政府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人才储备不足问题,保证智能制造的顺利实施。

1. 企业应为智能制造“养兵买马”

我国制造业相对其他行业而言拥有强大的工业劳动力基础,劳动力就业规模也相当大(占总就业人口的1/3),智能制造的最新技术大多也被制造企业所掌握,因此制造业企业理应成为智能制造劳动力培养的中坚力量。鉴于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且劳动力以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为主,加之农村转移至城市的劳动力占比较大,企业的在职培训环节应该根据劳动力素质情况因材施教。对于生产环节的低技能劳动力,企业应根据具体的工作技能要求设计相应的培训项目,把非技术人员培养成某个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以提高其应用技术的能力。考虑到智能技术更新换代较快,企业还应教育员工对技术变革持积极态度,鼓励员工自主学习,以适应新的工作流程和变革。对于技术人员或者专业人员,企业应当安排多种技能培训,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培训,使这部分人具备完成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对于研发设计环节的高端人才,企业应制定全新的人才引进战略,为智能制造“招兵买马”,吸引高端人才流入,同时还应制定全新的管理策略,激励创新。

2. 教育机构应创新职业技术教育模式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2030年德国仅制造业部门的技能型劳动力缺口就将达到580万~770万。我国智能制造当前还处在试点阶段,技工荒已经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随着智能制造的持续推进,我国技能型劳动力缺口

还将越来越大。这一现状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职业教育。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项目相对单一,不同领域教育机构之间缺乏交流,所培养的劳动力技能单一。为了满足智能制造对跨职能、跨专业、跨领域的多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必须对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进行创新。在职业教育培养模式上,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二元制”或者日本的“产学合作”职业教育模式,这两种模式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培养技术型劳动力的最佳模式,尤其适合培育智能制造需要的技能型劳动力。在培训内容上,应更加注重智能制造新岗位所需的技能,根据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调整课程设置,如融合更多的IT和工程学知识的跨学科项目等。此外,职业教育还应与企业的在职教育区别开来,着重传授企业在职教育培训缺少的知识和技能,包括理论和原理等;在培训工具上,智能制造时代要求工业劳动力随时随地进行知识“充电”,传统的教室和工厂定点授课已经不能满足智能制造时代劳动力受教育的需求,教育工具创新势在必行,如建立在线学习平台和开发手机学习应用软件等。

3. 政府应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

为了使智能制造技术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协助劳动力提高技能以便更好地符合企业需求,政府应为智能制造“量身”提供基础设施。首先,应普及技术型基础设施,尤其是普及信息基础设施,以保证劳动力随时随地都能接触到信息技术并能享受到信息技术服务。其次,应大力支持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使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潜力,促进劳动力从生产部门进入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我国就业结构升级。最后,针对智能制造的就业替代效应,尤其是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替代,政府应营造一个良好的自主创业环境,从创业培训、资金扶持等方面对下岗职工自主创业给予支持,尤其是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提

供支持。

参考文献:

- [1] Wright P K, Bourne D A.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M]. New Jersey: Addison-Wesley, 1988: 35 - 50.
- [2] 宋天虎. 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与未来[J]. 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1999(1): 6.
- [3] 杨叔子, 吴波. 先进制造技术及其发展趋势[J]. 机械工程学报, 2003, (10): 73.
- [4] 熊有伦, 王瑜辉, 杨文玉, 等. 数字制造与数字装备[J]. 航空制造技术, 2008(9): 26.
- [5] 卢秉恒, 李涤尘. 增材制造(3D 打印)技术发展[J].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3(42): 1.
- [6]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 智能制造[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5.
- [7] 王喜文. 智能制造 中国制造 2025 的主攻方向[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9.
- [8] 邓洲. 工业机器人发展及其对就业的影响[J]. 地方财政研究, 2016(6): 25.
- [9] 蔡秀玲, 高文群. 中国智能制造对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的影响[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 68.
- [10] 波士顿咨询公司. How Robots Will Redefine Competitiveness [EB/OL]. (2016 - 05 - 17) [2017 - 01 - 20]. <https://www.bcgperspectives.com/content/articles/lean-manufacturing-innovation-robots-redefine-competitiveness>.
- [11] 波士顿咨询公司. 工业 4.0 未来生产力与制造业发展前景 [EB/OL]. (2016 - 05 - 17) [2017 - 01 - 20]. http://www.bcg.com.cn/export/sites/default/cn/files/publications/reports_pdf/BCG_Industry_40_Future_of_Productivity_May_2016_CHN.pdf.
- [12] 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2016—2020 年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EB/OL]. (2016 - 01 - 10) [2017 - 01 - 20]. <http://www.ocn.com.cn/chanye/201601/omuo25102443.shtml>.
- [13] 波士顿咨询公司. 工业 4.0 时代的人机关系 [EB/OL]. (2016 - 11 - 23) [2017 - 01 - 20]. <https://www.imxdata.com/archives/7537>.



引用格式:冯宸.从价值学说看实体经济的虚拟化[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4):70-74.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070-05

从价值学说看实体经济的虚拟化

The virtualiz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theory

冯宸

FENG Chen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8

摘要:虚拟财富不同于过去我们对于一般财富的定义,又与通常我们所说的数字化的财产、非实体化的财产形式如网络游戏空间中存在的财物不同,它是指股票、债券、票据、金融衍生品等各种在金融市场交易的金融产品。使用、占有的权利并不是所有权即财产性权益的核心,真正构成财产性权益核心的是自由(任意)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一切财产权利得以实现的关键是交易的可实现性。如果说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那么虚拟财产就是可增值性与价值的统一体。实体经济虚拟化在当下无疑会给衰弱的实体经济注入活力,然而虚拟经济的高涨会导致实体经济的资本流出,同时使得整个经济被资产价格高度绑架。

关键词:

财产性权益;
交易的可实现性;
可增值性;
虚拟经济

收稿日期:2016-12-20

作者简介:冯宸(1988—),男,安徽省庐江县人,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价值是经济学的基础范畴,对于价值的争论往往决定了经济学说体系的走向。目前学界对于价值的研究多是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的效应价值论的对立,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结构涉及较少。本文拟从财产的法律定义入手,将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置于一个对立统一的框架体系之中,从价值学说审视实体经济的虚拟化,以期有助于规避实体经济虚拟化的负效应,推动我国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财产性权益的本质

财富分为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实体财富通常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实体,如粮食、家具、煤炭等,它们能满足人们的一定需要。虚拟财富不同于过去我们对于一般财富的定义,又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数字化的财产、非物化的财产形式如网络游戏空间中存在的财物不同,它是指构成虚拟经济主要内容的股票、债券、票据、金融衍生品等各种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金融产品^[1]。究竟如何定义财产性权益?我们可以借助于法律上对于财产的定义来理解和界定。通常,法律上给予物权保护的,我们都视之为财产。因为物权上的保护不同于债权上的保护,它是绝对、更为有力的保护,同时它是只具有权利而不需负担义务的。而对于我们未能视之为财产的合同等,法律上的保护要弱得多。实际上,财富的定义是与财产法内容的扩充密切相关的,英国普通法尤其典型。不同于成文法国家,英国的财产法律不是由议员来制定的,而是由律师和法官基于一个个判例而逐渐形成文字的。

法律上对于财产性权益的内容有如下规定:一是占有的权利,例如别人拿了你的东西,你就有权利要求他返还;二是使用的权利,例如一块土地,你可以耕种获取收益;三是转让的权

利,即你可以把财产卖给任何人;四是担保的权利,即你可以把财产抵押给别人以获取贷款。如果拥有这四项权利,我们通常就可以认定其为财产或财富了。那么这四项权利中哪项权利最为根本呢?为此需要追溯所有权的起源。人类社会早期是不存在土地所有权概念的。古代的国王把一块土地封给了贵族,并不意味着贵族就获得了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是获得了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农奴的管理权。对于其封地上的农奴,领主也是互负权利和义务的。在西欧封建主义的框架下,地主和附庸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都有约定的自由,也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2]例如,领主要负责农奴的安全、遵守土地使用上约定俗成的习惯(如公共领地自由放牧)、不得任意退佃等。正因为如此,与罗马法复兴所带来的所有权运动相对应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其实质就是把之前领主时代的管理权绝对化为自己的所有权,其具体表现就是禁止佃农在公共领地放牧即圈地。由此可见,使用、占有的权利并不是所有权即财产性权益的核心,它们在所有权诞生之前就广泛存在了。真正构成所有权即财产性权益核心的是自由(任意)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

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从反面得到证明,具体案例就是英国长期国债的诞生。在长期国债诞生之前,债务是要还的,债权人的目的是要收到本金和利息。但是,英国长期国债改变了这一原则,持有长期国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吃利息,原因是基于国债的物权化。而国债物权化的实现不仅在于英国政府的良好信用,还在于国债市场的出现使得人们持有的国债只要愿意便可以换成现金。在某种意义上,英国长期国债变成了英国政府的股票。由此可见,能否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最关键的便是转让)是财产性权益的核心。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卖出去即有转让它的市场,便可以称之为财产。

以此作为衡量标准,诸多虚拟财富诞生的路径便变得清晰多了。

虚拟财富的核心便是债务的物权化和再物权化,其主要代表形式便是证券。任何一笔债务只要进行评级打包上市,它便神奇地变成了某种财富。而债务并不仅限于双方间的借款,而是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有的甚至近似于赌博。但是只要标准化为某种证券,只要存在交易此种证券的市场,就会诞生出多种多样的虚拟财产。

其实,如果回溯到人类更早期的历史,我们同样会发现交易的可实现性不仅是虚拟财产诞生的必要条件,同样也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实体财产诞生的必要条件。在原始社会,牧民对于实物、土地的私有观念并不是很强,甚至并不存在偷盗的概念。偷盗的概念是私有制诞生后才有的,初期由于人们没有自我概念,因此也无偷盗的意识。促使私有制诞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物质能够交换,而在其诞生前,物质对于人们的作用无非是使用而已,并不存在你的、我的之分。由此可见,交易的可实现性是一切财产权利得以实现的关键。

二、虚拟财产的使用价值和可增值性

按照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人们参与交易或交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商品的使用价值,例如我们买桃子就是为了吃它。如果以此观点来衡量虚拟财产的话,就会存在很大的矛盾:因为虚拟财产对于人们来说,不具备物质层面的可使用性。如果仅仅认为虚拟财产可以卖掉换成货币,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持有货币呢?对此,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无法解释的,这就暴露了它的局限性。

人们通常将商品定义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那么对于虚拟财产应该怎么界定?人

们持有虚拟财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其背后的实体财产,这与传统财产观根本不同。虚拟财产的唯一作用在于人们认为它们将来可以通过倒卖而增值。也就是说,按照传统定义,虚拟财产就是可增值性与价值的统一体。人们购买虚拟财产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增值。以股票为例,当股民认为股票会上涨即增值的时候,就会购买,从而推动股票价格的上涨;如果股民预估股票会跌的话,就会抛售,股票的价格就会随之下降。但是下降并不是无限的,总有一些股民会抄底即认为可能还会涨;如果股民都认定了这只股票只会永远跌下去的,那么这只股票就会被退市,从而失去作为财产资格。

我们可以借此分析一下亚当·斯密的价值悖论^[3]:价值有时候会由劳动决定,有时会由供求决定,即价值徘徊在客观价值论与主观价值论之间。我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进行探讨。一是就实体的物质生产而言,人们购买这些物品是冲着其使用价值的,如工厂生产的帽子,其价值是由所付出的劳动量决定的;二是就虚拟财产而言,人们持有它们的目的,究其根本是为了增值。例如,人们购买的国债,作为纸质的债券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没有物质层面的使用价值,人们拥有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来增值套现。在增值的判断上,人们对于经济形势、产业发展、供求关系的主观判断是起主要作用的,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市场预估。典型的例子是财经媒体的一条爆料可能扰乱市场,使相关虚拟财产(比如股票)升值或贬值。

故此,我们从亚当·斯密的价值悖论中可以发现两套完全迥异的逻辑体系交叉叠加的框架:一套是生产体系,即客观价值论的体系,其主要目的是生产有用的物品;一套是资本体系,即主观价值论的体系,其目的是为了增值。从亚当·斯密的著作可以看出,他是偏重于生产体系而反对资本体系的,故此他在其论著中,试

图统一资本体系和生产体系,所以其价值论出现了悖论。而对于后世的学者而言,究竟是偏重于生产体系还是资本体系,就取决于客观价值论与主观价值论之间的斗争。总体而言,资本体系即主观价值论占据上风。这从现实中不同企业经营模式对体系偏重的不同中可见一斑。当代企业经营模式大体可分为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日德模式偏重制造业,其管理层大多由本公司诞生,其经营目标倾向于长期发展和产品经营;而英美模式相对偏重金融运作,其管理层都是高薪聘请来的,其价值定位为资产增值,经营手段相对短期,热衷于并购、重组等,以达到迅速增值的目的。从财产持有方式来看,日德模式倾向精于某一行业,如丰田、三菱,为此他们与银行相互持股;而英美模式则倾向于不停地更换经营对象,只要达到了利润目的即可脱手,如哈默,其经营范围涵盖了制药、外贸、石油、养牛等行业。可见,虚拟财产本质上是资本体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充分、完整地体现了资本的发展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就是金融家的世界、投行的世界,即虚拟财产高度膨胀的世界,这正是近年来金融危机往往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

三、实体经济虚拟化的资本作用解析

讨论实体经济虚拟化的前景,必须研究的是生产体系和资本体系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只有这样,才能弄明白在当下虚拟经济作为资本体系的代表,是如何发展壮大起来的。

历史地看,生产体系和资本体系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并列的。这是由于传统的实业生产的利润率并不足以吸引借贷行业介入,借贷行业的对象大多是远洋贸易和大富豪这样的大客户。这里的传统实业生产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它们的资本积累主要依靠自己。而真正促

使资本体系和生产体系结合的动因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它大大提高了实业生产的利润,进而为借贷行业进入生产领域打开了大门。

工业革命之所以能提高实业生产的利润,并不在于其生产工艺的改进或是产品的创新,因为这些只能从量上而不能从质上改变经济结构,而在于能源革命即煤炭、石油的引入^[4],改变了人类长达几千年使用生物能的时代,尤其化学能的介入更使利润空间大大拓展。惟其如此,在早期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将煤炭比喻为“黑金子”。

中国长达几百年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为什么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是因为我们早期金融体系虽有晋商票号,早期手工业虽有江南的纺织业,但没有煤炭。重化工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于机械大工业虽然显得技术含量较低,但全面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本。这个降低无论是对其他行业的发展、规模效应的形成,还是对科技创新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理,当今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中,问题也是出在社会生产成本普遍高涨这一问题上。所以,资本的介入是与工业化同步的。也就是说,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生产成本下降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承受通过借贷来发展生产的压力。工业革命带来的另一大变化,是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及其预估。在传统农业社会,受限于生物能的便捷,经济起伏的周期很大,人们很难形成稳定增长的预估。稳定增长的预估是信用扩充、利息下降的前提,这使工业革命从成本下降和信用扩充两个方面促成了生产体系与资本体系的结合。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资本体系的介入对于生产体系的改造和提升也是巨大的。一方面,资本体系对于资本的迅速动员力使得原本潜藏的生产力完全被动员起来。相对于其他动员体系,资本的动员是最为灵活、最为节省的办法,

因为它的载体只是货币,最多只有黄金运输的费用。另一方面,资本体系促进了经济核算原则在生产体系中的确立。资本体系与生产体系的结合绝不是投资者与使用者的简单合作,而是要将资本体系的灵魂深深地嵌入生产体系之中。这个灵魂便是利润至上原则,反映在生产中便是经济核算。如果回顾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会发现很多对于生产田园诗歌般的描述,尽管有失实之处,但是对比象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电影《摩登时代》,其差别是很明显的。对于利润的渴求,使得资本体系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永动机”——不停地鞭策生产的改造。

所以,生产体系与资本体系的结合点(中介)是利润率。资本体系有个基准利率,只有高于这个标准的企业才能生存,若低于此便只有破产。另外,资本体系的基准利率是不断调整的。工业革命的作用恰恰就在于让整个社会的利润率高于当时资本体系的基准利率。不过,对于资本体系而言,除工业革命引发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所带来的利息率的下降外,基准利率是倾向于上升的。同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5]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体系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那么,一旦生产体系的利润率又重新低于资本体系的基准利率,生产体系与资本体系的分离会不会再度出现呢?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阻止生产体系利润率下降的办法固然很多,但根本的还是由于使用了廉价的能源。所以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伴随着煤炭、石油的使用,本质上是能源的两次革命。

总之,虚拟经济的发展需要从两个角度来

看:一方面,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滑自然会使得大量资本停留在实体经济之外,转而投向证券等虚拟经济;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滑与资本基准利率的提高,会使整个经济体系面临着生产体系与资本体系再度分离的风险,这种代价无疑是巨大且不能承受的,在科技革命迟迟未到的情况下,只有采取扩大信用的办法即俗称的“放水”来化解。此种“放水”并不是通过扩大借贷来实现,而是通过实体经济虚拟化的办法,即在一个企业中提高虚拟产业的比例,利用虚拟经济的利润来弥补实体经济的利润。

实体经济虚拟化在当下无疑会给衰弱的实体经济注入活力,然而虚拟经济的高涨会带来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同时会吸引实体经济的资本流出;二是实体经济虚拟化使得整个经济高度被资产价格所绑架,从而使资产价格的下降成为全社会不可承受的代价,进而成为经济深层改革的阻力。

参考文献:

- [1] 张仁德,王昭凤. 虚拟财富与真实财富——与刘骏民教授商榷[J]. 天津社会科学, 2004(02):99.
- [2] 沈汉. 英格兰中世纪的土地保有权和各种身份的土地持有者[J]. 贵州社会科学, 2010(10): 117.
- [3]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 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25.
- [4] 罗伯特·艾伦. 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探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121.
-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237.



引用格式:李欣. 中国古诗中的春节习俗文化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4): 75-81.

中图分类号:K892.1;I207.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075-07

中国古诗中的春节习俗文化研究

Study on the culture of Spring Festival customs in Chinese ancient poetry

李欣

LI Xin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春节习俗如除尘、祭祖、饮岁酒、放爆竹、除夕守岁、贴春联、拜年等活动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和美好记忆。古往今来,这些春节习俗被写入诗词,广为流传。这些年俗诗或生动形象、客观真实地记录春节习俗文化;或表达新年人们迎新的欢喜心情和阖家团圆的伦理亲情;或感叹时光易逝,抒发人生感慨。时至今日,春节习俗文化已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乡愁,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传承春节习俗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也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关键词:

春节习俗;

年俗诗;

文化传承

收稿日期:2017-06-02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SH002)

作者简介:李欣(1964—),女,河南省武陟县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的文化产物。千百年来,中国人在生活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风俗习惯,相沿成习、世代相传。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盛大、最热闹、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和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追求和情感寄托,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家庭和社会伦理观念。春节习俗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影响深远,已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习俗如扫尘、祭祖、贴春联年画、除夕守岁、放爆竹、拜年等活动,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和美好记忆。古往今来,一些春节习俗被文学大家写入诗词,成为千古流芳的名诗佳句。这些名句有的被写入春联,成为人们节日吟诵的热点。比如,元稹、高适、曹松、来鹄、文天祥等著名诗人都曾写过同名诗词《除夜》;著名诗人王安石在《元日》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些作为春节的标志性诗句被人们广为流传。如今,这些描写春节的古诗名句已成为春节文化的元素之一,与其他春节文化一起被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光大。

目前,研究春节习俗文化的著述较多,研究古诗词的文章也较多见,但从文化传承角度,探寻古诗词中春节习俗文化的文章比较少见。鉴于此,本文拟以古诗里的春节习俗为主题,谈谈春节习俗文化传承之我见。

一、中国古诗中的春节习俗

春节,民间称“新年”,欢度春节就是过年。春节起源于殷商,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武帝时代。春节的节期较长,而且各地不同。有的地方春节从腊月初八开始到元宵节结束,有的从“祭灶”(腊月二十三,另说二十四)一直到正月

十六(另说正月十八),但共识是除夕和正月初一是春节的高潮。春节习俗随着岁月变迁、跟着时代发展,也经历了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春节习俗源于古时年终岁尾的腊祭活动,主要表达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等愿望。所以时至今日,每逢春节,全国各地的汉族和大多数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规模宏大而隆重的庆祝活动,其活动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异彩纷呈,一些主要的习俗事项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些习俗被历朝历代的诗人吟咏成诗,写入春联,佳句辈出,广为流传。如今春节习俗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成为华人的传家宝,流进民族的血脉里,融化成浓浓的乡愁,召唤人们回家团圆。

1. 扫尘

《清嘉录》卷十二记载:腊将残,择宪书宜扫舍宇日,去庭户尘秽。人们借助“尘”与“陈”的谐音以表达除陈、辞旧的意愿。古诗中写春节除尘习俗的有很多,如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爆竹行》写道,“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是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戴复古的《除夜》,诗中写道:

扫除茅舍涤尘嚣,一炷清香拜九霄。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
生盆火烈轰鸣竹,守岁筵开听颂椒。
野客预知农事好,三冬瑞雪未全消。^[1]

戴复古的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除夕之夜人们扫尘、拜祖、放爆竹、守岁和喝椒酒的习俗,表现了人们对新春的期盼,抒发了对瑞雪兆丰年美好生活的向往。

2. 祭祖

汉代崔寔在其《四民月令》中写道:“正月之朔是为正月,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

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觴举寿,欣欣如也。”^[2]这说明,早在汉代,祭祖就已成为春节重要的民俗活动。春节祭祖的习俗也出现在白居易的《三年除夜》诗中:

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
嗤嗤童稚戏,迢迢岁夜长。
堂上书账前,长幼合成行。
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觴。
七十期渐近,万缘心已忘。
不唯少欢乐,兼已无悲伤。
素屏应居士,青衣侍孟光。
夫妻老相对,各坐一绳床。^[3]

诗人选取除夕夜这一特定的时间,第一部分(前四句)描写除夕夜合家欢乐、共庆佳节的场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除夕夜的节日氛围:点燃祭祖和照明的火炬,火光通明;祭祀的酒摆上祭台,满屋飘香;孩童们喧闹的嬉戏声萦绕耳畔,亲人们长幼有序排成行给年长的诗人祝寿。第二部分(后四句)写自己年高心淡、无欲无求、归于本真的恬淡心境,与前一部分形成鲜明对比。

3. 饮岁酒

屠苏酒、柏叶酒、椒酒,是古代中国人春节期间主要饮用的酒品,故又名岁酒。屠苏是一间草庵(茅舍)的名称,据说古时此草庵曾住着一位名医,每到除夕夜时都要给附近的家家户户送药酒以避瘟疫。由于不知道这位神医的姓名,人们使用草庵的名称“屠苏”来命名这种药酒,故称屠苏酒。柏叶酒,是用柏叶浸制的酒,春节饮用它有祝寿和避邪之意。椒酒,又称椒花酒、椒柏酒,是用椒花或加入柏叶浸泡而制成的酒,其作用与柏叶酒相同。

古人饮屠苏酒等岁酒的顺序由幼及长,先从年少者开始,然后按年龄顺序,由小到长逐人

饮少许,年长者最后。宋朝文学家苏辙在《除日》写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中写道,“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分岁词》中也写道,“老翁饮罢笑捻须,明朝重来醉屠苏”。由此可以看出,饮岁酒这种风俗在宋朝非常盛行。

古人除夕饮岁酒成习,所以诗人们以酒入诗的佳作比比皆是。例如,南梁庾肩吾在《岁尽应令诗》中写道,“聊开柏叶酒,试奠五辛盘”;北朝庾信在《正旦蒙赵王赉酒》中写道,“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柏叶随铭至,椒花逐颂来”;杜甫在《人日诗二首之二》中写道,“樽前柏叶休随酒,胜里金花巧耐寒”;宋人戴复古在《壬寅除夜》中写道,“横笛梅花老,传杯柏叶香”;明代张居正在《元旦感怀》中写道,“闲愁何事演芳序,且尽樽前柏叶卮”。这些诗记录了人们饮岁酒的春节习俗,抒发了诗人们热爱生活的情怀,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审美感受。

4. 放爆竹

据南朝梁人宗懔记录中国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论文集《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4]这段记载说明放爆竹在古代是为了辟邪驱兽。唐代诗人来鹄诗云,“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宋代赵师侠在词《鹧鸪天·丁巳除夕》中写道,“爆竹声中岁又除,顿回和气满寰区”;宋代诗人范成大在《爆竹行》中则详细描述了苏杭的一户人家在春节放爆竹的全过程,表达了诗人新年愉悦欢畅的心情,寄托了诗人对居家平安的美好愿望:

岁朝爆竹传自昔,吴侬政用前五日,
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

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将仍疾走。
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5]

5. 除夕守岁

除夕是春节最重要的时刻,除夕守岁习俗由来已久,代代相传。古代描写守岁的诗歌尤其多,诗名为《除夜》《守岁》的古诗俯拾皆是、不胜枚举。白居易曾写过多首描写除夕年俗、寄托思乡思亲、感慨时光流逝的除夜诗:“岁暮纷多思,天涯渺未归。老添新甲子,病减旧容辉。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6];“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6]。唐代诗人孟浩然在《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中写道,年三十这天要“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7];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说,除夕之日要“家家饮宴,笑语喧哗”^[8]。

除夕守岁时,最让人思念的是家乡和亲人。苏轼曾经写过《守岁》《馈岁》《别岁》三首诗,表达了置身异乡的诗人在除夕之夜,思父念弟、怀念故乡之情。其中的《守岁》写道:

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
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
努力尽今日,少年犹可夸。^[9]

诗人感叹时光荏苒,担心光阴虚度,羡慕少年时光充裕,勉励自己仍须努力。

6. 贴春联

春联由桃符演变而来。《后汉书·礼仪志》曰:“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周代时,人们把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称为桃符,用来驱鬼辟邪。在桃符上写联语是从五代时的后蜀君主孟昶开始的。孟

昶喜好文学,每年都命人在桃符上题诗,成为后来春联之滥觞。明代开始将桃符改称“春联”。宋代赵师侠的《鹧鸪天·丁巳除夕》词写道:“爆竹声中岁又除,顿回和气满寰区。春风解绿江南树,不与人间染白须。残蜡烛,旧桃符,宁辞末后饮屠苏。归欤幸有园林胜,次第花开可自娱。”^[10]而陆游的诗“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11],则细致描写了除夕夜窗外突降的瑞雪兆示来年的丰收,诗人喜出望外的心情跃然纸上。由此可见,贴春联已成为除夕夜的固定习俗。

7. 拜年

拜年,古时指年幼者向年长者跪拜,以及同辈之间互拜,有恭贺新年、祝福添寿之意。清代诗人、《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在《甲午元旦》中写道:

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
剪烛催干消夜酒,倾囊分遍买春钱。
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兴偏。
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12]

《甲午元旦》写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诗人描写了当时的过年习俗,如围炉守岁、饮酒宵夜、放爆竹、换桃符、听乐曲、拜新年等。当年作者虽已66岁,但赤诚童心在字里行间清晰可见。该诗所表达的正是诗人脱离官场之后那种恬静和愉悦的心情。

拜年的习俗到了宋代,由当面拜年变成了投送拜贴。这种相互问候方式既礼貌又雅致,只是略嫌简陋罢了。明代文学家文征明的《拜年》一诗就记述了古人的这一拜年风俗。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13]

综上所述,古人过春节,习俗多样,仪式感强,充满神圣之感和敬畏之感,这与习俗的民族性、地域性、阶层性、多样性等特点相关。另外我们发现,诗中描述的大多是市井百姓的春节习俗,这一方面说明诗人们贴近生活、记录生活的现实主义情怀,另一方面更说明春节习俗文化影响力深远,对诗人心灵和情感产生了极大触动,从而产生了春节习俗入诗传播传承的文化现象。

二、年俗诗的作用和文化意蕴

春节习俗作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春节文化,已植根民间,融入故土,走进家庭,深入人心,代代相传。记录和传承春节习俗的年俗诗也被历朝历代的人们喜爱并世代传诵。如今,每逢春节,这些诗词必将被人们谈之咏之,其中的名句更是被写入春联装点千家万户。年俗诗的内容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生动形象、客观真实地记录春节的风俗民情,如除尘、祭祖、燃爆竹、贴春联、饮屠苏、守岁、拜年等。如前所列,不再赘述。另外,也有一些地域性很强的习俗,如南宋诗人范成大所写的《卖痴呆词》,不仅记叙了南宋时的守岁习俗,而且还专门提到了吴中一带过年的卖痴呆民俗,即让小孩子在除夕夜满街跑,呼叫“卖痴卖呆”,以将痴呆转移给别人。诗人的描写生动形象、活灵活现:

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
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
二物于人谁独无?就中吴侬仍有余;
巷南巷北卖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
栎翁块坐重帘下,独要买添令问价。
儿云翁买不须钱,奉觞痴呆千百年。^[14]

二是表达欢度春节时人们迎新的欢喜心情

和阖家团圆的伦理亲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宋代著名诗人苏轼和苏辙,兄弟情深,苏轼评价苏辙,“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而苏辙称赞苏轼,“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两人都曾在除夕夜把思念对方、期待团聚的心情写入诗中。苏轼在给苏辙的《守岁》中写道:“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日,少年犹可夸。”^[15]另外,还有苏辙的“一岁不复居,一日安足惜。人心畏增年,对酒语终夕。夜长书室幽,灯烛明照席。盘飧杂梁楚,羊炙错鱼腊。庖人饌鸡兔,家味宛如昔”^[16];孟浩然的“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17];李世民的“岁阴穷暮纪,献节启新芳。科尽今宵促,年开明日长。冰消出镜水,梅散入风香。对此欢终宴,倾壶待曙光”^[18]。

三是感叹时光易逝,抒发人生感慨,表达诗人关于时间生命的思考。在时光新旧交替的特殊时空下,诗人常常借年俗诗感叹壮志未酬、功业不就的人生憾恨,表达自己不甘颓废、对事业的执着追求,祈望在新年实现生命的超越与功成名就。白居易是写年俗诗最多的诗人,他在60岁时在《除夜》中写道:“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19]整首诗洋溢着对生命流逝的感慨,以及生命仍然存在的恬然自得。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之一》中写道:“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20]第一首写诗人彻夜不眠,并非因守岁而是在为民间疾苦忧虑;第二首诗抒发除夜感慨,诗人以直抒胸臆的手法,写出不能践行其政治

抱负的遗憾之情。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21]记录生活抒发情感的年俗诗，之所以能够永久流传，一是因为它记录的是人类共同记忆和美好情感的节日——春节；二是因为诗人凝练而有韵律的语言艺术和诗词魅力，唤起了人们的共同情感和审美感受；三是因为诗人在描述春节景象、人生感慨的同时带给人们的还有许多哲学思考和人生启迪。

由此可见，敬神敬祖、祈福求安的祭祀文化，驱祸辟邪、除旧迎新的求新精神，注重孝道、重视亲情的伦理文化，珍惜生命、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是年俗诗背后丰富的文化意蕴。

三、关于春节习俗文化传承的思考

春节是凝结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独具审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习俗是春节文化的根脉，在民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近年来全国各地春节民俗活动正在复苏，民间庙会、社火、行水在春节期间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失去的年味正在回归。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传统节日文化复兴的时代已经来临。

1. 春节习俗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乡愁，应自觉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1日~13日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意见》要求：要“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化，培育和扶持乡村文化骨干，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

乡愁。鼓励港澳台艺术家参与国家在海外举办的感知中国、中国文化年（节）、欢乐春节等品牌活动，增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22]。认同感会带来传承自觉，过年就是传承春节习俗文化，春节习俗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乡愁。记住乡愁、回家过年，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家，是中国人最核心的认同；年，是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再难也要回家过年，反映的正是中国人寻找家的归属和精神寄托的集体共鸣。”^[23]

2. 春节习俗文化应融入现代文明，在发展中传承

春节习俗自产生到现在，既有地域差异，也有内容增减的变化，有的习俗是新生的，有的习俗已消亡。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习；除旧迎新、移风易俗是其规律。比如，祭祖的习俗在农村依然盛行，在城市却淡化了许多；放鞭炮，农村由于地广人少依然可以燃放，而在城市由于污染严重实行了禁放。在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春节习俗文化的传承也在发生变化，变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意见》要求要“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22]。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是历久弥新的话题。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增加新的春节习俗内容会为社会增添新活力，如微信拜年，有文字、有图画、有声音、有视频，已成为一种非常新颖、便捷的拜年方式。民俗就在生活中。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春节习俗。比如，春节北方习俗是吃饺子，寓意新旧之交、除旧迎新；南方习俗则是吃年糕，寓意新年步步高升。随着城镇化、网络化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春节习俗文化还会产生变化，我们应在发展中传承。

四、结语

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与中国文化的不断

断传播,目前全世界已有十几个国家把中国春节定为法定假日。印度尼西亚于2002年把中国春节列为国家节日,美国也有一些州将中国春节确定为本州的法定节日,英国的旅游手册将中国春节列为英国节日。加拿大政府从2017年起将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正式定为官方节日——春节。2017年1月29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穿着唐装带领内阁三位部长参加温哥华华埠新春大游行,并给舞狮点睛,国会议员们也按中国习俗准备了大量红包派发给现场民众。海外“春节热”的逐年升温,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春节正日趋走向国际化。春节习俗文化通过中华庙会、广场庆典等各种形式向世界传播,中国春节的年味和习俗正悄然在世界各地扩散。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外孙女在中国春节时拿着布老虎、用中文唱新年好的视频也可以看出,春节逐渐成为普天同庆、全球共享的世界性节日,过春节在海外已开始成为一种时尚和新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坚信,中国传承春节习俗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也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 [1] 戴复古. 除夜[M]//戴复古诗集. 金芝山,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87.
- [2] 缪桂龙. 四民月令选读[C].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12.
- [3] 白居易. 三年除夜[M]//白居易诗全集.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35.
- [4] 宗懔. 荆楚岁时记[M]. 宋金龙,校注.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1.
- [5] 范成大. 爆竹行[M]//范成大集. 姜剑云,评解. 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66.
- [6] 白居易. 除夜[M]//白居易诗集校注. 谢思炜,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6:1644.
- [7] 孟浩然. 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M]//王维孟浩然选集. 王达津,选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98.
- [8] 吴自牧. 梦粱录[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
- [9] 苏轼. 守岁[M]//苏东坡全集:上. 北京:中国书店,1986:484.
- [10] 赵师侠. 鹧鸪天. 丁巳除夕[M]//谭仲池. 星空的灿烂诗画. 北京:经济出版社,2007:176.
- [11] 陆游. 除夜雪[M]//陆游集:第2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6:720.
- [12] 孔尚任. 甲午元旦[M]//孔尚任诗.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322.
- [13] 文征明. 拜年[M]//齐涛. 中国通史教程:古代卷:上.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444.
- [14] 范成大. 卖痴呆词[M]//王远国,余克勤. 中华传统节日诗赏析.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400.
- [15] 苏轼. 守岁[M]//苏东坡全集:上. 北京:中国书店,1986:484.
- [16] 苏辙. 辛丑除日寄子瞻[M]//宋蒲积. 古今岁时杂咏. 徐敏霞,校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477.
- [17] 孟浩然. 田家元日[M]//杨昌庆,杨凤回,译注. 中国历代农家诗选.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17.
- [18] 李世民. 除夜[M]//唐太宗集. 吴云,冀宇,校注.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78.
- [19] 白居易. 除夜[M]//白居易集. 顾学颢,校点. 北京:中华书局,1979:643.
- [20] 苏轼.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之一[M]//王新龙. 苏轼文集.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86.
- [21] 王国维. 人间词话[M]//徐调孚,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37.
- [2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17-01-26(01).
- [23] 贺雪峰. 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村中国[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



引用格式:刘玉叶. 南朝的总集编纂与文学观念之辨——兼论《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理念[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4):82-88.

中图分类号:I206.2;K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082-07

南朝的总集编纂与文学观念之辨

——兼论《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理念

Discrimination of anthology compilation thought and literary ideas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On the ideals of selection of *Selected Works* and *A Collection of Hongming's Works*

刘玉叶

LIU Yu-ye

1.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2. 郑州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总集编纂兴起于六朝,后世论者多以《文选》为总集编纂的代表之作,这主要是因为《文选》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编选体例与标准,其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被认为是当时文学的主流标准,被作为文学自觉、纯文学产生的标志性论述。《文选》的选录标准一是范围限于集部,二是若作品超出集部范围,必须要富有文采、有娱人情性之效果。后世将《文选》称作“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其重辨体、重文采的选录标准也成为后世编纂总集的基本要求。而当时另一部佛教典籍总集《弘明集》,却提出了与《文选》截然不同的选文理念。《弘明集》的选录标准相当宽泛,只要内容有益佛、法、僧三宝,则无论篇幅文体,均予以收录;语言只要朴实无华,也予以收录。这与编者旨在弘道明教的编纂目的有关。《文选》与《弘明集》一“文”一“笔”,这表明南朝总集编纂并非只收诗赋,而是有丰富复杂的样貌。

关键词:
总集编选;
文选;
弘明集;
“文”“笔”之争

收稿日期:2017-05-02

作者简介:刘玉叶(1986—),女,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郑州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总集编纂兴起于六朝,后世论者多以《文选》(《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为总集编纂的代表之作,这不仅因为《文选》开编纂文典之先河,也因为它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编选体例与标准。尤其是在当时的“文”“笔”之争中,《文选》对“文”所下的定义更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广泛争论,萧统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文学观念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标准,被后世称作文学自觉、纯文学产生的标志性论述。《文选》的选文理念一向为《文选》研究乃至六朝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当时另一部佛教典籍《弘明集》(佛教文集,南朝梁僧佑撰于天监年间),却提出了与《文选》截然不同的选文理念,近年来学界多关注其选录文章体现的宗教背景与思想史内涵,对其编纂本身则少有关注。鉴于此,本文拟比较《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标准之别,以期对南朝总集编纂中体现出来的文学理念进行多维度认识。

一、《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理念之别

“总集”之名来自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其文集录中列有“总集部”。《隋志》认为第一部总集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总集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编者患于文集过多而欲去粗取精的目的,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而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1]1088}。《四库提要·总集部》将总集产生的原因也归于“文集日兴,散无统纪”^{[2]3811}。可见,正因为文章著作的大量产生和“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哀江南赋》)的太平局面,南朝才掀起一股编纂总集、类书的热潮。据《隋志》记载,梁武帝下令编纂的类书、总集有620卷的《华林遍略》、480卷的《通史》、10卷《历代赋》、沈约所注1卷的《连珠》、萧纶

与陆缅所注10卷的《制旨连珠》、200卷的《群经讲疏》等。编纂《华林遍略》的华林学士达700余人,南朝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3]太子萧统除领修《昭明文选》外,还主持编修了《古今诗苑英华》《正序》《文章英华》等文学总集。僧祐当时与王室和其他上层文人交往密切,也积极投入到文集汇编的浪潮之中,成为当时僧人编纂著述最多的一位。

无论是否出自编选者的本意,在总集的选文定篇过程中都体现了编者的文学理念,其对某些文体、文风的偏好,使得总集往往烙上鲜明的个人印记。当时,总集编纂的特点是重于辨体,即将编纂限于集部内完成,如《历代赋》专选赋,《文章英华》亦只选“五言诗之善者”^{[4]171}。《玉台新咏》的选录范围更为明确:“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只“撰录艳歌”,作者承认内容是“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编选目的就是“永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5]。这种特立独行的文学审美观,脱离了以往严肃正统的文学风气,成为齐梁文坛的最大特点。

太子萧统向来喜欢中正雅致之文风,在《文选序》中表示《文选》的编纂就是要“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不选录经部典籍、子部典籍、史部典籍。“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这种儒家经典,因为贵为“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故不予收录;子书(先奏百家著作,宗教)即“老庄之作,管孟之流”,因为其“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也不予收录;其他“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虽然有其文学价值,可谓“冰释泉涌,金相玉振”,但是伤在“繁博”,也不纳入;史书类文章则是“方之篇翰,亦已不同”,也不属于“文”之范围。萧统接着解释了为何将一些赞论序述收入《文选》:“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6]

可见,萧统《文选》的选录标准,一是选择范围限定于集部;二是若作品超出集部范围,必须“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即富有文采,或是“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6],即有娱人情性之效果。后世将《文选》称作“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7],其重辨体、重文采的选录标准成为总集编纂的基本规范,《文选》遂也成为南朝总集的代表之作。

与萧统同时代的高僧僧祐所编纂的《弘明集》是我国第一部佛教总集,收录了东汉以来凡俗人士关于护法御侮、弘道明教的文章 186 篇,其中以论体和难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书信居多。僧祐在《弘明集·序》中阐明了自己编纂此集的目的是“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接着叙说了自己选文的标准:“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8]¹⁴可以看出,僧祐的选录标准相当宽泛,只要内容是“刻意剪邪、建言卫法”,文章写作有益于佛、法、僧传道的,不限篇幅文体都予以收录。在《弘明集·后序》中,僧祐概括了自己选文的文风标准,“故复撮兴世典,指事精微,言非荣华,理归质实”^[8]⁷⁹⁴,强调选文的语言要“质实”而非“荣华”。

为什么《弘明集》与《文选》在选录标准上有所区别呢?其根本原因是两者在选文目的上存在差别:一般文学总集除了收录文章的基本功能以外,还要辨析区分各种文体,将具有典范价值的优秀文章分类收入,以作为写作教科书之用;而《弘明集》作为一部佛教文集是为了弘道明教,有着更现实的宣传作用,正如萧统所说的“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6]。在当时文人的观念中,《弘明集》不能视作“文”,在目录学分类中,“自阮孝绪《七录》以后,释氏之书久已自为一类”^[2]³⁷²⁶,《七录》中将佛道都列作

外篇,此后虽然也有目录著作如《旧唐志》将《弘明集》归入集部,但《弘明集》一般不被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总集,所以虽然《弘明集》中所收的文章辞采“铿然可诵”^[9],富有文学价值,但所收录的文章因为不限文体且文风质朴平实,而不被视作“文”。这或许可告诉我们,一部《文选》并不能总概当时的总集编纂与文学观念,这两种选录标准的巨大反差正体现了南朝的文体之辨与文风之辨。

二、总集选录标准差异中的南朝“文”“笔”之辨

若讨论六朝时期的文体之辨,最著名的当属“文”“笔”之辨,这也为学界一贯关注而众说纷纭。按刘勰的说法,“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10]。他认为,押韵的骈文可称为“文”,不押韵的散文可称为“笔”。就此而言,《弘明集》中所收文章皆为“笔”。然而总集应收录重词藻之“文”而非析理之“笔”,自《文选》以后这已成为目录学之常规。《四库提要》中评南宋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云:“《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2]⁵⁰⁸⁰《文章正宗》打破了总集只选“文”的先例,该书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其持论甚严,大意主于论理,而不论文”^[2]⁵¹²⁰。但也正因如此,四库馆臣也严厉批评该书不近人情、矫枉过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云:“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他们评论说:“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刊落,必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毋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2]⁵¹²⁰ 历来目录学家虽也都认为《文选》区分文体过于精细,但又不忍打破该书的编纂定则,选入质实析理之文。可见《文选》以后,在集部内选文已成为总集编选的不二之规。但《四库提要》说直到南

宋真德秀才打破这一定则并不妥当,因为与《文选》几乎同时问世的《弘明集》就已经提出与之截然相反的选文标准了,而且与南朝文风不尽相同的北朝也有此例,萧圆肃就“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11]，“文”“笔”兼收。

萧统的《文选·序》一向被当作当时“文”“笔”分疏的重要开始。近代学者阮元在抨击桐城派严明“文”“笔”之分、评《文选》选文标准时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12]当时的学者章太炎则素来秉持大文学思想，认为“以有文字著于竹帛”即可谓之文学，他对阮元认为沉思翰藻之文是《文选》选录标准的说法加以批驳：“且沉思孰若庄周、荀卿，翰藻孰若《吕氏》、《淮南》？”^[13]他认为子书往往比集部好多作品更加富有文采深思。学者刘师培、黄侃也加入了两者的争论中，刘师培素来认为“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但也认为一切有文采者皆可称“文”，“文也者，别乎鄙词俚语者也”^[14]。黄侃在划分“文”之界限上则走弹性的中间路线，说：“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15]

“文”“笔”之分虽在南朝时期为大多数文人所认可，但也有学者不认同这种看法。刘勰虽提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但认为两者均是“常言”。他又说“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10]，“明斥其分篇之谬”^[14]¹⁸³，“可以理解为含有激辞”^[16]。刘勰将《史传》《诸子》收入《文心雕龙》，就表明了他反对“文”“笔”之分的态度。即使热衷艳情绮靡文字的南朝梁简文帝、文学家萧纲，虽明分“文”“笔”，但也在《答湘东王书》中将“谢朓、沈约之诗”与“任昉、陆倕之笔”并称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4]⁶⁹¹。

可见，六朝文人对文学的定义和范围实无非常清晰明确的划分，也认为无此必要。以西方文学概念去推论当时是否有杂文学、纯文学

有失妥当。但从编纂文集的实用角度来看，四部之分与“文”“笔”之别确实存在。南北朝时文体不清的状况较为严重，刘师培曾说“文章各体，其说不清”^[14]，刘孝绰在《昭明太子集·序》中说，“孟坚（班固）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陆机）之碑，犹闻类赋之贬”^[17]。可见，当时的人们在文学观念萌发以后，对辨析文体的迫切性。所以，《文选》极力将选录范围限于集部之内，并收录有藻采之文。但从《文选》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理想化的明晰分类较难实现，《文选》也收入了多篇既不属集部也并无沉思翰藻、华美辞章之文，如《文选》收了13篇论体文，还有文辞质朴的《尚书序》（孔安国）、《春秋左传序》（杜预）等。章太炎曾就此发问：“总集不摭九流之篇，格于科律……未知贾生《过秦》、魏文《典论》同在诸子，何以独堪入录？”^[13]章学诚更由此评论《文选》编选“淆乱芜秽”，不应只看文章“形貌”而强行分类^[7]。

文体分类是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章太炎、章学诚的言论未免苛责古人，但以目录学的严密划分来选文编总集在实际操作中确实会有诸多困难，且会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有所阻碍。^[18]编纂《出三藏记集》的僧祐虽身为目录学家，但在《弘明集》的编纂中没有“拘形貌之弊”，与其迫切的纠正时弊的实用目的有很大关系。据《隋书·经籍志》所载^[1]¹⁰⁸⁵，僧祐另外编纂的文集还有《箴器杂铭》5卷、《诸寺碑文》46卷、《杂祭文》6卷，这些总集虽都文体分明，但显然在他看来这些文集都不能承担弘道明教的作用，可见他对不同文体功能有不同的看法。佛教的正统文学与儒学典籍相似。《典论·论文》以“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来阐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6]，而非诗赋；曹丕同样在《与吴质书》中称徐干著《中论》（一部政论性著作）而“不朽”，亦非诗赋。只求文采绮丽的文章终究难逃“童子雕虫篆刻”的讥讽，世

人眼中也只有桓范《世要论·序作》所说的“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19]的文章可谓“不朽”。同样在宗教语境中,“弘道明教”“有益三宝”之作方为“不朽”之作。“诗赋欲丽”,虽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但终为佛门正道所不取。唯“论”、“难”、“研核名理”(李充)、“析理精微”(萧统)、“精微而晓畅”(陆机)、“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刘勰),以“理”为旨归、明白晓畅、直指人心、辨疑解惑的文章,才符合僧祐弘扬大法的夙愿。在这种正统观念之下,无论文体为何,是“文”是“笔”,终究以文章功能目的而辨高下。虽然《文选》力求打破这种观念,甄选“入耳之娱”“悦目之玩”之文,但以此来评判南朝整体总集的编纂乃至文风,有失全面。

总体而言,《文选》与《弘明集》一“文”一“笔”,总集的收录标准并非一概而论地只收诗赋,体现了南朝总集编纂丰富复杂的样貌。其中,《文选》虽声称只收富有文采的集部之文,但也不免杂入其他文体;《弘明集》力求兼容并蓄,在论体文、难体文中也不乏收录文采斐然之作。当时文体区分的实际操作难度可见一斑,以《文选》的选录标准去推断当时文坛学界重“文”而轻“笔”,实为不妥。

三、《弘明集》的选录标准与南朝文风之辨

在南北朝文集编选中专门提出“言非质华,理归质实”这种文风要求的,实不多见。僧祐在《弘明集·后序》中,坦承自己“虽文匪珪璋,而事足鞶鉴”^{[8]804},意在提醒人们,将注意力从文字表面的华丽辞藻移开,关注其中的事、义、理。可见,僧祐对文章的要求,是“实”与“质”两个方面。

“实”作为第一要求,是令人信服之意,这是宗教宣传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一方面,僧

祐编纂文集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引导“迷津之人”,总释群疑。这也是佛教教义之本然,佛教称虚妄浮夸之辞为“绮语”,视为严重的口业。沈约就曾在《忏悔文》中忏悔自己“绮语者众,源条繁广”^[20]。而另一方面,对“实”的需求来自当时佛教遭遇的信任危机,来源于不少人对佛教“神迹”言过其实的描绘和源于印度的华丽繁冗之文风。出于宣传的需要,一些僧人热衷于“神迹”的展露,轮回、感应、神鬼类故事不断涌现,这让很多信守儒家传统的理性人士颇为反感,这类诟病在《弘明集》中可谓俯拾皆是。东汉的《牟子理惑论》就记载有:“予以经传之辞,华丽之说,褒赞佛行,称誉其德,高者凌青云,广者逾地圻,得无逾其本过其实乎?”^{[8]50},这是对佛教宣传不实的诘问。在文风方面,鸠摩罗什就曾言“天竺国俗,甚重文藻”^{[21]534}。许多佛经多采用故事譬喻、重韵律、反复吟咏的文学样式。《牟子理惑论》中就记载东汉时人们质疑佛经多用譬喻的弊病:“夫事莫过于诚,说莫过于实……佛经说不指其事,徒广取譬喻。”^{[8]36-37}可见,佛经文风不诚不实。佛经的印度风格可通过翻译加以完善,在宗教求知求真之人看来,他们更希望人们理解佛教经典中析理精微之处,“经本贵理,不必须饰文而乖义也”^[22]。对于佛教面临的这种普遍性怀疑,僧祐只能通过平时令人信服的文章加以纠正与弥补。当时僧祐所编另一部《佛记》,沈约为其作序,其中也着重强调了信、实之要求,可见这是当时佛学写作、编集所普遍注重的要求。

对于“质”的设定,首先也是因为质朴无华的文字更能带来信任感,且相对来说更容易被人理解。收录于《弘明集》卷十三的《日烛》一文,作者王该就说明了自己的写作缘由:“然信言不美,文繁辞宕,累冥绝味,重渊隔浪,是以学者未得其门,或未之留意,聊抒咸池之远音,适为里巷之近曲。”^{[8]3}此处可见他欲将佛理通俗

化表达的写作目的,其次也体现了僧祐个人的文学理念。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由来已久,其中持折中观点的有慧远,他反对“或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认为“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23]98},但即便如此,慧远还是着重强调“削除饰好,落名求实”^{[23]329}，“依实去华,务存其本”^{[23]98}。他对吟咏情性文学的观念可以从下面一则逸事中看到。

（僧彻）又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尝至山南攀松而啸，于是清风远集，众鸟和鸣，超然有胜气。退还咨远：“律制管弦，戒绝歌舞。一吟一啸可得为乎？”远曰：“以散乱言之，皆为违法。”由是乃止。^[24]

宋代《佛祖统纪》卷二十六则将慧远的回答记为“苟以乱意，皆为非法”。无论是“散乱”还是“乱意”，都表明慧远的文学理论是从佛教教义出发、以加深对教义与人生精神的理解和感悟为目的的。依此看来，南朝流行的以娱乐为导向的文学扰乱了佛教倡导的保持禅定清净内心的思想。《续高僧传》也记载了陈代僧人释昙瑗“颇以文华自处，时或规谏之者，瑗因摆拨前习，专征鄙倍……由是名重京邑，同例钦焉”^[25]。这说明“鄙倍”质朴的文风才是佛门弟子所看重的。僧祐本人的文学观念，也是在重质的基础上强调文、质折中的：

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21]466}

僧祐虽然强调质实，但也并非全部丢弃文采。《弘明集》中刘勰的《灭惑论》开头便抨击《三破论》“义证庸近，辞体鄙陋”^{[8]733}，这说明刘勰对佛教论文的观念也是义理与文辞并重

的。僧祐也编纂过不少文学艺术类总集，这说明他也不是是一位不近人情、矫枉过正的人。而他专门提出质实要求，甚而有专门排斥华丽文风之嫌的原因，在于当时佛门作风与文风使他在《弘明集》序中直言“静言浮俗，愤慨于心”。虽“鄙倍”的文风使“同例钦焉”，但也终抵不过世风浸润，“新声炽而雅音废”^[26]。宋代的释惠休与齐代的释宝月就是僧人中写作艳情之歌的名家，有些僧人甚至于平日讲经唱导也多唱艳情歌曲，《续高僧传》就记载了当时的这种风气：“郑卫弥流，以哀婉为入神，用腾掷为清举，致使淫声婉变，娇弄颇繁，世重同迷，黜宗为得。故声呗相涉，雅正全乖。纵有删治，而为时废。”^{[25]705}这种迎合世人时尚的做法也招致更多人对佛教的误解，令僧祐感到痛心不已。当时所流行的《十诵律》规定，“不歌舞，作伎乐不往观听”^[27]。僧祐身为律学大师，自幼“承页十诵”^{[21]496}，被评价为“四双之云梯，五众之喀范”^{[21]224}，自然见此情景而愤慨难已。所以在《弘明集·序》中，僧祐就颇为激动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正见者敷赞，邪惑者谤讪。至于守文曲儒，则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8]415}

“巧言”“诡论”“讹辞”可以理解为僧祐对佛教文学界的看法。他自认身处末法时代，“自像运浇季，浮竞者多，或凭真以构伪，或饰虚以乱实”^{[21]224}，将不真、不实作为时代的典型特征。僧祐在《弘明集·序》中发出“道大信难，声高和寡”的感叹，与刘勰倾注心血完成的《文心雕龙》却“未为时流所重”而感到的悲凉如出一辙，师徒二人对文学之总经、追本溯源的作法可谓一脉相承。僧祐本为主持大局，拨乱

反正,纠正佛门风气,但佛坛之风与文坛之风本又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可以说,通过编纂《弘明集》,僧祐在当时的文学观念之辨中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文选》的编纂理念往往被作为南朝文学总集的代表,但如果我们能留意另外的总集编选,就可以意识到《文选》“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并不能概括南朝所有文学总集的选文标准。《弘明集》的文体、文风与《文选》的标准大为不同,这种编选理念的差异体现了南朝文学思想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更多关注传统集部、传统文学分类之外的文集与文章,也许能使我们以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去理解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原貌。

参考文献:

- [1] 魏征,颜师古,孔颖达,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2] 永瑢,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3] 杜宝. 大业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91:9.
- [4] 姚思廉. 梁书[M]. 台北:鼎文书局,1990.
- [5] 徐陵. 玉台新咏[M]. 成都: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1976:2.
- [6] 萧统. 文选[M]. 李善,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3.
- [7] 章学诚. 文史通义[M]. 叶瑛,注解. 北京:中华书局,2004:81.
- [8] 僧祐. 弘明集校笺[M]. 李小荣,校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9] 陈垣.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68.
- [10] 刘勰. 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655.
- [11] 李延寿. 北史[M]. 台北:鼎文书局,1981:1063.
- [12] 阮元. 研经室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3:608.
- [13] 章太炎. 章太炎学术史论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5.
- [14] 刘师培.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83.
- [15] 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6:262.
- [16] 罗宗强.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6:294.
- [17] 萧统. 昭明太子集校注[M]. 俞绍初,校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245.
- [18] 李飞. 六朝目录学新变对文体辨析的消极影响——以“文笔说”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15.
- [19] 严可均. 全三国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89.
- [20] 道宣. 广弘明集[M].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331.
- [21] 僧祐. 出三藏记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2] 道宣.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8:82.
- [23] 木村英一. 慧远研究之遗文篇[M]. 东京:创文社,1960.
- [24] 释慧皎. 高僧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92:3.
- [25] 道宣. 续高僧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6]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707.
- [27] 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册[M].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755.



引用格式:郑伟. 善恶失衡的世界——《欧奴诺可》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4): 89-96.

中图分类号: B82; I1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4-0089-08

善恶失衡的世界

——《欧奴诺可》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The world of imbalance between good and evil

—An analysis of *Oroonok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ethics

郑伟

ZHENG Wei

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 贵州 凯里 556000

摘要:近代早期英国著名女作家阿芙拉·班恩的小说《欧奴诺可》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善恶失衡的世界图景。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看,小说借助于欧奴诺可这个深陷伦理悖论的角色塑造,向我们描绘了查理二世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野蛮和罪恶。在金钱的刺激下,他们血脉中的盎格鲁-撒克逊野蛮因子被唤醒,最终失去人性而变得与兽类无异。这部作品告诉人们:如果人类的意志不加控制,最终唤醒的只能是人性中的残忍一面,而绝不是什么“自由的伦理”。此时资产阶级刚刚确立其统治地位,而班恩却从伦理层面对尚处于上升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展开批判,发人深省,这是该小说的进步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

欧奴诺可;
文学伦理学;
伦理身份;
人性因子;
野蛮因子

收稿日期: 2016-12-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4YJC752035)

作者简介: 郑伟(1980—),男,安徽省淮北市人,凯里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作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职业女作家,阿芙拉·班恩被视为女性主义的偶像和先驱。“每一位女性作家都应该在班恩的坟墓前献花”^[1],弗吉尼亚·伍尔夫这句被广为引用的评价给班恩披上了神圣的光环,死后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名人祠”的荣耀更是奠定了班恩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班恩最早进入中国学界视野始于1946年李儒勉翻译的《英国小说概论》。该书作者普莱斯特利教授对班恩在小说叙事领域的开拓性贡献有很高的评价:“女人也试写传奇,一位女的,亚第·拉斌太太(Mrs Aphra Behn)在她的《欧奴诺可》(Oroonoko)与《薄情女》(The Fair Jilt)里曾经摆脱了美好的名字与冗长的演说的模糊境界而渐渐接近实际。”^[2]实际上,班恩的《欧奴诺可》虽然存在散文小说的痕迹,沿袭了英雄传奇的故事传统,但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与虚构主义的成功结合已经显示出现代小说的特征,“只是西方一些学者并不愿意把创作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小说的功绩封给阿芙拉·班恩”^[3]。如果批评者单纯以现实主义角度阐释《欧奴诺可》,纠结于班恩是否去过苏里南,以及小说中有关非洲、美洲的环境描写的真实性和材料的来源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会像亚当·希尔斯认为的那样犯前提条件缺陷的错误。^[4]事实上,女性作家、黑人王子、高贵的奴隶等因素很容易引起后学语境下批评家的注意,使其关注度在20世纪中叶以后的英美学术界不断上升。D. Hughes认为:“《欧奴诺可》中涉及的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阶级、性别、政治哲学、经济史等诸多元素,甚至在整个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中都鲜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因而获得了当代研究者极大的关注,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或思想性的解读都应该取决于对该作品内部结构的理解程度。但很显然,该小说的形式及其复杂的艺术技巧却未引

起批评家较多的关注。”^[5]实际上,《欧奴诺可》中的奴隶制、黑人身份与女性问题均可看作伦理问题。如果我们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这部小说,不仅可以将以以往研究者关注的诸多分散问题整合起来,而且对理解该小说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也有新的帮助。聂珍钊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问题的研究方法,它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6]本文拟立足于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分析《欧奴诺可》由于伦理身份变化造成的悲剧,并探讨英国殖民者因兽性因子膨胀导致人性丧失背后的伦理动因,以凸显班恩对复辟时期英国民众野蛮特性的反思所包含的丰富伦理学意蕴。

一、欧奴诺可的伦理身份与行为困境

小说《欧奴诺可》的主人公欧奴诺可原本是西非科拉曼丁部落的王位继承人,他作战勇敢,屡获战功,以一己之力捍卫着部落的安全,在战争中擒获很多战俘。班恩笔下的这个“欧奴诺可”是欧洲文学史上“高贵的野蛮人”形象的起源。E. L. Steeves认为:“高贵的野蛮人作为文学形象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尤其常见。”^[7]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是此类形象的代表。但班恩笔下的欧奴诺可与奥赛罗相比更加完美,他从外貌到品德几乎没有什么缺点。班恩以充满传奇色彩的语言描写了“黑王子”完美的身材与长相:“他个子很高,体型之匀称到了极致。即便是最为完美的雕像也不能与王子的形象媲美。一张有如乌檀的脸庞,像是擦亮的黑玉,肤色不像他的族人那样是棕色或黑锈色。一双眸子更是异常深邃、不怒自威,像雪一样洁白的眼白儿与牙齿相

得益彰。”^{[8]15}除了肤色以外,王子在外貌上具备和欧洲人相同的特征;在文化上更加显示出和西方的亲近。王子的老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法国人。在他的教导下,王子不仅精通英语和法语,而且对古罗马人的功绩非常崇拜。总之,“王子在天性上没有一丁点的野蛮,他的优秀品质表明其一定在欧洲某个宫廷受过良好的教育”^{[8]15}。

王子在文化上与其自身民族的错位并未引起矛盾,真正使王子面临危机并导致其命运发生巨大变化的因素是其伦理身份的变化。这具有必然性。因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有关”^[6]。王子是靠战功取得王位继承权的。老国王尽管妻妾成群但没有后代。欧奴诺可在他刚刚能拿得动弓箭的年龄就被带到战场上接受军事训练。由于王子天生善于习武,而且又得到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依默恩达父亲的指导,他在17岁时已经成为卓越的指挥官和战场上最为勇敢的战士。在一场战斗中,老将军替王子挡住了飞来的箭,拯救了他的性命,王子因此接替了将军的位置,经过两年的战斗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回到宫廷的欧奴诺可获得了老国王的信任并获准称呼国王为爷爷,二人尽管没有血缘关系,却在称呼上体现了家庭伦理的秩序。

出于对依默恩达父亲救命之恩的感念,王子决定将战场上获得的奴隶当作礼物送给依默恩达,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成了恋人。按照科罗曼丁当地的风俗,男人是允许三妻四妾的,但王子决定只娶依默恩达一个人。然而老国王垂涎依默恩达的美貌遂将其霸占。此时欧奴诺可的伦理身份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的心上人依默恩达在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王后,而将其占有的人既是国王又是自己的爷爷。这就给王子试图重新夺回依默恩达带来了弑君和弑亲双重禁忌的伦理障碍。欧奴诺可对自己与老国王

身份关系的认同,是他在拯救依默恩达的过程中无能为力的根本原因。王子打猎归来得知依默恩达已经被国王强行带进了后宫,其愤怒像风暴一样强烈,以至于疯狂地用拳头击打自己的身体。王子之所以自虐,是因为他陷于强烈的伦理悖论中不能自拔、无从选择。这与哈姆雷特为父复仇所面对的伦理困境是一样的。只不过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显示出的是他的犹豫、延宕和软弱,而欧奴诺可在面对同样的困境时,他的感情则是外显的。他疯狂的自虐行为与哈姆雷特的内敛形成了鲜明对比,但都是主人公不能解决伦理两难问题而导致的悲剧。依默恩达被卖给奴隶贩子是因为欧奴诺可没有采取任何营救行动,即便是得知她已经被卖作奴隶,王子也只有深陷于悲哀和痛苦之中,没有一点办法。欧奴诺可情感主义的伦理情愫造成了他性格中懦弱的一面,也使他变成了情感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

欧奴诺可伦理身份或角色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他对荣誉的特殊认识。王子跟随来自法国的教师学习人文知识。“他在那里学到如此多的关于人性的知识。同时也赋予了其完善的人格。他懂得了灵魂真正的高贵所在,也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荣誉和纯粹的无私。”^{[8]14}王子将荣誉视为男人的最高责任,其对荣誉的重视决定了他必然不会杀死老国王而做出违背伦理的行动。这就为其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王子中了白人的奸计被胁迫到苏里南,他失去了原来的名字,被命名为凯撒。班恩显然赋予了王子以古罗马帝国凯撒大帝一样的至高荣誉,但他此时的身份是低贱的奴隶。在动员黑人团结起来进行反抗的演说中,欧奴诺可认为起义是符合伦理道德的正义行为,他大声疾呼:“受苦受难的同胞们,为什么我们要做素不相识的异乡人的奴隶?他们岂是在战争中正大

光明地战胜了我們?难道他们是在令人尊重的战斗中战胜了我們么?倘若如此的话,即便是做奴隶也不会使任何一颗高贵的心愤怒,更不会对任何一个战士的灵魂发狂。”^{[8]62} 欧奴诺可在演讲中多次将战争与荣誉、高尚联系起来,认为只有通过公平战争的形式成为奴隶才是符合伦理规范的。对此,我们不能仅仅用道德的立场对欧奴诺可进行简单的评价。我们要上升到文学伦理学的高度,即不仅要评价欧奴诺可赞扬战争、认可买卖奴隶的事实,更要走进历史现场探索王子对奴隶制度的矛盾认识产生的具体原因。在欧奴诺可所处的时代,西非部落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那时的伦理道德观念确实是将战争的胜利看成是男人的至高荣誉。而拥有奴隶仅仅是被当作荣誉的象征,当然有时也可以买卖,在战场上俘获的奴隶越多,男人的荣誉感就越强烈。王子在战争结束后,为了报答依默恩达父亲的救命之恩,将150个奴隶当作战利品送给依默恩达即是典型的例子。当然,这些奴隶在西方殖民者来非洲贩奴之前如何被处置,班恩在小说中并未提及。不过,我们从王子的演讲中可以间接了解到非洲部落的奴隶制是建立在公平决斗的伦理规范基础上的,并非英国殖民者那样使用阴谋诡计。当然随着英国奴隶贩子的到来,获胜的一方也可以选择将战俘卖给他们牟利。这样,殖民地和商业资本下的现代奴隶制就巧妙地结合起来,而带给非洲人民的只能是更加巨大的灾难。商业资本追逐的是利润最大化,奴隶贩子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不惜采取诱骗的方式将欧奴诺可及其仆从押运到苏里南为奴即是最好的证明。

欧奴诺可认为通过战争成为奴隶是合法的,他反对的是采用阴谋诡计的方法将别人变成奴隶。有些读者对此很不理解,他们读到小说中那些原来被王子卖到苏里南的奴隶在见到王子以后不但不记恨他,反而一如既往地尊敬

有加,会觉得黑奴为何如此愚昧。但如果我们走进伦理现场就可以理解这种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行为。在当时的历史和道德情势下,通过双方都认可的战争形式成为奴隶实际上是合情合理的,反之则不合理。所以王子在演说中说:“他们因为干了强奸、谋杀和偷窃的勾当被驱逐出来,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我们的主子。……他们身上没有一丁点儿人类的道德,简直是邪恶之极的畜生。”^{[8]62} 王子宣称在苏里南进行的反抗行为是完全合乎伦理道德的,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地反抗。然而,后来因为黑奴的懦弱和不团结最终以失败告终。高贵的王子受到了当众鞭答的惩罚和侮辱。士可杀不可辱。这种惩罚与王子的荣誉意识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王子的高贵的伦理身份与现实境遇由此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成为王子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抗争的直接原因。

最终王子制定了杀死依默恩达—复仇—自杀的行动计划。欧奴诺可放弃了对白人殖民者的幻想,决定以必死的决心进行反抗。依默恩达也坦然接受了王子的计划,甘愿死在他的刀下。王子的这一杀戮行为是在强烈的憎恨和荣誉受到极大侮辱的非理性境遇下实施的,但是他没想到自己触犯了人类最大的伦理禁忌,并带来严重的后果。欧奴诺可杀死依默恩达以后就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他捶胸顿足,发出像野兽一样的嚎叫,呼喊着她的名字,他本想挣扎着去复仇,但巨大的痛苦战胜了愤怒,使他丧失了行动能力。这种触犯伦理禁忌带来的痛苦和自责与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的痛苦同样强烈。欧奴诺可就这样躺在依默恩达的尸体旁边不吃不喝地度过了8天时间,到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虚弱至极,像是在疾风中摇摆的树枝,只能束手就擒被凌迟处死。

欧奴诺可强烈的伦理意识,使他自始至终处于恐惧之中。王子的伦理意识决定了《欧奴

诺可》这部小说的伦理性质。欧奴诺可没有杀死老国王的时候,暂时逃脱了伦理的悲剧;但是他在杀死依默恩达以后,最终却犯下了弑妻的伦理禁忌,其道德恐惧也达到了顶点,最终使他悲痛欲绝,接近疯狂。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造成欧奴诺可陷入伦理困境的原因,并不像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那样来自他们自身的性格缺陷,而是罪恶的奴隶制。如果没有灭绝人性的殖民者惨无人道的统治和不讲信义的行为,作为一个拥有高尚品德和道德感的王子,绝不会弑妻以酿成人间惨剧。

二、人兽因子的失衡与奴隶制的罪恶

《欧奴诺可》中的地点设置在西非的科拉曼丁和美洲的苏里南,将两地联系起来的纽带即为奴隶制。17世纪欧洲国家的奴隶制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完全不同,也与非洲本土存在的奴隶制有着本质区别。欧洲的奴隶制源远流长,源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从起源上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天生的奴隶,因缺少理智只好听凭有远见的他人支配,非希腊人便是这种天生的奴隶;另一类是后天的奴隶,战争暴力使然,强者为主,弱者为奴。亚里士多德将奴隶视作“一种有生命的财产”,“一种有生命的工具”,把主奴关系看作是古代家庭关系中的三要素之一。^[9]《欧奴诺可》描绘了17世纪末期西非与南美两地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在经济活动上的联系。加拉格尔认为:“17世纪后半叶,英格兰、西非、加勒比地区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整体’,也就是所谓的‘三角贸易’。此项贸易以从非洲贩卖奴隶到美洲为开始,随后把美洲的货物,主要是蔗糖、烟草运回英格兰。”^[10]奴隶贸易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产物。在苏里南经营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的首先是英国,后来英国把这

块殖民地给了荷兰,用以交换新阿姆斯特丹。

罪恶的殖民活动与奴隶制度紧密联系。为了得到奴隶,奴隶贩子采用了各种各样卑劣野蛮的手段。欧奴诺可被贩卖到苏里南的过程即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曾经与欧奴诺可做过多次奴隶生意的英国船长来到科拉曼丁。这一次,他不是从王子那里购买奴隶,而是假意邀请王子和他的100多个随从参加船上举行的宴会,等到他们酩酊大醉以后给他们戴上枷锁将他们卖到苏里南为奴。王子被限制人身自由以后,小说描写了他动人心魄的反抗:“他暴跳如雷,为获得自由不断反抗,但一切都是徒劳。他宁死也不愿做奴隶,手脚都被戴上了镣铐,抽不出手来,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要不是全身上下被死死地捆住、动弹不得,他就一头碰死在船上了断这屈辱的人生。实在无计可施了,王子下决心绝食。”^{[8]38}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打动船长。黑人越是反抗,他越觉得黑人都是一副德性。船长是不会在乎奴隶的痛苦,不过他也担心绝食会损失一些身体各方面都很优秀的“财产”,于是,他就派人去欺骗欧奴诺可,说等船一靠岸就会把他们释放。欧奴诺可从来没想过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随意违背自己承诺的人,他相信了船长的诡计。当欧奴诺可要求船长把他身上的锁链解开时,船长认为一旦把他释放,他一定会复仇,从而对自己和船只不利。欧奴诺可以自己的荣誉保证他完全会服从船长的命令,但船长说他无法相信一群毫无信仰的异教徒。狡诈阴险、不讲诚信的恶徒居然怀疑把荣誉视作生命的王子的诚信,真是绝妙的讽刺。船长最终还是背信弃义把欧奴诺可和他的随从全部卖到了苏里南的甘蔗种植园。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在所有欧洲殖民地,甘蔗都是由黑奴来种植。据说,出生于欧洲的温带的人的体质,不能在西印度的烈日下去挖土劳动。”^{[11]424}苏里南是西印度的一部分,欧奴诺可与其他黑

奴从事的就是甘蔗种植业。

小说中不讲信义、冷酷无情的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贝姆,也是欧奴诺可最为痛恨的对象。通过此人,王子才彻底认清了西方殖民者和基督教文明的虚伪面目,并下定决心做殊死反抗。贝姆是苏里南的代理长官,他善于奉承,巧舌如簧,开始一直假惺惺友好地对待欧奴诺可,后来却成了唯一主张对王子采取暴力措施的家伙,主动请求带领军队去抓欧奴诺可。黑奴因为怕自己的老婆孩子受到伤害,刚上战场就纷纷投降了,抵抗到底的只有欧奴诺可、依默恩达和托斯卡纳三人。贝姆在说服欧奴诺可投降的长篇游说中将自己的诡诈本性暴露无遗。他首先分析了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接着恭维欧奴诺可的勇猛举世无双以至于他愿意为之效劳。他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因为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过激的勇气,以及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对自由的急躁渴望造成的。贝姆试图像诱骗欧奴诺可的船长一样故伎重施,信誓旦旦地向王子保证只要他投降就会给他们自由,允许他和妻子离开此地。已经上过一次当的欧奴诺可自然不会轻易相信这群背信弃义的白人了,他愤恨地说:“白人从来不讲信用。你们信仰的上帝只教会你们虚伪。诚实的人都不想和你们共处。我知道怎样和重视荣誉的人们打交道,但是和你们在一起就得时刻做好自卫准备,即使在你们的宴会上也得时刻带着武器。为我的安全起见,我现在最好不要相信你说的每一个字。”^{[8]66}但是和欧奴诺可素来要好的特弗里相信了贝姆的承诺,流着眼泪拉着王子的手劝他投降,并将这些条件白纸黑字地写在了合约上。但是一到种植园,贝姆就违背了合约,欧奴诺可和叛变的奴隶马上受到了惨无人道的鞭笞惩罚。欧奴诺可被打得皮开肉绽,那群残暴成性的家伙还在他的伤口上撒上辣椒粉以增加他的痛苦。但是欧奴诺可面不改色也不呻吟,只是朝着那个不讲信

义的殖民地官员贝姆翻白眼。欧奴诺可的道德意识与贝姆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王子看来,不讲信义是男人最可耻的行为,而贝姆却丝毫没有负罪感。

聂珍钊认为:“人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等同于一个完整的斯芬克斯因子,因此身上也就同时存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在这两种因子中,人性因子是主导因子、其核心是理性意志。人性因子借助理性意志指导、约束和控制兽性因子中的自由意志,让人弃恶从善,避免兽性因子违背伦理。但是一旦人身上失去了人性因子,自由意志没有了引导和约束,就会造成灵肉背离。肉体一旦失去灵魂,就会失去人的本质,只留下没有灵魂的人的空壳。没有灵魂的人完全依靠本能生存,没有伦理,不辨善恶,与野兽无异。”^[12]就此而言,小说中以贩奴船长和贝姆为代表的殖民者身上,完全失去了人性因子,只有兽性因子存在。殖民地议事会的成员也是一群连伦敦的新门监狱都不愿意接收的恶棍。他们既不信仰上帝,也不遵守人间的律法。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品德能够称得上是人类的,他们失去了人性因子,也就失去了正常人的感情,剩下的只是人的躯壳。

威斯康欣在《一个堕落的民族:英国人的野蛮性在班恩〈欧奴诺可〉及〈风流寡妇〉中的呈现》一文中指出:“品行不端,好战成性,嗜酒如命,凶猛暴躁,原始粗鲁,智力迟钝,冲动鲁莽,蔑视权威,不事稼穡,不安于家室。以上这些特点从古代直到近代早期都是北欧民族野蛮本性的突出表现。同地中海沿岸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相比,这些北方蛮族是一群残忍成性、无组织、仍处于原始社会的乌合之众,他们对文化进步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英国近代早期的读者很容易发现班恩作品中这些残忍的英国暴徒的祖先一定是来自日耳曼族,即民族学中概念上的挪威人、荷兰人、爱尔兰人以及威尔士人

等。”^[13]虽然17世纪末的英国经历了内战—共和—复辟的国内动荡,但这些并没有影响英国殖民主义的脚步,进而将暴力输出到殖民地。英国在1667年成立皇家非洲公司后,贩奴活动逐步走向高潮。复辟时期的英国,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更加激发了这群乌合之众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殖民地掠夺的欲望。早期的殖民者实际上是由一些犯罪分子和海盗组成的。野蛮的奴隶制度与商业资本结合,带来的是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给非洲和美洲人民带来的却是无尽的苦难。

三、结语

失去人性因子制约的英国殖民者只能变成兽类,成为非人,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资产阶级对于金钱的狂热。莎士比亚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即在其戏剧《雅典的泰门》中形象地描述了金钱统治世界、造成人类堕落的惨状:“你的奴隶,那些人类要造反了,快快运用你的法力,让他们互相砍杀,留下这个世界来给兽类统治吧。”^[14]考德威尔也认为:“在每一个资产阶级看来,他的本能,以及他的所谓自由,似乎是不能容忍地受到了法律、公理和约束等的限制,而美和生命似乎只能靠大力扩张他的欲望才能得到。放纵的意志,‘残忍、大胆和坚决’,这便是原始积累时期的精神。”^[15]《欧奴诺可》中同样充满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者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意志的个人意志,他们撒谎成性,奸诈卑鄙,残忍野蛮,运用阴谋诡计将欧奴诺可置于死地。欧奴诺可和依默恩达身上则充满了人性中的优点,他们集中了人类的一切美德。然而正因为讲究诚信和荣誉,他们才被殖民者利用,最后造成悲剧。小说围绕伦理主题深刻揭示了纯善与至恶的斗争。最终,由于以贝姆为代表的恶的一方力量过于强大,善恶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殖民者才能为所欲为地将人类的良

知踩在脚下。亚当·斯密认为:“欧洲人民也许会日渐衰落,世界各地人民的勇气和实力达到相同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相互恐惧,从而压制独立国家的不公正行为,使其能彼此尊重对方的权利。”^[11]⁴⁵¹《欧奴诺可》向我们描绘了查理二世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在金钱的刺激下,由于失去人性因子的控制使其身上压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野蛮因子复苏,最终转变成兽类,成为非人的可怕画面。它深刻地说明,人类的自由意志如果不加以控制,最终唤醒的只能是人性中的残忍一面,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小说中殖民者的野蛮与印第安人的善良、非洲人的信义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之,17世纪英国女作家班恩从伦理层面对尚处于上升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野蛮本性的批判发人深省,这是该小说的进步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GQOLA P D. “Where there is no novelty, there can be no curiosity”: Reading Imoinda’s body in Aphra Behn’s “*Oroonoko* or, the royal slave” [J]. *English in Africa*, 2001(01): 105.
- [2] 普莱斯特利. 英国小说概论[M]. 李儒勉,译.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6.
- [3] 李维屏,宋建福,等. 英国女性小说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28.
- [4] Adam Sills. Surveying “The map of slavery” in Aphra Behn’s *Oroonoko* [J].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2006(03): 314.
- [5] HUGHES D. Race, gender and scholarly practice: Aphra Behn’s *Oroonoko* [J]. *Essays in Criticism*, 2002(52): 22.
- [6]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1): 13.
- [7] STEEVES E L. Negritude and the noble savage [J].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73(01): 91.

- [8] Aphra Behn. *Oroonoko* [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03.
- [9]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6 - 22.
- [10] Catherine Gallagher. Introduction: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roonoko, or the royal slave*, by Aphra Behn [M]. Boston: Bedford, 2000: 4.
- [11]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唐日松,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12]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4: 45.
- [13] VISCONSI E. A degenerate race: English barbarism in Aphra Behn's *Oroonoko* and *The Widow Rant-er* [J]. ELH, 2002(03): 673.
- [14] SHAKESPEARE W.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M]. 3th ed. David Bevington. Glenview Illinoi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0: 1272.
- [15] 考德威尔. 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 上 [C]. 陆建德, 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 64.

(上接第15页)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657.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5: 160.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70.
- [12] 李克强.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EB/OL]. (2014 - 03 - 05) [2017 - 02 - 26]. <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4npc/n/2014/0305/c376646-245-35026.html>.
- [13] 李克强.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EB/OL]. (2016 - 03 - 05) [2017 - 02 - 26]. <http://www.people.com.cn/n/2015/0305/c347407-26643598.html>.
- [14] 习近平. 二〇一七年新年贺词 [EB/OL]. (2016 - 12 - 31) [2017 - 02 - 28].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12-31/8110808.html>.
- [15] 李培林, 魏后凯, 黄承伟. 中国扶贫开发报告 (2016) [EB/OL]. (2016 - 12 - 29) [2017 - 04 - 21]. http://ex.cssn.cn/zk/zk_zkbg/201612/t20161229_3363778.html.
- [16] 搜狐. 习近平在海南考察 [EB/OL]. (2013 - 04 - 10) [2013 - 04 - 11]. <http://news.sohu.com/20130410/n372274163.s.html>.



引用格式:董书雅. 污点证人制度浅析——以贿赂犯罪为视角[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4): 97-102.

中图分类号: D915.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4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4-0097-06

污点证人制度浅析

——以贿赂犯罪为视角

An analysis of tainted witness system

—Taking crime of bribery for example

董书雅

DONG Shu-ya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北京 100000

摘要:当前,随着我国贿赂犯罪主体的扩大化、手段的多样化,贿赂犯罪类案件呈现出明显的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特征。贿赂犯罪证据的取得与固定、案件侦查等难度越来越大,而污点证人制度对有效提取贿赂犯罪证据、提升证据稳定性,从内部攻破贿赂犯罪堡垒、提高成案几率等,都有重要作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为司法实践中污点证人作证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法律支撑。在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构建有限罪行豁免,由人民检察院启动、人民法院决定适用与否,并辅以相应措施的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关键词:

贿赂犯罪;

污点证人制度;

司法困境

收稿日期: 2017-05-09

作者简介: 董书雅(1990—),女,河南省登封市人,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当前,贿赂犯罪日益呈现智能化、集团化、隐蔽性深、反侦查能力强等特征,使得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常常陷入困境。而《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行贿处罚力度的加大,改变了长期以来“重受贿、轻行贿”的立法思路,为贿赂犯罪案件污点证人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契机。目前,污点证人在我国仍是一个学理概念,相关立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司法实践的分析,阐述了我国构建这一制度的必要性。本文拟结合《刑法修正案(九)》对贿赂犯罪相关规定的完善,以贿赂犯罪为视角,对建立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构建我国贿赂犯罪案件污点证人制度的具体要求,以期有效避免因证据不足等原因导致无法立案的情形,从而提高成案几率。

一、污点证人制度

1. 污点证人不同于一般证人

顾名思义,污点证人是证人的一种,其与普通证人的区别在于:其一,该类证人的身份是带有污点的,是待罪之人:参加了相关的犯罪活动,触犯了相关的刑事法律,符合刑法犯罪构成要件,因而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是说,如果某证人仅仅有一般违法行为而没有构成犯罪,或是其行为只是违反党纪党规,抑或是违反道德,则不符合污点证人要件。其二,污点必须是现实的,即刑罚尚未处理完毕的。如果证人已经受到了刑罚处罚,则该证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证人,而不是污点证人。其三,污点证人必须是与案件有关联的人。由于污点证人属于证人范畴,而了解案件情况是证人的基本特征,所以污点证人必须是了解案件情况的人,且其证言具有稀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如果缺乏其证言,则无法查明相关案件事实真相,不能成功指控犯罪。

基于以上所有关于污点证人特点的描述,笔者认为,所谓污点证人就是指与案件有关联的犯罪嫌疑人,由于其掌握稀缺性的证据,可用来控诉更为严重的罪行,因此可通过赋予其一定程度的司法豁免权而强制其作证。

2. 污点证人制度的交易性

污点证人作证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之后在很多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中都出现了与之相关的规定,部分大陆法系的国家也渐渐开始引用该制度。污点证人作证制度是指,为了获得某些重要或重大案件的证据,或为了追究共同犯罪中首恶分子的严重罪行,对掌握其犯罪证据的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作出承诺:如果他们放弃拒证权在法庭上提供这些证据,将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不得将从中获得的信息在之后的诉讼中用作不利于该证人的证据。^[1]

污点证人作证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进行的司法交易,即污点证人放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提供能够证明他人有罪且罪重的证言或证据线索,从而获得控诉机关对其量刑上一定程度的豁免,以使更大刑罚权得以实现的一项司法制度。“‘污点证人作证豁免’从产生之初就是以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特权的抗衡物之面目出现的”^[2],这也是司法机关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的一种平衡。

二、贿赂犯罪案件中的污点证人制度

1. 当前我国贿赂犯罪的现状

当前,我国贿赂犯罪类案件的犯罪主体逐渐呈现扩大化的趋势。随着分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公职人员不分性别、年龄、工作单位等都成了贿赂的对象,且贿赂犯罪改变了以往简单明了的权钱交易形式,犯罪手段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的特征。“一对一”贿

赂案件增多,行、受贿双方为了规避法律制裁,往往挖空心思采取最隐蔽的交易方式,甚至相互订立攻守同盟。

2. 贿赂犯罪类案件侦办过程中的困境

贿赂犯罪案件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少,办案主要依赖于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导致贿赂犯罪案的侦查取证工作困难重重。

首先,贿赂犯罪侦查难度较大。在侦查方面,由于行、受贿双方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双方相互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并且案件知情人大部分又是彼此的至亲或者被牵扯到其中的人,这就使得犯罪事实更加难以暴露。另外,这些犯罪主体大多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他们往往会在案前缜密策划、案后商定攻守盟约,且凭借自己的职权形成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保护层,动用各种力量阻挠案件的侦查。

其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稳定性不足。贿赂犯罪案件对言词证据有较强的依赖性,而言词证据很容易发生变化,且该类证据的取得不但依赖于侦查人员的努力,而且主要取决于被调查对象的配合与否,这就使得证据的取得和固定都有较大的困难。

3. 贿赂犯罪中的污点证人与《刑法修正案(九)》

在当前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建构适用于贿赂犯罪案件的污点证人制度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迫。《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行贿罪立法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对行贿人特别是自首制度的滥用,维护了法律应有的尊严。

《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行贿犯罪的完善,加大了行贿罪的处罚力度,主要是增加了财产刑,拓宽了行贿犯罪中罚金的适用范围,严格了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条件。例如,《刑法修正案(九)》第45条第2款对行贿罪减轻、免除处罚作出了新的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

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众所周知,贿赂犯罪具有对合性,受贿犯罪案数量之所以居高不下,与行贿活动的猖獗是密不可分的。从司法实践看,我国当前不仅行贿罪的刑事追诉率低下,而且对于行贿人的量刑也明显过轻。根据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6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4万件4.9万人,而对行贿犯罪在加大打击力度后判处罪行的仅有2495人。可见,行贿罪的查办人数要远低于受贿罪。

三、构建贿赂犯罪案件污点证人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 构建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必要性

贿赂犯罪之所以呈现上述状况与特性,从司法实践来看,有可能是因为证据不足而导致无法对其立案。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污点证人制度能有效地获取相关证据,并提升证据的稳定性,有利于从内部攻破贿赂犯罪的堡垒,提高成案的几率。

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虽是司法文明化的标志,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理念,但也间接提升了控方对证据的搜集难度,对司法机关办案案件具有较为明显的制约性,甚至可能因证据不足而导致控诉失败。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消除证人作证和控方获取证据的障碍,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找到平衡点,污点证人作证制度是很好的选择。

2. 构建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可行性

随着刑事司法理念的不断更新,证据优于口供的证据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该制度的实质是为了保护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较小的利

益,具体来讲就是司法机关为了追诉更严重的犯罪,牺牲对污点证人的追诉权,使其放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这一特权,用合法的手段保证犯罪证据的搜集,以获得重大犯罪或者较为严重罪行的关键证据,从而实现了对犯罪的有效惩罚。所谓利益权衡原则,是指在司法活动中,当多种利益之间产生矛盾而不能兼顾时,选择国家和社会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的一种价值观念。污点证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案件的实体正义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程序正义之间发生冲突时,通过权衡,牺牲案件部分正义,从而求得同时满足案件的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的一种制度安排。

我国《刑法》中对“自首”“立功”等的规定,以及《刑事诉讼法》中“酌定不起诉”的相关条款,都为司法实践中污点证人作证制度的实施也提供了法律支撑。这些规定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有污点证人作证的相关内容,为污点证人制度的构建奠定了法律基础。

四、我国贿赂犯罪案件污点证人制度的构建

1. 贿赂犯罪案件污点证人制度的豁免类型

通过对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污点证人制度的考察,适用的豁免类型主要分为罪行豁免与证据使用豁免两种类型。

罪行豁免是指国家不得对被豁免的证人就其提供的证言中所涉及的任何罪行进行起诉,污点证人作为控方证人被彻底免除了证言涉及案件的刑事责任。这种豁免对污点证人是最为有利的,能够消除污点证人的顾虑,从而使其与侦查机关积极配合并提供实质性帮助。但是这一豁免类型对于国家追究犯罪、实施国家刑罚权是不利的,因为国家必须完全放弃对有很大犯罪嫌疑的污点证人的刑罚权,这必然会损害有罪必罚的司法公正原则^[3],不利于国家刑罚

权的实现,且存在被滥用的风险。比如,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污点证人往往会在作证时将控诉罪行之外的事实塞入证词“搭便车”,这会增加案件侦办的难度,也违背了污点证人作证制度为了较大法益而放弃较小法益的初衷。

证据使用豁免是指被豁免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以及以其所提供的证言为线索而获得的任何信息,不得在之后的诉讼中用作不利于该证人的证据。证据使用豁免中,污点证人的犯罪污点只是有限清除,其刑事责任也并非彻底免除,检控机关仍可以根据其他独立合法的证据来源指控污点证人的犯罪行为。很明显,对于污点证人来说,这种豁免方式具有一定的风险,即一旦控方从其他渠道获得相应的证据,且能证明该证人的行为是违法犯罪的,则仍旧可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有限的罪行豁免”更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4],即在污点证人作证制度实施中,污点证人被豁免的罪行仅限于污点证人证言涉及且本人参与的犯罪活动,并且不免除污点证人作伪证的责任,以及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此类罪刑豁免是有诸多限制条件的,这既可以防范权力滥用、契合严惩腐败政策的需要,也可以避免罪行豁免带来的不利影响。

2.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的适用条件

为了防止污点证人制度的滥用,有学者认为,贿赂犯罪案件污点证人制度的适用范围应该限制在涉及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深远、取证困难的重大贿赂案件^[5],如主犯有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中,适用的范围不能过于宽泛。同时,应对贿赂犯罪污点证人的适用对象加以限制,如贿赂犯罪中的污点证人只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罪行较轻的行贿人、介绍行贿人等,且其所能提供的证言与相关证据是破获案件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与罪行较轻的行贿罪相比,受贿罪的危害

程度更高,尤其是在国家工作人员索取贿赂犯罪案件中,行贿人实施行贿行为更是无奈的权宜之计。因而,只有通过放弃对侵害法益较小的污点证人的追究,达到破获重大贿赂犯罪的目的,才能体现污点证人作证制度的优越性,实现良好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3.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的运作程序

污点证人制度的运作程序主要包括启动权、决定权、执行权与法律监督权。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污点证人制度的运行程序,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由检察机关自行启动并决定是否豁免,无须法院的批准;二是由检察机关启动,并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最终决定是否豁免。这两种运行程序各有优缺点,前者可提高诉讼和司法工作的效率,而后者则更能保证该制度不被滥用,并最大限度地保证豁免行使的公正性。

结合我国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的具体国情与司法制度,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应享有污点证人作证制度的启动权。这是因为检察机关是重要的法律监督机关,也是决定各类案件是否起诉的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如认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对于案件侦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侦查机关就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启动污点证人作证制度;在移送起诉以后,人民检察院如发现被告人符合污点证人的适用情形,人民检察院也可自行启动污点证人作证制度。在贿赂犯罪案件中,由于检察机关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所以应由省级以下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提出使用污点证人作证制度的初步意见,报同级检委会审查并决定是否启动该制度,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适用。因为法院作为我国唯一的审判机关,拥有定罪量刑的最终决定权,而污点证人制度就是将污点证人由有罪转化为“无罪”,因而理应由法院决定是否启动该制度,由检察机关去具体执行。

4.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法律后果

根据前文的探讨,如果司法机关同意豁免相关污点证人,那么该证人就有了法定的出庭作证的义务,应如实作证,同时不再享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权。对于被豁免后拒绝作证的污点证人,可以强制要求其作证,也可以对其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如拘留罚款等,情节更为严重的,可以对其采取刑事措施,如拘传等。如果污点证人在被批准作证豁免之后做虚假陈述、不如实作证,司法机关可以依照伪证罪的规定同将要对其豁免的罪行进行数罪并罚,也就是说依据我国《刑法》第305条的相关规定,如果该污点证人从犯罪构成上达到了伪证罪的要件,那么就應該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5.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配套制度

“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又拒绝予以救济时,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文不值。”^[6]在贿赂犯罪案件中,污点证人更容易受到打击报复,因此,在贿赂犯罪案件中,除了要采取对证人的身份进行保密等一般证人保护措施外,还需要对其进行特殊保护,如可以根据需要对污点证人及其家属采取短期的贴身保护,在作证后帮助他们更换住址和工作单位等。对贿赂犯罪污点证人的保护应贯穿整个诉讼进程,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明确具体的保护机关,避免各机关之间相互推诿而造成对证人的保护不力。

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基于意志自由,会自愿成为控方的污点证人,即意味着放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必须如实作证,这是其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若污点证人弄虚作假、提供虚假证据,或违背承诺、没有按法律要求履行相应义务,司法机关便可采取强制手段对其进行处罚。美国学者认为,“豁免权立

法的目的就是确保在询问证人的时候证人可以开口,如若不惩处藐视法庭的行为,不论何种豁免权都不会在保持沉默不语的证人身上发生任何作用。倘若不惩处做伪证的行为,那么得到豁免的证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欺瞒陪审团,可能促使调查活动误入歧途”^[7]。所以,我们有必要设立拒证罪,倘若污点证人在取得刑事豁免权以后依然拒绝为检察机关作证,就可以以此罪来对其认定。

综上,域外国家污点证人制度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该制度在反腐败案件,尤其是疑难贿赂案件中的独特作用。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在我国也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它既不违反我国刑法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也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立功制度一样具有坚实的道义基础和道德相容性。当前,在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构建有限罪行豁免,由人民检察院启动、人民法院决定适用

与否,并辅以相应措施的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 [1] 陈光中. 刑事诉讼法(修正)实务全书[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209.
- [2] 程荣斌. 诉讼法学新探[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74.
- [3] 邬炼,吴璇欧. 污点证人的罪行豁免与证据使用豁免[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7(10):28.
- [4] 汪海燕. 建构我国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J]. 法商研究,2006(1):27.
- [5] 戴东风.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浅析[J]. 检察日报,2014(1):22.
- [6] 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M]. 黄风,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68.
- [7] 王进喜. 刑事证人证言论[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53.



引用格式:杜启顺.我国婚姻家庭法的独特性及其对法学人才培养的启示[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4):103-108.

中图分类号:DF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103-06

我国婚姻家庭法的独特性及其对法学人才培养的启示

The specificity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of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law talents cultivation

杜启顺

DU Qi-shun

河南大学 法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我国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人才、德法兼修的法律人才、具有综合能力的法律人才。婚姻家庭法的独特性在于:伦理性突出,公权力干预趋于深入;注重维护家庭稳定,保护弱势成员权益;诉讼程序由一般审判转入家事审判。这对于当今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有重要的启示:要凸显伦理性,将道德教育与法学教育相结合;注重人文精神培养,注意将法律的司法功能与社会功能相结合;回应社会关切,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关键词:

婚姻家庭法;
独特性;
人才培养

收稿日期:2017-04-12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BFX007);河南大学第十二批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杜启顺(1977—),男,河南省潢川县人,河南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婚姻家庭法。

人才是法律工作的重要主体,人才培养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事业的发展。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时代的到来,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都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和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我国的法学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将立法和司法新的实践经验融入法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将培育和规塑适应时代发展的法学人才作为基本取向。鉴于此,本文拟基于我国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以婚姻家庭法所反映出的法理精神与司法取向为例,谈谈我国法学人才培养应当着力的几个问题,以期进一步提高我国法学人才培养质量,为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好的人才支撑。

一、我国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讲话为我们确立新时代的法学教育培养目标指出了方向,我国的法学教育必须体现我国国情,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人才、德才兼备的法律人才、具有综合能力的法律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指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我们的体制、机制,有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对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要积极吸收借鉴,也要加以甄别有选择的吸收和转化,不能囫圇吞枣、照搬照抄。”^[1]我国的法学教育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培养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法律人才;培养以我国国情为基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生奋斗目标的具有家国情怀的法律人才;培养既能借鉴和批判西方法学思想,又能结合我国国情大胆创新的法律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法学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而且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1]因此,法学教育不仅要培养精通法学基本原理、思想、知识、术语、方法和技能的法律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培养道德素养高、有社会责任感、社会担当的与当前我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心同向的法律人才。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法律所体现的法理隐含着伦理道德,通过法学教育中解释法律背后的法理来潜移默化地开展道德教育,是我们培养德才兼修法律人才的重要教学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1]因此,法学教育不仅要培养理论人才,更要培养实践人才。随着当前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处理法律事务不仅仅需要法学专业能力,还需要谈判能力、心理分析和评判能力等综合性能力;随着大学教育的大众化,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并非全部都从事法律职业,这就需要法学教育必须拓宽领域,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随着社会变迁和知识更新的高速化,法学教育必须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从而应对时代的变革和知识的高速更替。

二、婚姻家庭法的独特性

婚姻家庭法不同于其他法律,其在法律属性、法律理念、诉讼程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特性。

1. 法律属性:伦理性突出,公权力干预趋于深入

人类社会的亲属身份最初是由自然选择而

形成的,随后由伦理道德予以调整,最后演变为由法律调整。婚姻家庭法与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性是婚姻家庭法的主要特征。婚姻家庭是基于自然法则的社会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等亲属身份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各成员之间有相互抚养、扶助和照料爱护的权利和义务。法律与道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婚姻家庭法与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具有一致性,它们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共同发挥着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婚姻家庭法伦理源自人类为维系自身繁衍和家庭和谐有序的内在需求,并在当代蕴含着尊重生命、禁止乱伦、平等与尊严、敬老爱幼、适度的个人自由等内涵。”^[2]在婚姻家庭中,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保障,婚姻家庭法是法律化的道德和道德化的法律,伦理性是其鲜明的特征。在现代化浪潮推动下,家庭伦理也经历着再造和重新定位的过程,我国的家庭关系趋于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夫妻、亲子关系居于主要地位。^[3]从伦理学角度来看,对子女的利他主义多是从上一代人传承给下一代人,并且世代相传。^[4]家庭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着利他现象,这正是婚姻家庭人伦关系的本质要求和特征体现,它是婚姻家庭伦理强加给家庭成员的道德义务,这些义务又通过立法转化为了法定义务。^[5]

婚姻家庭法从法域划分来说,属于典型的私法领域,为保持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意思自治和私密安宁,公权力不应当过多地介入家庭事务和家庭纠纷。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民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婚姻家庭领域的一些问题已经慢慢进入公法领域,国家出于平衡当事人利益、保护家庭中的弱者、维护家庭关系稳定的目的,使公权力的干预不断深入和扩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强调了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强调通过强制报告、临时庇护、人身安

全保护令等一系列公权力介入家庭纠纷的措施,以达到保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目的。^[6]在对儿童权益保护方面,公权力的介入力度也在慢慢扩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和扶助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基于婚姻家庭关系的伦理性和社会属性,且考虑到婚姻家庭关系所涉领域的广泛性,公权力的适当介入对稳定家庭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法律理念:注重维护家庭稳定,保护弱势成员权益

婚姻家庭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伦理性 and 相对稳定性的特征,夫妻相爱、父慈子孝和天伦之乐是人的本性要求,家庭关系一经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婚姻家庭关系的良好发展,无论是对个人的权利维护,还是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在面对很多离婚类的案件时,法律倾向于慎重对待,不主张轻易将家庭作解体处理;在纠纷解决方面,也多使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这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婚姻家庭关系稳定性的重视。所以,婚姻家庭法旨在通过法律规范的方式,达到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平衡、家庭和睦美满的目的,以维护婚姻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的和谐稳定。

婚姻家庭法属于身份法,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其人本主义精神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对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的保护。^[7]上文提到的反家暴法,将公权力的保护伞延伸到了封闭的家庭中,以期达到惩治施暴者、保护家暴受害者目的。我国现行《婚姻法》第46条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和离婚补偿制度,完善了离婚的救济手段,保护了在离婚时处于弱势地位又为家庭作出重大贡献成员的权益;在与婚姻家庭关系相衔接的其他法律制度如《继承法》中,规定了尽主要抚养义务的家庭成员往往多分遗产,没有尽到抚养义务的家庭成员少分或者不分遗产;《刑法》中将有能力抚养而拒绝抚养没有独

立生活能力家庭成员的情节恶劣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可见,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其在妇女、儿童、老人等处于弱势、易受损害的成员权益保护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3. 诉讼程序:由一般审判转入家事审判

目前我国家事案件数量众多,对此,法院长期适用的是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其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一般审判程序采用的是对抗模式,双方的竞争力基本上是平等的,而在家事纠纷中,当事人之间往往属于不平等的身份关系,如夫妻、亲子之间很难进行平等的对抗,因其涉及感情、亲情和道德,是非难以判断。家庭纠纷解决的根本目的是促成当事人恢复感情、消除矛盾、实现和解,而一般民事审判会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这非常不利于矛盾的化解。一般民事审判以判决作为主要的裁判方式,而家事审判通常以调解与和解为主要裁判方式,非诉讼化的手段经常被运用到其中。

婚姻家庭类纠纷不仅具有人身和财产关系的复杂性,且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多牵涉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如父母离婚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将“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处理原则,切实保护儿童的利益。再者,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很难进行是非分明的判断,而且在案件解决过程中往往涉及个人和家庭的很多隐私,不宜作公开型的审理。因而,一般的民事诉讼不利于离婚类家庭纠纷的解决,法庭上唇枪舌战的激烈对抗只会造成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所以在家事类案件的解决中,应把调解与和解作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基于此,很多国家采取了区别于一般审判的审判模式,并进行了特别立法,如在程序法中单设“家庭事件程序”一章。^[8]近年来,我国在婚姻家庭类纠纷解决中也非常注重家事审判模式的运用,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婚姻家庭法的独特性对法学人才培养的启示

婚姻家庭法既符合并浸透着一般法理精神,又有自身独特的本质和属性。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注重维护家庭稳定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理念,以及采取家事审判的独特审判程序和机制,对于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有着重要的启示。

1. 凸显伦理性,将道德教育与法学教育相结合

在德才兼备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导下,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启示我们,法学教育应当将道德教育融入其中。

作为家事法,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商法等私法的伦理价值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有诸多不同之处。这些私法的价值理念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利益,而婚姻家庭法的价值理念则是人格独立下的团体主义,在保障个人利益的同时更强调要通过协调矛盾以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因此,婚姻家庭法的具体条令,蕴含着和谐、责任的伦理精神。所谓“和谐”不是无原则地抹煞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而是强调在分清矛盾性质的基础上采取协调和调解的方式予以解决;所谓“责任”也不是摒弃利益差异而一味地强求当事人去承担,而是在承认当事人利益差异的前提下,要求他们自觉担负起自己必须承担的义务。法学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塑造法治人格和法律信仰。显然,这两种理念对我国法学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要。它们既是对专业法律知识的有益补充,更是培育法律人才法律信仰的重要道德理念支撑。

如何才能将这两个理念灌输到受教者的心中而为他们认同和接受?总的思路是将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相结合。一是重视道德素养的提升和道德人格的养成。在进行专业的法律教

育的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吃透法律条文的基础上领会浸透其中的伦理道德精神,学会从双重维度即法律和道德维度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二是要引导学生自觉将和谐、责任这两种基本的法律原则贯彻到对法律案例的分析与案件的解决之中。这里的难点是如何走出“工具理性”即将法律纯粹当作工具的误区。为克服这一难题,我们的法学教育应采取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思路。例如我们可以在法律系专门开设哲学和伦理学课程,以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而自然而然地塑造其道德伦理人格。三是要组织学生对相关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增加师生互动,通过苏格拉底式的询问与辩论,增加他们的内心体验与感悟。要让学生自觉地体会到:法律案件的处理和纠纷的解决,不仅需要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和对法律规则的正确运用,还需要以和谐、责任原则为指导。

2. 注重人文精神培养,注意将法律的司法功能与社会功能相结合

婚姻家庭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的稳定对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婚姻家庭法既蕴含着追求公平正义的一般法理精神,又具有维护家庭伦理关系、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人文关怀属性。法学人才培养应自觉对之回应,即在法学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注重培育学生关注社会、关爱民生,关心弱势群体利益的人文精神。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文精神强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是目的和价值,而非手段和工具。作为学法用法的法学专业人员,如果不具备基本的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怀,就不可能把握婚姻家庭纠纷解决的真谛。因此,处理婚姻家庭纠纷,不仅要注重法律效果,更要注重社会效果。也就是说,一个法官首先要对案件事实认定准确,对法律规则要运用正确;此外,一流的法律工作者还必须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关注社会、关爱民

生,尤其要有关心弱势群体利益的人文情怀。

“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法律的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程规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9]这就要求我们的人才培养应将集体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观追求,要坚持以人为本,将法律案件审判的司法功能与矛盾解决的社会功能有机结合。如何才能培育学生这样的人文情怀?这一工作的核心和重点是为学生创设情感体验现场,并为学生积累情感经验提供机会。围绕着这个目标,在专业法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教师应当采用角色体验、示范渗透和心灵感悟等多元体验式教学手段,以案例研讨教学为主,以模拟法庭、角色扮演、诊所教育、师生探讨和法院旁听等方式为辅,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其在体验中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从而内在养成相应的法学素养,塑造良好的法学人格和人文精神。

3. 回应社会关切,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婚姻家庭法对家事纠纷的解决,有两个原则值得我们重视。一个是亲情原则,一个是利益正当原则。亲情原则即在处理婚姻家庭关系时,摒弃那种完全以处理陌生人关系为模式的做法,要考虑到家庭成员间的各种感情;利益正当原则即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时,虽然要考虑到感情,但也要维护家庭成员的正当利益。因此,家事纠纷的诉讼解决理念正由一般审判转入家事审判。这一特点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人才的培养,既要让学生掌握现代法律的一般原则和精神,又要注重回应社会关切,并在法律工作实践中将二者结合起来,从而妥善协调矛盾和利益纠纷。为此,在法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深入到社会生活实践之中。“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于自身,即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10]因此,在法律专业人才培养

过程中,应鼓励和引导学生多多参加社会生活实践,比如进行一些专题社会调查、向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去社区参与居民之间纠纷的调解、去法院参与相关案件的审判协理等。通过这些社会实践,让学生慢慢体会利益正当原则与亲情原则相结合的重要性。

总之,在法律人才培养过程中,只有坚持德法兼修、回应社会关切、注重人文关怀,才能培养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人才,满足新常态下我国法治建设对高层次法律人才的需要,进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 [1] 人民网. 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 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励志勤奋刻苦磨炬促进青年成长进步[EB/OL]. (2017-05-33)[2017-02-10]. politics. people. com. cn/n1/2017/0503/c1024-29252260. html.
- [2] 蒋月. 婚姻家庭法前沿导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8-20.
- [3] 吴帆.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J]. 广东社会科学,2012(2):24.
- [4]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 家庭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57-359.
- [5] 薛宁兰. 婚姻家庭法定位及其伦理内涵[J]. 2015(6):133.
- [6] 夏吟兰. 反家暴法构建起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制度体系[EB/OL]. (2016-03-22)[2017-03-18]. http:paper. pesp. com. cn/rmrd/20160322/21. html.
- [7] 巫昌祯,夏吟兰.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之我见[J].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3(1):30.
- [8] 马忆南. 家事诉讼需要特别程序[EB/OL]. (2012-08-29)[2017-02-16]. http://222. few. gov. cn/portal/html/yixx/2012/0912/19757. html.
- [9] 博登海默 E.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31.
- [10] 欧根·埃利希. 法社会学原理[M]. 舒国滢,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